谁在领导省级深改组 P38　“改革第一人”和他们的悲喜人生 P33　被高估了的高铁新城 P27

瞭望

2014年第08期　02月27日出版　总第530期　定价：RMB 1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5115/Z　邮发代号：4-757　国外代号：W1826

ORIENTAL OUTLOOK

东方周刊

养老市场谁来导航

用“各路英雄逐鹿中原”来形容现在的中国养老产业再合适不过





中国人一辈子都是讲责任

——历史学者姜义华谈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暨根柢（访谈之二）

封面报道

再见唐家岭



江亿院士：必须控制城市建筑总量 P28

CONTENTS 目录



P10 封面报道 COVER STORY

再见唐家岭

曾一直徘徊在聚光灯外的本地村民，成为这次变化的主角。背靠中国最具政策资源优势的都市，几千名村民正在政策空间中探索自己的未来。2014年的第一场雪，唐家岭告别改造完成后的第一个冬天

张涛摄



一个巨大的、层次丰富的中国养老市场的轮廓正在愈加清晰



东部应该大力发展围绕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集群，而中西部应该大力建设有吸引力的大城市





(2014.02.17)
瞭望新闻周刊

民本棚改

把握棚户区改造的核心是保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棚改不只是安居工程，更是和谐工程、民心工程，是一次重大的利益调整，能有力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2014.02.19)
环　球

索契之行全观察

新春之际习主席的首次出访，时间短、内容多，收效大，既显现新领导集体的外交创新，又凸显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谋篇布局。好局已然开启，中国外交的新风范、新举措、新成果，必将陆续到来。



(2014.02.17)
财经国家周刊

公车改革启动倒计时

2014 年，公务用车体制将迎来一场全面改革。其范围不仅涵盖中央党政机关，也将延展至地方党政机关，不仅是党政机关，还会带来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公车改革的酝酿。

瞭望东方周刊

新华通讯社主管
瞭望周刊社主办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瞭望东方周刊
总 编 辑 Editor– in – Chief
姬　斌

常务副总编辑 Executive Vice Editor–in–Chief
孙　凯

副总编辑 Vice Editor–in–Chief
赵　悦　　程　瑛　　王启广

主笔 Senior Writer
黄志杰　　山　旭　　祁和忠

责任编辑 Senior Editor
黄　琳　　顾佳赟　　牛二波　　戴闻名
金明大　　张　瑜　　徐赛虎

记者 Reporter
柴爱新　　张　琰　　杨　天
黄柯杰　　刘伊曼　　赵新社
李　静　　周范才　　葛江涛
张　欣　　邢　静　　骆晓昀
刘　武　　刘　耿　　芦　垚
张　静　　傅天明　　张海林
武　刚　　吕　爽　　钱贺进
张　璐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徐修安　　周传丽　　董龄岳
周开艳　　石　婧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纪　元　　张杏梅

文字编辑 Language Editor
赵秀红

编 务 Executive Assistant
康佩红　　陈　玥　　杨卓琦

编辑部地址 Address

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 305 号
电 话：(021)64728115
邮编：200031

北京采访中心 beijing Editorial Center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97 号甲
新华社发行楼 6 层西侧
电 话：(010)88052828
邮编：100031



2014 年 02 月 20 日截稿

瞭望周刊社
总编辑
姬　斌
副总编辑
胡俊凯　罗海岩　叶俊东
王磊
总编辑助理
史湘洲　杨桃源

瞭望周刊社主办刊物
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东方周刊
环球　　　　　财经国家周刊

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赵　悦
副总经理
张　栋
财务经理
蒋震芳

广告中心 Advertising Center

常务副总经理
潘美君
副总经理
赵　君
华北区　010—88052826
销售总监
戚　健
高级客户经理
马　远　　张丽娜
客户经理
张　玮　　魏子源　　叶夏
华东区　021—64721131
销售副总监
王楚伟　　韩薪茜
华南区　020—38810492
销售副总监
张明达
广告助理
周　杰

市场推广中心 Promotion Center

总　监
张志勇
副总监
周佳妮
市场部
孙　璐　　高雪梅　　刘丽娟
刘　柳　　韩晓晔　　韩　雪

发行中心 Distribution Center

总　监
薛　玲
副 总 监
郭　伟
高级经理
王文林　钱民义　李　黎
李建荣　徐　正
印　务
刘小乐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石工商广字第 0036 号
广告总代理
上海瞭望东方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广告 热线
上海（021）64721131
北京（010）88052826

邮箱 E–mail

读者来信邮箱
lwdfdzlx@vip.sina.com
读者评刊邮箱
lwdfdzpk@vip.sina.com
财经新闻邮箱
lwdfcjxw@vip.sina.com
时政新闻邮箱
lwdfszxw@vip.sina.com
社会新闻邮箱
lwdfshxw@vip.sina.com
文化新闻邮箱
lwdfwhxw@vip.sina.com
新闻评论邮箱
lwdfxwpl@vip.sina.com
国际新闻邮箱
lwdfgjxw@vip.sina.com
图片新闻邮箱
lwdftpxw@vip.sina.com

印刷 Printed by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网址：
www.yuecheng.com
电话：
010–84417799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上海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757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海外定价：$2.9
（北京 399 信箱）国外代号：
W1826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672–5883
国内标准刊号：
CN11–5115/Z
订阅热线：
(021)64728110
(010)88052829

新华网网址：
www.xinhuanet.com

瞭望东方周刊网址：
www.lwdf.cn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头等舱、商务舱阅读刊物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本刊手机客户端，关注本刊官方微信、微博：


安卓版客户端


苹果版客户端


官方微信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2014：殊途同归的城镇化

本刊评论员

地方两会踏雪而来，迎春而开。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及城镇化，这反映出各地对城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

从2014年地方两会报告来看，各地推进城镇化，在核心任务的锁定上较为一致，纷纷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强调提高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

许多地方的两会报告中提出，要把促进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紧要的任务。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提出“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或称将“抓紧出台差别化落户政策”。

除了通过各类户籍政策推进人口市民化之外，地方两会纷纷提出要出重拳治理各类城市病，让城市水更清、地更绿、天更蓝。要让城镇化成为传承历史文化的过程，而不是变成切割历史文化的利刃。比如，浙江、安徽分别提出彰显“江南地域特色”和“徽风皖韵”

除了通过各类户籍政策推进人口市民化之外，各地两会纷纷提出要出重拳治理各类城市病，让城市水更清、地更绿、天更蓝。要让城镇化成为传承历史文化的过程，而不是变成切割历史文化的利刃。比如，浙江、安徽分别提出彰显“江南地域特色”和“徽风皖韵”。

2014年地方两会所强调的城镇化，普遍强调人的发展，特别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非修路架桥、建造钢筋混凝土新城；普遍先强调户籍人口政策而非投资促进政策；普遍首要强调人口在城镇的落户数量、新老市民的生活质量目标，而非强调城镇化推进经济发展的数字目标。

具体到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方面，则是一省一市，特色鲜明。

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更加注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治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城市病、小城镇病、农村病。比如，北京提出“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广东表示将“积极创建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省”。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水平相对较低，这些地方对城镇化率强调得多一些。例如，甘肃和西藏则分别提出“城镇化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和“力争城镇化率达到25%”的具体目标。

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地方各省市可谓既竞争又合作。

各地均认识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必须深深植根于当地产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比如，云南、贵州等山区、高原地区提出“稳步推进城镇上山”、“走山区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提出“注重工业化牵引城镇化”等。

各地普遍以区域城市群为城镇化主体形态，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如京津冀三地的两会报告中，都提出依托城市群发展的思想。北京将“积极配合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天津要求“加快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京津‘双城记’”；河北提出，要坚持把城镇化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构筑以京津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石家庄、唐山两大城市为区域中心，其他设区市为支点的层级合理的城镇体系。

这意味着，未来城镇化竞争形态中，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或将更为突出，中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发展将成为地方政府极为倚重的力量。例如，广东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要求“发挥广州和深圳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优化珠三角各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质量”。吉林则要求，“抓住国家规划建设哈（尔滨）长（春）城市群机遇，积极推进我省中部城市群发展”。

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这个核心任务不能变，具体的路径则可千变万变，这正是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精神和要求。从已经落幕的地方两会来看，推进新型城镇化，确实有新思考、新风向、新动作。新的一年，寄望于各地能尽最大可能将政策语言转换成切实行动，扎扎实实推进城镇化进程。东



习近平会见连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月18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台湾《联合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家宴款待来访的连战伉俪，由于两人都是陕西老乡，习特别准备陕西菜，两人在席间还用家乡话交谈，气氛热络，相谈甚欢。两位夫人则畅谈音乐、艺术与家庭。

北大校长王恩哥： 连战先生2005年来校访问，一场题为“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演讲感动了北大学子。授予连战先生北大名誉教授，既是对连战学术和社会活动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必将有助于促进北大与台湾的文化、教育、学术交流，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台湾“中央社”：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连战18日中午在与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见面时，获赠两只大陆本土品牌的小米手机，手机背后印有“两岸联手赚世界的钱”9个字。

最佳笑笑爸爸： 习连两人是老乡，他们可以一边吃家乡饭一边用家乡话聊“乡愁”论国事，天作之合，其乐融融，悠哉美哉。

镇江太守： 习主席中午的便餐就让“庆丰”包子名扬四海，门庭若市，何况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又是家宴招待贵宾的陕西名吃，陕西泡馍、肉夹馍、[illegible]面想不火都不行。

CNSPHOTO/漫画：张程亮









在别处症候群

就是指人们总觉得自己所处的境况不好，认为也许换个工作、换个城市，生活就能得到改观。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夹缝中求生存，人们难免会幻想“在别处”的美好，以为在别处，有清新空气、有高薪待遇、有闲暇时光，更有簇新的梦想和志同道合的人群。但事实上，真到了别处才知道此处的味道。

节后离婚潮

每年春节之后的工作日都有不少夫妻闹离婚，这被称为“节后离婚潮”。节后离婚，冲动或赌气型离婚占主要部分，比如为假期生活安排而产生意见的，有因为忙于应酬交际的，通宵打麻将等闹意见的。同时，有些夫妻刚结婚，因为双方过节习惯不同、性格又没完全适应，觉得没法生活在一起。另外，有一些是感情已经破裂的中年夫妻，假期里突然较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导致矛盾爆发。

怨薪族

指的是那些埋怨薪水不高，不给涨薪的职场人。调查显示，几乎没有职场人对目前的薪酬表示“非常满意”，18% 的职场人表示“满意”。73% 的职场人则对目前的薪酬表示“不满意”，9% 的人强烈表示“非常不满意”。

吃货三字经

是由网友总结的中国饮食文化三字经：涮北京、包天津、甜上海、烫重庆、鲜广东、麻四川、辣湖南、美云南、酸贵州、酥西藏、奶内蒙、荤青海、壮宁夏、醋山西、泡陕西、葱山东、拉甘肃、炖东北、稀河南、烙河北、罐江西、馊湖北、扒福建、爽江苏、浓浙江、香安徽、嫩广西、淡海南、烤新疆。

新闻下周看 

24	25	26	27	28	29	30

应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法国外长洛朗·法比尤斯2月20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农业部：

粮食自给方针未变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 – 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要稳定在 5．5 亿吨以上。有报道称，中国将粮食产量目标设定在低于国内消费量的水平，意味着粮食自给自足政策内涵改变，未来中国粮食进口将增加。对此，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辉 2 月 19 日表示，我国长期坚持的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粮食方针没有改变，随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国内粮食供需格局将保持基本稳定。

北京：

”限定每人每车一款叫车软件“消息不实

近日，部分媒体发布消息称，北京交管局已向出租车下发新政，要求驾驶员每车每人只限使用一款叫车软件，并将派出执法大队对出租车司机进行抽查。北京交管局对此回应：出租车运营管理不属北京交管局职责范围，北京交管局也从未发布过此类消息。

南京：

市委书记否决汽车限行方案

在南京市委常委会集体调研会上，南京市环保局建议，为保青奥会召开，在 8 月份实行普通汽车单双号限行。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当场否决了这一方案。他要求保障青奥不应扰民，只有在空气污染红色预警时，公车限行，然后方可考虑私家车限行。

广东：

雷州警方否认协警围殴群众

日前，一段有关“广东湛江雷州市协警围殴民众”的视频在网络上盛传。记者 2 月 16 日从雷州公安部门获悉：视频内容并不属实，事实是社会青年暴力妨害公务。对此，雷州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事件发生在 2014 年 1 月 31 日（正月初一）。当日上午，由于城区人较多，为确保交通安全畅顺，交警部门对主要街道进行了交通疏导和交通管制。但 15 时许，谢某航、王某新等十多名社会男青年驾驶 4 辆两轮摩托车，途经雷城车站十字街路口交通管制路段时，准备强行通过路障。正在执勤的交警和协警上前制止，谢某航、王某新等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辱骂和殴打执勤人员，致一名交警和 3 名协警受伤。

工信部回应垃圾短信治理成效：

去年拦截100亿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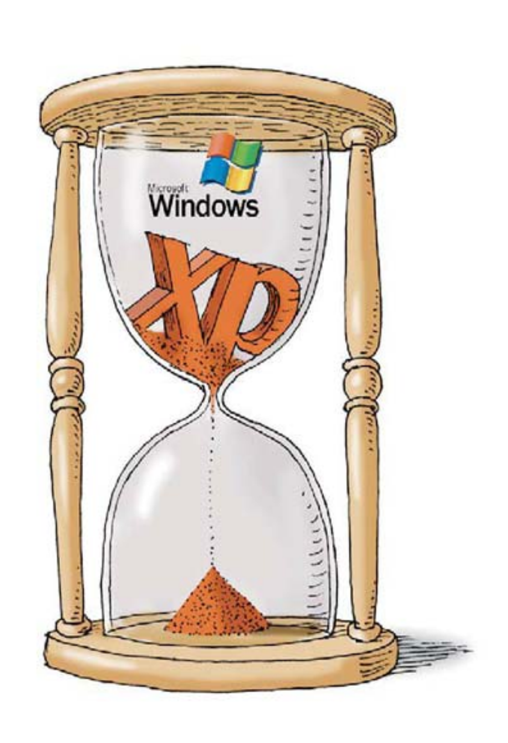
2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张峰介绍，2013 年以来，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清理关停违规短信端口 7 万余个，拦截垃圾短信超过 100 亿条，处理违规个人号码 6.5 万余件次。通过整治，垃圾短信日均投诉量较整改前下降超过 50%，端口类垃圾短信日均投诉量下降超过 80%，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收到垃圾短信投诉同比下降 18.6%，在短时间内有效遏制了垃圾短信泛滥的局面，用户感受明显，取得阶段性成效。

CNSPHOTO/东方IC

官方回应景区人员用石头砸游客：

系其反抗时被拍

2月18日，有网友在论坛发帖称，大年初三，一家人到昆明轿子雪山游玩，途中因吸烟遭景区工作人员围殴并用石头砸人。昆明倘甸产业园区和昆明轿子山旅游开发区管委会回复称，该事件系护林员在制止游客吸烟时引发肢体冲突，关于网帖中护林员高举石头砸游客的照片，是护林员反抗时被拍下的。



安全专家：

"XP10分钟被感染"太夸张

4月8日，微软将停止对Windows XP的更新服务。随着日期临近，近日，内容为"在此之后用XP，电脑10分钟内就感染！"的传言引起热议。安全专家明确表示，这个说法过于夸张。他介绍说，在微软为XP打补丁期间，XP系统仍屡屡出现高危Oday漏洞（Oday漏洞是指已经被黑客攻击，但厂商还没有推出补丁的漏洞）。由于微软补丁需要较长时间进行开发和测试，往往在漏洞被攻击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以后，微软才发布补丁。而在最近数年内，国内并没有因为Oday漏洞爆发大规模的木马病毒感染情况。



1 | 北京：

拟规定地铁内吃东西最高罚500元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草案）》2月19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规定，在地铁内吸烟、饮食不听劝阻的，将面临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危险乘梯行为，如追逐、打闹、滑板、溜冰、运动自行车等危及安全的活动，运营单位有权制止、警告或罚款。

2 | 国家工商总局：

企业年检制度3月起停止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

中国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出"关于停止企业年度检验工作"的通知说，国务院发布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将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3 | 教育部：

部属高校书记和校长初任提拔一般不超过58岁

近日，教育部发布《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领导班子专业结构要与本校主要学科门类相适应，年龄结构要形成梯次配备。换届时年龄超过58岁的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再进入新一届领导班子。

4 | 民政部：

2015年底全面建立申请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2月19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为了防止申请低保的过程中出现"骗保、漏保、搭车保、人情保"等问题，民政部正在全国试点建立申请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预计这项机制将在2014年底前在全国70%的市县区建立，到2015年底在全国全面建立。

5 | 最高法：

充分运用新媒体大力推进公开公正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月19日举行的"新媒体与司法公开"座谈会上强调，人民法院要充分运用网络及微博、微信等搭建司法公开平台，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动态反映法院工作情况。要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传播司法信息创造条件。

再见唐家岭

土地没有进入市场进行招拍挂，就没法进入一般开发的贷款流程。王志军觉得，国家针对试点还应该推出相应的金融政策。否则，“资金有难度”——与盖好两个新小区的目的不同，这次的资金问题涉及村民今后的生存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 | 北京报道

北京城区西北角，西北旺镇，唐家岭地区，已经不再有蛰伏的青春。

两座新小区构成的“新城”里，行者寥寥。至于原来被自嘲为“蚁族”聚集的“老城”，目光所见只留有不到10栋建筑。

而不久的将来，它们可能会与那些曾经浪迹于此的年轻人一样，从这里消失。

这场改变，被纳入北京市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改造的宏大叙事之中。这个投资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的巨量工程，承载了土地扩容、人口调控等多种期望，因而对于大北京有着诸多现实意义。

曾一直徘徊在聚光灯外的本地村民，成为这次变化的主角。背靠中国最具政策资源优势的都市，几千名村民正在政策空间中奋力探索自己的未来。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因拆迁、征地而一夜暴富的故事。确切点说，它是北京在环境、资源压力之下，用种种约束进行的一次城镇化试验。

2014年的第一场雪，唐家岭告别改造完成后的第一个冬天。



2010年7月8日，北京，拆迁中的唐家岭。工人在回收建筑材料
CFP



2010年5月，雨中的唐家岭村，路边卖菜的摊子支起了灯，给刚下班的人们照亮了回家的路

老城

北京的冬天，没有雾霾的时候，通常伴随着强硬的寒风。

轻轨13号线西二旗站，乘车再向西北行进约10分钟——这是当年“蚁族”日复往来的行程——直到京包高速一侧，举目前望，就是当初被舆论关注的“唐家岭老城”——这个带有一些历史意味的称呼，是改造结束后当地人对此的通称。

斑驳的白杨树旁边已经没有了从前拥挤的烧烤摊，寒风吹过，只留下树枝簌簌轻响。空中依然纵横交错着各类电线，但与过去广为流传的照片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冬日的阳光里，也不会再有衣衫从临街的窗口挑出来，成为令人担心的导火索。更没有人惺忪着双眼，走出晦暗的简易楼，在路边的商店里买一包廉价香烟——现如今，在凋零的旧城里，只剩下零散的几处门市。即便如此，仍不能确定，趟过凌乱的空地，能否敲得开它们紧闭的四门。

2009年秋天开始，刚刚还沉浸在“蜗居”悲苍中的一些人，将目光聚集到了北京城乡结合部的这块土地。

“过去这半年，我在唐家岭看到的记者比前4年看到的总数还要多。”一个租住于此的年轻人对媒体说——唐家岭也因为这些被自嘲为“蚁族”的年轻人而声名在外。

人们通常所说的唐家岭地区，其实由唐家岭、土井两个行政村构成。

土井村现在户籍人口1420人、外来人口1600人。土井村治保主任宋小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之前外来人口有1万多人。

他说，辖有唐家岭村、土井村的西北旺镇曾有户籍人口3万人、非户籍人口20万人。如今后者已经减至10万余人。

离开的人，不少搬到了更远一些的韩家川、冷泉一带。在2010年春天唐家岭的房东们发出搬迁令之后，房客们纷纷在百度贴吧写出了租住的新地址：回龙观、霍营、六里屯、小牛坊……每一个地名都代表着与市区完全不同的房租价格。

不过，如今在阶段性改造完成后，村镇干部们说，“两个新区的3000多套房屋仍然欢迎他们回来。”

新房

“两个新区”，就是“图景嘉园”与“唐家岭新城”——其实就是土井村和唐家岭村的村民聚居地。

从老城切换到这里，颇有海市蜃楼的感觉：就在10分钟前，周边还是凌乱的老城与荒寂的冷冬，但红白相间、干净整洁的楼群就在转过中关村公园后，突然出现了。

一色15层的崭新住宅楼，在凛冽的寒风中显得干净而挺拔。只是它们暂时的寂寥，与老城彼时的喧嚣，构成了明显对比。

当然，光鲜的楼群被夹在树林与积土间，颇感突兀。与老城改造后的工程积土一同存在的，还有楼群周边的工程围墙——这显示着工程的最后完成似乎还需要一些时间。

西北旺镇规划科科长杨景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两个小区有29栋楼、4647套住房，其中唐家岭835户、土井355户。2012年6月30日，新城迎来第一批住户。

房子仍然可以用来出租。改造前，唐家岭村村委会副主任董建华在唐家岭老城曾经花了5万元建了10间出租房。搬入新居后，董建华名下的4套房中，用于出租每年可带来10多万元收入。

4647套住房中，如今有2000套房屋趸租给海淀区公租房管理机构，剩下的又有一半被村民用来出租，这就是所说的3000多套。

“趸租房”是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改造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也被称为“人才公租房”。

所谓“趸租”，是通过从农民手中长期租赁富余的定向安置房，将这些房源纳入公租房中，专项用于中关村科技园等重点企业工作人员的租赁居住和过渡周转。

张涛摄

由海淀区公租房管理机构与村民签订整体5年的合同，并负责为房屋进行统一装修，租户可拎包入住。房管局每年定期将租金收益汇至居民账户。为加强管理，两个村还各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

西北旺镇党委委员王志军觉得，这种模式是此次改造中最值得称道的内容之一。今后准备在产业用地上建设的公租房，也会趸租给海淀区住管中心。

董建华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新城的房租，无客厅一居室每月1800元，有厅一居每月2100元至2300元，两居3000元左右，三居3800元左右。

改造前，500平方米的出租屋可以分割为数十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间月租金在500元左右。源于可观的收入，拆迁曾经遭遇极大困难。

北京的媒体报道，改造中最多的一户分到了11套安置房。只是，这些房子仍属于集体建设用地。换句话说，土地的性质和过去村民的平房一样。这使它们在日后的产权变化中，将受到极大约束。

因为所有这些制度设计，是一个有名的试点：集体建设用地公租房试点。

试点

之前由于担心借试点变相建设“小产权房”，国土资源部对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一直持谨慎态度。

也正是这个原因，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公租房与“小产权房”被严格地区别开来：它的产权仍为农村集体组织所有，不能出售给个人，只能配租给符合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并纳入统一规范管理。

在2012年1月获批前，国土资源部还下发通知，未经国土部批准，一律不得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北京是第一个获批试点的城市，唐家岭是第一个启动的试点。这项政策也在重点村改造中被寄予厚望：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的模式采用占地而非征地的方式，农民会有租赁房屋收入的逐年分红，收入持续稳定。而且当地“上楼”农民可以参与公租房社区的物业管理，成为产业园区的工人，解决就业问题。

王志军解释说，目前安置房的房产证还没办下来，这些房子会按经济适用房管理，而今后集体土地上试点公租房的产权也会是村集体大产权证。

不过，也曾经有报道说，这些房子的建设遇到过资金问题。村镇干部证实，海淀区公租房管理机构曾经一次性将前3年租金提前支付给唐家岭的两个村子用于建设。

对于唐家岭的资金运行，村干部和镇干部都说始终处于滚动当中，很难有确切统计。

不过看得出，他们还是希望底商出租后的回流资金能够冲抵一部分建设投入。

入住公租房需要经过北京市的一系列既定程序，大致说就是一个“打分”的过程。最终通过“摇号”获得入住者，还可以得到10%的政府补助。

镇里也与周边学校合作，将房屋租给学校用作员工宿舍，大量信息产业从业人员也将成为本地区新的住户。

经过这样一系列改造，唐家岭的外来户们当然不一样了。

其实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这次改造并没有多少土地符合传统“征地”的概念。一方面是安置房都建设在集体建设用地上，没有征地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绝大部分土地都被用来建设中关村森林公园——北京“绿隔”的一部分，但由于是占地，政府只支付占地费用，远远低于征地补偿。

在西北旺镇规划科副科长王慧颖的印象中，至少到目前，村里并未获得大量补偿资金。

这样，无论土井还是唐家岭的村集体，都很难像过去的“城中村”改造那样，通过土地整理获得“生地”、上市在招拍挂后获得收益。换句话说，不可能用地级差获得巨额土地收入。

总之，这不再是一个因为改造、拆迁、征地一夜暴富的故事，产业也成为改造后两个村子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产业

王志军说，改造前两个村子靠出租厂房、住房等，每年有1000万元左右的集体经济收入，“但是一拆迁都归零了”。

从目前看，新的土井村还是个农业村。过去种大棚的都是外乡人，宋小滨说，租一亩地一年1万元左右，“一家人还有了住处”。如今，这些租种者也面临着离去的命运。

改造之前，68岁的土井村村民周丽荣把自己的两亩地盖上大棚出租给了别人，作为海淀区对土井村村民“农转居”政策的受惠者，周丽荣在转为“非农”后依然拥有自己承包的土地。如今，她每个月可以拿到1300元的退休金，出租大棚也会带来大约每月2000元的收益。

这一切不能掩盖的是，唐家岭地区的两个村子一直是典型的“民富村穷”——村民出租房屋获得租金收入，但村集体并未同步获得相应收入，反而因增加的环境、资源压力有更大付出。

无论土井还是唐家岭的村集体，都很难像过去的“城中村”改造那样，通过土地整理获得“生地”、上市在招拍挂后获得收益。换句话说，不可能用地级差获得巨额土地收入。

➲ 事实上，与其他村的拆迁不同，经济力量薄弱的两个村集体在此次改造中经历了真正的考验。

王慧颖“个人觉得”，村里没有支柱型产业，经济实力较弱很正常。

唐家岭新城附近比较大的农业设施是北京百旺农业种植园，里面的新大棚有电动卷帘和电动天窗及风口。

不过，这个500亩农业园归属西北旺农业设施中心,唐家岭地区的村民只获得土地出租的收益。虽然特别希望发展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但村集体自己还没有这样大的园子。

2010年改造启动后，唐家岭地区也发展了设施农业。土井村有一些大棚与航天部门合作，进行太空搭载种子的种植试验。但是村干部说，它们目前的比重还不大，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这些种植园与蔬菜大棚的收益目前是两个村子的主要收入，盈利分红给村民。而位于新城北边的庞大土地，被寄予了巨大的希望。

根据规划，这里将建设3万平米公租房、3000平方米商业项目以及3万平方米企业孵化器项目。这200多亩土地,最后会叫做“众唐兴业园”与“盛景创业园”。

即使地下空间部分，宋小滨说，也准备由两个村子合作“弄一个大的超市。”无论哪个部分，收益都将作为村民分红。

看得出来，村镇干部们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很多想法。

王志军的希望是，产业园区建成后，村集体每年能有几千万元级别的收入。

但是说到根本，这些土地也不可能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用。具体说，就是不能全部开发为利润高的商品住宅。

于是，改造后土井和唐家岭最大的寄托——可以用于开发的土地，也受到了规划的限制。

按照规划，唐家岭附近有软件园、北大生物城和永丰、航天城，整个地区将以发展高科技研发制造产业为主，特别是应打造高端技术产品产业化制造基地，同时适当发展现代服务产业和房地产业——这给了唐家岭改造一个前置注解。

即使如此，这片土地目前还处于规划阶段。

王慧颖对本刊记者说，产业园区建设资金存在困难。至于解决方式，她说，一部分自筹、一部分由政府支持，但还是需要依靠招商引资解决大部分资金缺口。

王志军说，作为试点，现在还缺少配套政策。具体讲，就是没有针对集体土地的贷款政策。

土地没有进入市场进行招拍挂，就没法进入一般开发的贷款流程。王志军觉得，国家针对试点还应该推出相应的金融政策。否则，“资金有难度”——与盖好两个新小区的目的不同，这次的资金问题涉及村民今后的生存问题。

身份

年底是村里“发钱”的日子，宋小滨与他的同事们也忙了起来。

像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大多数村庄一样，在土地改造后，村民入股的村办集体企业承担了维持农民稳定收入的重任。

74岁的土井村村民王少华对本刊记者说，为了村办企业，村民们每人曾入股11万元。

土井村的企业有经济合作社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物业公司，目前最主要的收益方式是以集体名义出租土地。

这个冬天，土井村集体企业提供的分红是每人6000元，只有“具有农转非身份的”并“具备改制资格的”才能得到。

西北旺镇社保所所长邢志梅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改造后，17岁至30岁之间的人员被一次性补齐社保，然后社保关系都转到了政府社保部门。

而就业人员则自动延续就业，无业人员由社保组提供就业服务。西北旺镇里出钱为两个村子的物业公司提供了200多人的就业培训，镇办产业亦优先考虑本镇居民就业。

拆迁后主动失业的人员只能随其自主。

即使对于转居这样的基本问题，由于试点也出现了新的挑战。

“现在也没有具体政策，农民都愿意转居民，但不征地，没有指标，就很麻烦。我们这两次转居都是征地转居，都是村委会、村集体出钱。”王志军说。

这个问题还是与“绿隔”有关。因为土地都用来原址绿化，没有征地，也就没有名额。

一些人的例外是因为有一部分土地被航天城征用，国土部门因此给了转居指标，但仍是“村里掏钱，每人好几十万。有多少指标转多少人，现在唐家岭还有200多人转不了，不给指标了”。

与其他村的拆迁不同，经济力量薄弱的两个村集体在此次改造中经历了真正的考验。

但是，村民们显然有更高的期望。年过70的佟淑芹住“图景嘉园”，在2008年转为居民。

她的抱怨是，自己家原有2.5亩土地，流转的0.5亩划入了航天城规划。在3万元补偿款之外，她觉得，既然土地流转到航天城，自己理应“属于航天城居民了，并在那儿退休。”



“原先在村里用水不花钱，现在住到楼上什么都得花钱。”图为唐家岭新城居民乔正海及他身后的唐家岭新城

结果“弄一个超转，人弄到海淀区了”。

佟淑芹说：“傻眼了”。

这种期望，是大多数农民转居时的期望，“谁占的地，人员就在谁那里安置，是不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如西北旺镇社会事务管理科科长蒋和红所说，按规定将“农民”身份转为“居民”身份后，并不改变原有行政单位的管辖状态。

观念

虽然想当城里人，但唐家岭的村民们一时还很难适应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活。

比如与还在规划中的收入相比，支出却是现实的。物业、水、电、燃气……唐家岭新城居民乔正海说，“原先在村里水不花钱，现在上楼什么都得花钱。”

由村干部主持的物业公司也抱怨，物业费收缴困难成为新城突出的问题。

北京工业大学博士李升及其团队在唐家岭调查发现，很多上楼村民对于公厕、水、煤气以及文化活动空间等需求依然维持传统，比如婚丧嫁娶，这对公共设施建设和社区管理提出了挑战。

除了卫生所等公共设施，整个地区的社会组织正在重塑的过程中。

王志军说，现在新城施行物业与村委会、居委会三重管理，以村委会为主。

在王慧颖的解释中，“村委会管村民，居委会管居民。”村民全部转为居民后，若村里还有集体土地，则村委会不撤销，负责管理村集体产业，包括土地。

“重点村”将可能改变以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划分城乡社区的做法，原有的村委会可按照社企分离的原则“一分为二”：原有经济管理职能交由村经济组织负责，原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让渡给新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

党的组织也在重组构筑之中。相比此前对流动党员管理的空白状态，汪玉华说，下一步该镇党组织将建设流动人口党员之家，并对非公企业的流动党员建立信息录入程序。

干部们觉得，“转居”后，原来不受法律保护的、不可持续的、低效的“瓦片经济”正在优化升级，接下来“可以做一些精神层面的事情了”。

2013 年，西北旺镇举办了社区邻里节，其目的是“密切社群关系”。镇里的干部说，为转变农民观念，镇里对上楼后的市民进行了大规模培训，“讲座平均每年一百场，文化活动一年一百多场。”

让他们感慨的是，现在很多搬入新居的家庭“装修非常有品味”。

设施

新城里的每个人，无论是居民还是农民，都在重塑自己的生活。

佟淑芹搬到“图景嘉园”后，很苦恼的问题就是“买菜还要到很远的地方——这边菜少，还贵。”如周丽荣所称“人家卖白菜 5 毛钱一斤，到他那儿没准儿 8 毛。”

至于更复杂的公共设施，宋小滨坦承，诸如医疗室、邮局、银行等，“我们这儿全部没有。”

由于小区车库迟迟未能启用，新区空地及道路两侧突兀地停放着大量车辆。

至于原因，宋小滨说，“人防设施没有验收，车库无法启用。”

这样的解释同样被唐家岭物业公司副经理刁学燕所强调，当初为了优先保障居民入住，其他部门未来得及验收。不过刁学燕告诉本刊记者，该问题“很快即将解决。”

唐家岭新城的幼儿园看起来非常不错，这个标准的 4 层建筑，拥有与周边楼群融洽的色调——在冷风中宛如突然出现的效果图。

唐家岭新城门前摆摊的女商贩，瑟瑟地守在寒风中，很久没能等到自己的顾客，但她又走不成，“没有公交车了，短时间内还走不了”。

目前，居民出行只能依靠早晚固定班次的通勤车，其余时间需要步行 25 分钟至 909 公交车站。

作为解决方案，土井村自行与 982 路公交车队协商，每天一早，982 车队派 3 个班次的公交到这里缓解出行问题，但它还是权宜之计。

路不是没有，新修的马路宽阔而通畅，但是被装上了隔离桩。

西北旺镇规划科科长杨景峰并非不清楚居民的苦恼——本地区与航天部门及一些敏感单位接壤，工程多受限制。2013 年夏，位于两个小区北侧的友谊路开工，但“断断续续总是停”。

这背后的缘由是，2010 年至今，“嫦娥二号”、“天宫一号”、“神舟八号”等航天工程相继实施，“涉及航天部门相关工作及重大政治活动期间一般不能施工，所以会慢。”

除此之外，当地一个地块施工就涉及 9 条地下光缆，这些光缆分属不同的部门——都需逐一协调。

2013 年年底，杨景峰又去相关部门协调道路问题，“说涉及航天活动，要等一等。”

所以，唐家岭的人们特别期待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北京市城乡办：重点村改造不针对特定人群

城乡结合部人口过度聚集，就业不充分，公共服务缺失，安全隐患突出，社会环境紊乱，这些都是既有发展方式决定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转变发展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 | 北京报道



2014年1月28日，北京，留守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楼辛庄大集上给孩子挑选玩具作为新年礼物

涵盖北京市9个区的城乡结合部重点村改造，至2013年年底已经获得阶段性进展：竣工31个村，计676万平方米，在施405万平方米。

作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北京也在依靠这次巨大的改造工程推进自己的城镇化进程。事实上，这一系列改造始自上世纪50年代，并成为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注脚。

就重点村改造的若干重要问题，《瞭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北京市城乡办”）相关负责人。这个机构是北京市为推进重点村改造专门成立的协调机构。

“绿化带”与“重点村”

《瞭望东方周刊》：*该如何正确描述这50个“重点村”？*

北京市城乡办相关负责人：首先要明确，“重点村”不是“城中村”的概念。城中村是城市开发剩下的区域，是被城区包围的农村区域。而我们将“重点村”确定为城乡结合部，它有城、有乡，在城和乡交界的地方，比较特殊。

在规划中，这些重点村区域肯定要建成城区的，但现状还是农村。其中还包括不在中心城区的，不过它在大型新城的范畴里，也算城区。这些“农村”需要进行城镇化建设，落实城市总体规划。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在逐渐扩展，城乡结合部慢慢变成城市。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在规划中设计了“分散集团”的模式，即“中间城”加“卫星城”的形式，当时叫边缘集团。根据规划，通过绿化隔离带，将中心城区隔离开，保障以后中心城不会无限扩张，但当初只是一个设想。

到1986年，北京开始真正建设绿化隔离带。新世纪初，北京市开始大规模建设绿化隔离带，即第一道绿化带，我们简称“一绿”。2003年，绿化地带已经逐步推进到一些居住区，所谓重点村的改造也就逐步提上了日程。当时又规划了第二道绿化带。

但上述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要拆房子，还要种树，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随着北京申奥成功，绿化工作也加快了进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重点村改造有两个试点：北坞与大望京。它们的模式也不一样，北坞属于第一道“绿隔”，离香山近、影响也大，是典型的需要改造的地区，属于很明显的城区规划区域。

之所以选它做试点，是因为它具有“重点村”很明显的特征——属于“一绿”涉及的典型村庄，拆迁后原地的主要功能就是绿化。村民们将按照规划“上楼”。大望京村与此同样，距离机场高速近，有很多人，所以也在2009年做了一个试点。

两个村试点之后，觉得效果还可以，于是在2010年选出了50个村，做集中改造。当时要为这50个村统一命名。从地图上看它们呈星辰状分布，所以就叫重点村。

这些重点村地理位置好，农民能够靠区域位

置获得好的收入——这决定了这些地方改造难度相对较大。

具体而言，这50个重点村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顺义、大兴、通州、昌平9个区34个乡镇（街道），涉及61个行政村127个自然村。其中，位于中心城区38个、规划新城地区12个。从"绿隔"划分，位于"绿隔"地区34个，非"绿隔"地区16个。村域总面积约85.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1.4万，流动人口超过100万。

城乡结合部人口过度聚集，就业不充分，公共服务缺失，安全隐患突出，社会环境紊乱，这些都是既有发展方式决定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转变发展方式。

按照"先难后易"原则选择出来的50个重点村，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更加突出，转变发展方式更加紧迫、更加关键。重点村建设不是简单拆旧村和盖回迁楼，也不是政府拿地搞建设，更不是搞房地产开发，而是要在这一地区大胆探索，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社会建设同步、体制深刻变革，彻底转变发展方式。

特别是要按照"安居、乐业、一体化"的目标，通过"调、拆、建、转、管"工作时序，优化升级不受法律保护的、不可持续的、低效的"瓦片经济"，同步发展社会事业，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转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改变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生存方式，探索城市化新途径。

三分之一的人确实回去了

《瞭望东方周刊》：不少声音认为，如此大范围、大面积的改造，也有人口调控方面的考虑，是否是这样？

北京市城乡办相关负责人：城市化是一个方向，我们肯定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这些重点村肯定住了很多人，住人就会涉及拆迁等一系列的过程，但是这个改造不是要把外地人赶走，这不是我们的决策。

北京市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特别是重点村的压力更大。但重点村实际上还在城区的范围里面。这些地方人口流动性特别大、交通压力也很大。唐家岭是最有名的，它有19个公交线。但唐家岭如今已经全部绿化，现在叫中关村森林公园。

我们就是要缓解这个地方的人口资源压力，主要是落实城市的总体规划。关于人口变化，举例来说，丰台区有8个重点村，当时的流动人口大概是17万。改造后，大概还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还在丰台区域，三分之一多一点到其他地方去了，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确实回去了。

至于这个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可以想象一下，楼盖好后，肯定会有人不断入住，会有流动，这个区域的人肯定会少一些。但总体来说，调控人口总量，我们不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群。

用好"三天的钱"

《瞭望东方周刊》：重点村改造需要的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北京市城乡办相关负责人：现在重点村全部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6.9万农民成为股东，量化总资产80.6亿元、净资产39.1亿元。10个村10824人已完成整建制农转居，还有19个村36793人正在进行。集体产业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和新型社区建设等工作同步推进。

目前重点村改造已筹措资金1859亿元，其中自筹资金559亿元，银行贷款1300亿元，保障了建设资金需求。到现在为止，已累计投入资金约1465亿元，其中市级投入59亿元，区、乡、村三级投入1406亿元。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化解建设成本的经验，重点村建设是"用自己的水，和自己的面"，用好"三天的钱"，有效化解了建设成本。

所谓"三天的钱"，一是用"昨天的钱"平衡资金。城乡结合部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土地，凝聚了以往的建设投入，级差地租高，属于"昨天的钱"。二是用"明天的钱"启动资金。利用信贷等融资手段启动土地开发利用，变现土地价值，以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归还。加强政银企合作，创新金融服务，破解了融资瓶颈，落实了融资渠道。所融资金就是"明天的钱"。三是用"今天的钱"激活资金。项目自有资金和财政投入都属于"今天的钱"。

由于首都中心城区功能不断增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不断加快、亦庄开发区与大兴区深度整合、聚焦通州战略深入实施、永定河水岸经济带全面启动、城南发展计划等适时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推动了城乡结合部快速发展。

通过土地储备、产业园区带动、重点工程带动、宅基地腾退换房、"一村一策"建设、新农村自主建设等模式，多主体推进，形成了不同的城乡结合部建设发展路径。特别是"一绿"建设自1986年启动以来，经过1994年7号文试点推进、2000年12号文全面开展、2008年17号文深化提升、2010年50个重点村建设重点突破几个阶段，已取得了重大成绩，为北京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东

丰台区有8个重点村，当时的流动人口大概是17万。改造后，大概还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还在丰台区域，三分之一多一点到其他地方去了，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确实回去了。



2010年5月15日，北京，周末夜晚的唐家岭

重塑重点村：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中的"本地人"和"外地人"

北京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的改造促使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再流动和再组织化

文 | 李升

北京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改造，标志着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承担《北京社会建设蓝皮书》相关研究任务的北京工业大学课题组从改造城中村的人口特征——"本地人—外地人"的二元结构分析出发，对改造个案进行了观察。

显然，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改造不仅包括本地人的新市民培育问题，还包括大量外地人的服务管理问题。在有效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本地人—外地人"间的关系转变，将是新时期城乡结合部发展、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

城市化推进城乡结合部外移

近年来北京关于城乡结合部改造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奥运会为契机的已存城区内脏乱差地区，主要集中于奥运场馆周边的城区改造；第二个阶段便是2009年以改造北坞村

CFP

和大望京村为试点开始，到2010年挂账的50个重点村的改造规划，主要针对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改造开始推广开来。

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重点村改造并非易事，这与老城区内的"城市角落"改造有很大不同，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针对不同居民主体的变化应采取怎样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村民的拆迁安置保障问题与大量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问题，都给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改造提出了巨大挑战。

集中于这样的核心问题，北京市采取了相应的改造配套政策，在"北坞模式"和"大望京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尝试发展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相结合的城中村改造模式。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其主要理念就是确定以中心城区发展为主干、集中发展核心功能区，防止无目标方向的"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尤其是规划中确立的五环与六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建设，不仅能够起到城市生态建设方面的效用，更具有有效防止城市用地无限制蔓延的意义。

绿化隔离带将中心城区环抱其中，覆盖了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多数地区。作为城市边缘地区的重点村也由于城市规划开始进行改造。不过，对它们的改造不仅仅是单纯的空间改造过程，更是将空间中人进行重组的过程。北京的城市地价决定了改造地区的多数人向城市外围流动，城市化也在推进城乡结合部的外移。

从一些调查报道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随着北京五环内行政村城市化改造进程加快，流动人口开始向外扩散，城中村外移现象明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北京常住人口持续增长，并继续向郊区扩散。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集聚了八成人口。大量的外来人口集中于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而近年来北京重点改造的城中村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北京城市规划方面尽量在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但随着大量人口的外移，城中村的外移现象也在同步出现，这是受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地租差异以及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城乡结合部的"本地人"和"外地人"

概括起来，北京市的"城中村"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在建成区内环境脏乱的城市角落，分布在北京的旧城区。这部分"城中村"经过奥运会前3年的集中整治，公共环境已经有了明显改观。第二类"城中村"主要是指规划市区范围内的行政村。它们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具有人口高度密集，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生活环境脏乱差等基本特征，是当前北京市在城乡统筹过程中重点关注和着手改造的地区。

立足于"城中村"内的"本地人—外地人"这样的居住主体区分，可以看到改造的"城中村"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人口构成倒挂。城乡结合部的廉价地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使得城中村从原先的农村社区转变为移民聚集区。据不完全统计，朝阳区崔各庄地区的大部分近郊村的本地与外来人口的比率都在1：10以上。

居住人口构成复杂。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中的居民除了少数具有当地户籍的本地人外，还有来自外省市的大量外地人。尽管从整体来看外地人来自多个省市地区，但从个别的城中村实际来看，还是形成了同乡同地的聚集效应，他们更多的是由从事的职业关联在一起。由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形成的家居建材、商品批发、物流仓储、科技园区等的规模效应，因此也吸引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入住，地区经济产业和居住人口间具有紧密的相互"推拉"关系。

不过，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外来人口仍然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除了外来农民工人口，还有依托于科技园区或文化产业区等的大量"北漂"、"校漂"一族。此外，即便是居住于同一城中村内，外来人口也由于处于经济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而形成了阶层分化。

"本地人—外地人"的两种经济行为。城乡结合部重点村与旧城区内的"都市角落"显著的不同，就是经济行为的双重性特征。一是以村本地人为主体的物业租赁活动，不仅包括成立村集体资产合作公司来从事土地租赁、企业招标、物业管理等经济行为，还包括村民个体通过盖房出租从商等的经济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瓦片经济"，这些通过户籍与产权的确定而形成界限较为明晰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

二是作为承租者的外来人口依附于房屋建筑从事的经营行为，这主要是连接于当地的经济产业，并发展出相配套的服务于基本生活需要的其他经济行为，例如朝阳区十八里店地区主要经济是当地的家居建材市场，也由此发展出了餐饮、物流

尽管北京城市规划方面尽量在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但随着大量人口外移，城中村的外移现象也在同步出现，这是受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地租差异以及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等其他经济产业。

整体来看,“本地人—外地人”的不同居住主体，以土地房屋的租赁期约关系，将城中村内部的经济与面向于地区城市的经济连接起来，通过大量外来者聚居,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我供给、自我服务的次生经济圈和低层次生活链。一些规模较大的外来人口聚居村，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功能齐全、自我供给、自我服务的小社会。

“本地人—外地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薄弱。“本地人”、“外地人”之间的纯粹经济关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而“本地人”通过村集体经济的封闭性将“外地人”排除在外。由于很多的生活福利主要通过村的集体经济资产来分配，因此“外地人”也被排除在村子的生活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正因为如此，外来人口几乎不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很难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尽管村级社区基层组织对外来人口进行服务与管理，但更多的是表现在维护地区稳定秩序方面，在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本地人”与“外地人”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本地人”的变化

2010 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对 50 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的重点村进行集中改造。50 个重点改造村是按照“先难后易”的原则选择出来的，具有“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最突出，社会秩序最紊乱，利益诉求最复杂，城乡反差最明显”的特点。

城乡结合部重点村改造对于当地村民最大的影响，就是资产的转化。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和房屋的拆迁，使得本地人在获得新住房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当的搬迁补偿款。由于土地和住房在北京的高资产性，可以说，通过对城中村的拆迁，当地村民获得了相当的资产财。北京的高地价成就了当地村民高资产的获得。一方面村民可以获得安置的新房，另一方面根据所持有的宅基地等土地面积也可获得一定的搬迁补偿金。

此外，改造积极推进了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村集体土地流转等方式，集体资产处置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大兴区在城中村的搬迁改造方面通过成立镇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采取委托理财经营、集体购置商业设施等经营模式，统筹管理各搬迁村的集体资产。在重点村搬迁建设中实行了“双轨制”：一方面使农民“转非”后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另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把集体资产量化成股份，农民变股民，这样农民转非后可以带着自己那部分资产进城，按股份享受资产增值分红。

改造使得本地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职业身份方面的变化，主要由以前的农民身份转变为现在的城市居民身份，从事的职业活动也由最早的直接依靠土地为生，转变为后期的小生意买卖以及依靠房屋出租等的“瓦片经济”，现今通过土地流转而获得集体资产分红的当地村民也在从事着新的职业。改造城中村通过集体土地的“自征自用”,征地安置、定向出让等方式，留出空间保障农民就业，同时组织化的就业管理、系统化的就业服务、定单式的就业培训、多渠道的就业安置，让村民找到适合的岗位。

另一方面就是村民居住方式的变化，也就是常说的“农民上楼”。城中村的回迁社区多为楼房住宅，这与村民之前“脚踏实地”的居住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而且回迁社区中都配套有相应的生活服务类设施和便民商业设施。由此，居民身份转变的同时，本地村民的生活也开始转变为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

“外地人”的变化

由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存在居住人口管理混乱等问题，近年来北京一直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对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进行调控和管理，重点城中村的改造也成为这样的重要方式。

其实，从规划城中村改造起始之日起，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便通过一些方式来调控不断涌入城中村的外来人口，例如朝阳区推出 10 项措施来调控外来人口，包括限制低端产业发展、拆除违法建设、限制地下空间租住人、减少村集体的出租住人大院、建立人口规模承载预警机制、推行 4 个村的管理模式等。

北京城乡结合部重点村的改造，促使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再流动和再组织化。城中村房屋的拆迁使得租房和工作于此的外地人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落脚空间，那些与地区经济产业联系密切、经济条件较好的外来者依然可以通过负担较高租金或购买住房而留在当地，不过很多外来者是流向城市更外围的租金廉价的地区。例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的一些城中村，外地人长期在此形成的家装建材等“小作坊”和大量的小餐饮店，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改造后的当地地租不再廉价，他们需要在附近寻求更为廉价的居住地，如地下室



2011年2月25日，北京，闲置的农民回迁房将“变身”为政府公租房试点小区——海淀区四季青镇北坞嘉园小区内，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等待出租

等或迁往更为外围的地区。

需要看到北京在为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的努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租房建设。例如，唐家岭村成为首批启动集体产业用地建设公租房的试点。尽管公租房项目经过重重讨论后直到 2013 年初才确定动工，但的确是重大的突破，一定程度上为大量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可以落脚的居住环境。

“本地人”——新市民培育

城乡结合部地区的“重点村”，是由于快速城市化而使原农村社区演化而来的一类特殊社区。其原有的人员和社会关系乃至用地等基本保留，仍以土地及其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但不直接参与到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是以初级关系（地缘和血缘）而非次级关系（业缘和契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空间。

随着北京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展，在面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城市空间重要构成的“城中村”也逐渐面临挑战。

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不单单是由外在的客观环境条件形成一定的地理空间，而已经由本地人和外地人各自的常年生活与关系交往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空间。

因此，对于这些“城中村”的治理与改善，应当不仅仅是改造外在环境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有效改变其社会空间结构的问题。

在作为生存方式的职业方面，尽管城中村的“本地人”实现了资产转化，有些人获得了新的职业，但从事的工作依然较为低端，更多的还是依靠集体资产分红作为生活来源。

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居住方面，“上楼”以及社区化的居住环境，对长期居住在城中村的本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是从以前的“各扫门前雪”的分散居住形式转变为同一社区空间的集中居住形式，社区公共空间意识的缺乏对居住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一些改造后的集中居住社区中，楼道空间乱占、小区垃圾乱放、公共设施不爱惜、卫生意识缺乏甚至要求“绿地种田”等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本地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生活方式极大地挑战新的社区秩序形成，主要体现在熟人关系网络在社区中的再次构建、婚丧嫁娶等民俗民风在城市社区内的维持、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以及对作为社区管理新方式“物业”的认知等方面。

“外来人”能否安居

城中村改造中的外来人口安置问题，始终是城市面临的重要难题，处置不善则可能引发“新城中村”的扩张、人口流动秩序混乱、对地区乃至城市经济产业产生不良影响等诸多问题。由于存在的户籍等社会体制制约，长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外地人”不能像“本地人”一样在改造搬迁后获得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服务，必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城中村改造不能将大量的外来人口“排斥”在外，必须在保障本地人生活的同时，兼顾大量外来人口的生活需求：他们或需要新的居住空间、或需要再次就业机会、或需要医疗教育等的社会保障服务等。

基于此，一方面可以根据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鼓励对地区有利的经济产业发展，可以通过集中规模产业、区域功能分化、对个体经营的规范化指导以及相应的就业服务管理等方式，既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又能够保证地区外来人口的就业。另一方面需要给城市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可供生存的居住空间，正如唐家岭村在集体产业用地上建设公租房，既可以保障本地人的长期收益，又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可以安居的空间。此外，在“安居乐业”的基础上，还需稳步推进外来人口在地区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立，从而促进地区整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

进入到社区化管理的新时期，如何构建和谐的“本地人—外地人”间的社会关系，仍旧是需要持续考虑的问题。改造前形成的本地人与外地人间的薄弱社会关系使得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社会空间，时常还由于某一事件引发二者的冲突和对抗。尽管通过城中村改造消除了这样的社会关系，但进入到新的城市社区之后，仍会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他们或是长期居住于此的外地人、或许是新迁移来的外地人，这就需要在同一社区居住空间内建构新的社会关系。

基于此，一方面需要在新时期进行新市民培育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外来人口对城市社区的融入。另一方面需要在社区内构建良好的“本地人—外地人”的沟通交往氛围，可以通过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公共参与等活动实现二者在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再组织”，在社区公共领域构建可沟通交往的空间，保证社区居民间的沟通渠道顺畅，由此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社区居民关系并促进地区和谐社会秩序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

随着北京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展，在面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构成的“城中村”也逐渐面临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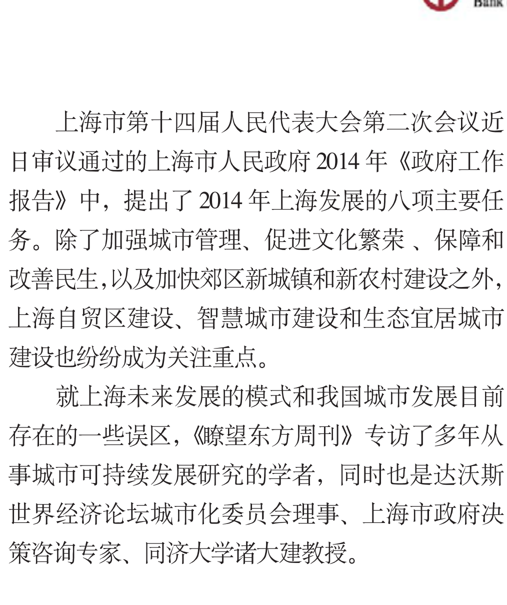
上海如何成为一座“伟大城市”

——专访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

东部应该大力发展围绕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集群，而中西部应该大力建设有吸引力的大城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琰 | 上海报道

东方IC



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的上海市人民政府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14年上海发展的八项主要任务。除了加强城市管理、促进文化繁荣、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加快郊区新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之外，上海自贸区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和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也纷纷成为关注重点。

就上海未来发展的模式和我国城市发展目前存在的一些误区，《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多年从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学者，同时也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城市化委员会理事、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

和北京相比，上海的三个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都说"双城记"，北京和上海也总被放在一起比较，你觉得上海跟北京比较，有什么优势？

诸大建：拿北京和上海比较，大部分都是在经济方面来比较的。

在经济方面，上海的优势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优势，上海的制造业仍然很强。中国的出口多是实体经济，这就是上海的优势。北京的特点在于它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虽然不提建设经济意义上的中心城市，但很多跨国公司想要跟中央接口，肯定会选择北京。目前北京的服务业已经占到80%多，这样的结果是使得北京的一些研发优势无法得到实体经济的支撑。但对于上海自身来说，制造业比重还是过重，占了40%左右，其实还可以再降低一些，当然也不能降低到全部变成服务业，我认为到2020年保持在30%是合适的。

第二个优势，上海的腹地优势。上海和长三角之间认同感很强，同化率非常高。北京虽然也说有腹地，但是缺少强烈的经济联系，河北和天津对北京的认同感不高，北京变成了对周边地区有虹吸作用的孤岛城市。


市民在上海外滩观光平台上打太极拳

第三个优势，上海的密度符合大城市的特征。大城市讲究密度经济，上海6340平方公里，比北京面积小，但是聚集的人口比北京多。城市越是有密度，规模效益就会越高。这是上海一个很大的优势。北京虽然人口也不少，但是面积比上海大了一倍多，密度远远低于上海。

不过上述这些优势最终体现在世界城市排行榜中，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相差也就那么几位。而想要在短期内，比如10年里北京、上海等进入世界城市的前三，跟伦敦、纽约、东京等并驾齐驱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难度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非经济的要素。

上海还是个"经济动物城市"

《瞭望东方周刊》：非经济的要素？这就是你曾提过的上海还是个"经济动物城市"的原因吗？

诸大建：说上海是经济动物城市，只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目的是描述上海城市发展的经济思维仍然太重。重要证据，首先是这个城市的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接近30%，人均建设用地的结构是一少三多，即工业用地多，居住用地、生态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少。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目标城市相比，上海仍然是一座有世界城市味道的工业城市，而不是服务经济时代的伟大城市。

其次，不管总量还是人均，上海称得上是今日中国和世界的能源吃客和碳呕吐城市。化石能源吃得多、二氧化碳排放多，不是因为普通百姓的交通和居住已经过度奢侈，而是上海的工业生产规模和相关用能大大超过了世界城市的水平。

过去20年上海一直是以"四个中心"为目标在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大家讨论上海的改革发展战略，当时的目标就是上海要走出工业，要搞商业和贸易；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家发展的引擎从广东转移到上海，所谓"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上海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发展大讨论，制定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发展目标。到了21世纪初，上海取得世博会主办权以后，再一次进行改革发展大讨论，虽然有一些新的内容，但是重点仍然是建设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即四个中心。可以说，过去30年的上海城市发展的三次大讨论，主线都是经济。

事实也果真如此，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的道路上成果显著。用定量的、可国际比对的证据评估上海过去十多年的城市发展，有一万个证据证明上海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在上升，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排名已在世界前十几位，最好的情况是世界前六七位，这证明上海建设世界经济城市的步伐是有力的；但是宜居、环境、文化等方面，常常落在国际排行榜的近100名，甚至更后面。

两者落差之大，证明上海离成为世界伟大城市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如果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思路仍然停留在前三次的线性延长线上的话，那么这样的发展就只有小数点上的改进；而要有升级版的、非线性的思考，就要超越"四个中心"的目标，要对整个



诸大建

“说上海是经济动物城市的重要证据，是这个城市的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接近30%，人均建设用地的结构是一少三多，即工业用地多，居住用地、生态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少。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目标城市相比，上海仍然是一座有世界城市味道的工业城市，而不是服务经济时代的伟大城市。”

城市的综合质量进行思考。

中国城市存在的四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工业占比过重和能源消耗大，不只是上海的问题吧？*

诸大建：对。说上海是经济动物城市，是强调上海不能仅以经济成绩去参加世界城市的竞赛。其实，中国城市几乎都存在四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工业占比过重。就全中国来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在52%左右，工业化率为47%，把这两个数字相除，就可反映城市发展是否匹配。世界上的标准，城市化除以工业化的比率，基本上是1.9或2.0，换句话说，应该是50%的城市化，25%左右的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后半期，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属于反向运动的。而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高达47%，说明城市都是工业偏重。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市都是属于传统能源推动的城市。国外从传统的煤炭换到了石油，又换到了天然气，能源越用越清洁。但是中国能源禀赋先天存在不足，没有那么多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只能依靠煤，在国家和城市发展的能源结构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城市还在透支土地。中国法定的城市人口与建设土地配比为人均100平方米，这个数已经比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高。但是现实中，中国城市发展大多超过这个指标。以上海为例，建设用地已经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2400多万，换句话说，上海现有的人口规模透支了600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而3000多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占了1000多，工业用地相对便宜，这导致了城市的不断扩张。

第四个问题是非经济部分没有伴随经济增长有同样足够的发展。比如，老百姓都知道上海城市发展强调“四个中心”建设，这是经济维度的，但是社会、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战略是什么，看起来没有像经济建设那样足够清晰、振奋人心的目标、重大项目和政策举措。

过去30年，大多数情况下上海走的是成本竞争道路，通过人力、土地、资源环境的低价格来招商引资发展城市。现在这样的条件已经没有了。对于上海当下和未来的转型，我喜欢引用美国城市经济学家Florida说的一句话，以前是People follow business，现在需要Business follow people。我们不能靠老套的基于成本的政策优惠，而是需要创造更好的“地点质量”。换句话说，即使上海要建设成为四个中心的世界城市，也越来越需要依赖城市发展的地点质量。

上海如何成为一座“伟大城市”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希望上海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诸大建：2010年以来，世界上一些重大城市，比如纽约，伦敦、东京、香港、巴黎都在反思并且升级自己的城市发展，纽约就提出到2030年要建设成为“更伟大更绿色的城市”（Greater and Greener New York）。

我的观点是上海也要建设“伟大城市”。这个“伟大城市”就不仅仅是个“经济动物城市”，不能只讲“四个中心”的建设指标，而是要有超越，要有可持续性城市四面体的经济、社会、环境、治理指标。

更贴近生活的做法，是伦敦2030规划提出的宜居型世界城市的四个方面，或我常提到的科特勒城市营销的“四个可”，即城市的可就业性、可居住性、可旅游性、可出行性。

然而，上海当前的转型升级看起来仍然对后者考虑不多。“四个中心”和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1999~2020”中同时提出。前者是建设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后者是建设综合意义上的伟大城市，本来两者应该互为因果，同时促进。但是过去15年，“四个中心”建设内容清晰、项目有力，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却内容单薄、无法匹配。直到2012年上海写党代会报告才有24字的简单界定，但是没有对应的内容与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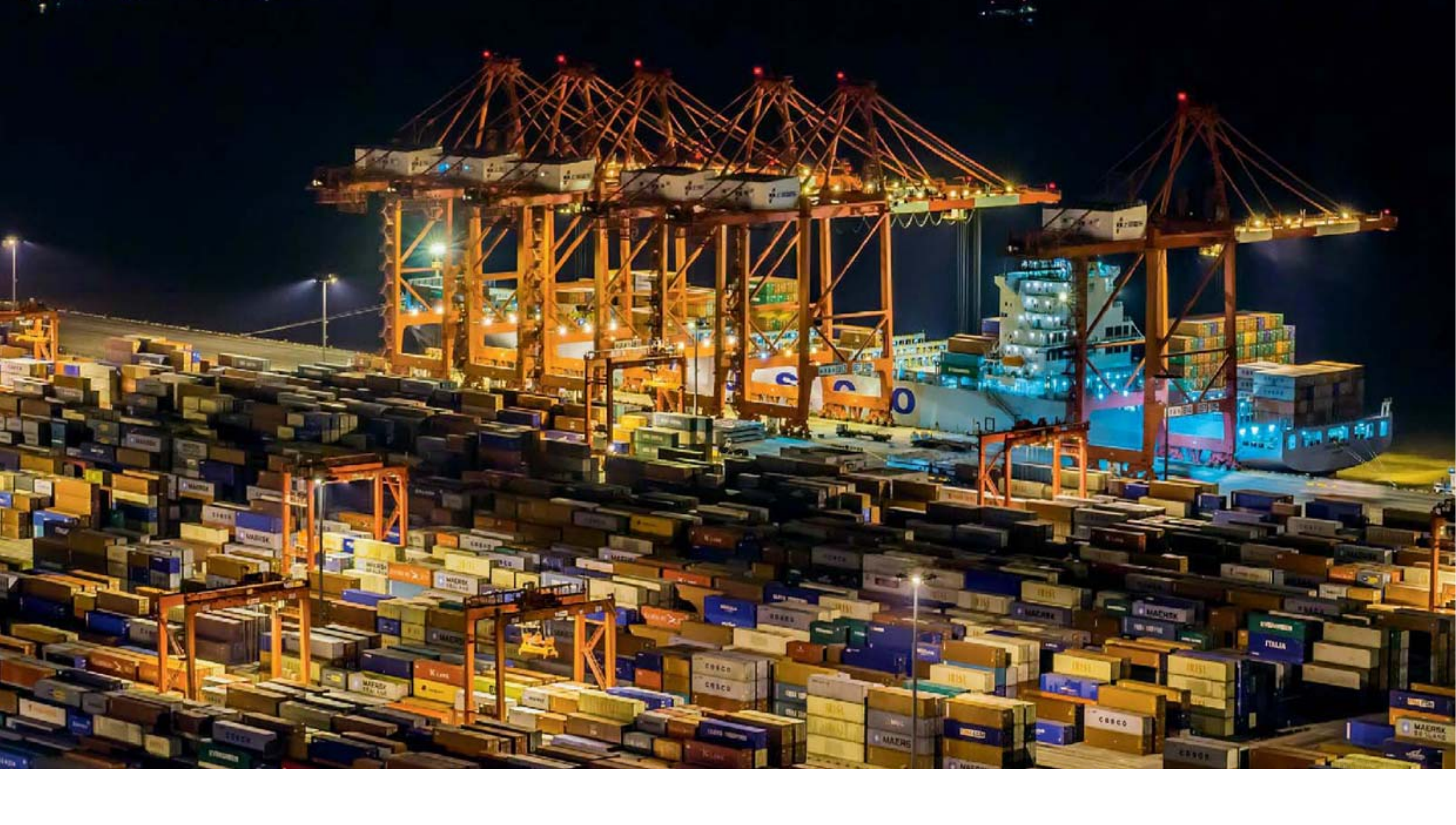
按照经济大小和伟大与否，城市有四种类型。大多数城市不需要经济很大，也不需要伟大品格，宜居宜业宜行即可；一些城市有伟大品格，但经济上不一定有世界意义；一些城市是世界经济城市，但不一定有伟大品格。

但是对上海而言，仅仅成为世界经济城市是不够的，人们更希望她成为世界经济网络中的“伟大城市”。因此，未来10~30年，上海需要实现四个中心目标，但是需要包含在更高目标之中。十八大以来，高层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上海其实是可以很好地融入城市发展战略思考和政策实施之中的。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该如何成为一座“伟大城市”？*

诸大建：上海建设“伟大城市”，不是不要“四个中心”，而是要超越“四个中心”。建设“四个中心”是上海建设伟大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在，上海城市发展的不足是把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同于“四个中心”建设，淡化了相匹配的其他维度的城

东方IC



▲ 2014年1月6日，上海洋山自贸区港，夜晚海域各国的集装箱轮船航行，港区集装箱车辆进出不断，一片繁忙景象

市建设。

其实，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国际级的经济功能，另一个是基础性的城市功能和城市质量。与国际上目标城市作比较，重经济竞争力轻城市发展质量是上海转型升级要解决的问题。

换一种说法，建设"四个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建设宜居城市，是自下而上的民生战略。两者是可以并且需要互相促进的。理论上，中国城市应该对上下都负责；实际上，制度压力使得城市发展更多是对上面负责。这可以解释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发展为什么是经济重于民生。可以理解，上海的转型发展只有建立城市、国家、市民的合作治理机制，才能走出"经济动物城市"的现状。这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致的。

一句话概括，上海建设"伟大城市"，就是要成为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匹配的城市。

在经济维度上，金融、航运、贸易三个中心属于服务业，但经济中心含义仍然模糊。我认为，经济中心应该指有战略意义的制造业，这是上海区别北京和香港的竞争优势。即使上海未来提高服务业到70%左右，仍需要保留25%~30%的先进制造业，为上海研发能力转化提供加工制造的基础。

在社会维度上，上海不能用"四个中心"的名义排斥劳动密集型的人口，从传统上的海纳百川退化成为非包容性的城市。在上海的人口与社会发展中，一直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说要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控制劳动密集型人口。这对上海发展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其实，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

在资源环境维度，上海不能一方面"四个中心"的功能比肩世界前十，但另一方面城市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却远远高于纽约、伦敦、东京。要运用资源、环境、生态等红线进行调控和倒逼，既实现资源环境消耗的压力得到抑制，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达到这些目标的路径是要实现四个"倒U"型转型。具体而言，一是去传统工业化，服务业达到70%，保留先进制造业；二是去城市蔓延，形成市域城市集群，要准备容纳可能有的最高3000万常住人口；三是去小汽车化，让轨道交通承担城市的50%以上出行；四是去行政化，政府全口径财政收入不超过40%，财政支出更多地转向民生和公共服务，实现城市合作治理。

中国的城市化要走城市集群的道路

《瞭望东方周刊》：*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你认为上海城市发展更像什么模式？*

诸大建：把6340平方公里上海市域直接与纽约、伦敦、东京比较，是一个误区。中国城市与国外城市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行政区，后者是建成区。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的地域面积像上海这么大，纽约、伦敦都没有。

世界上城市发展的模式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城市，人少地多，美国的典型城市不是纽约，而是洛杉矶、休斯敦，都属于空间很大人很少的城市，这种城市中国根本不可能效法；第二种是欧洲的城市，他们很少特大城市，多数都是几十万人口的中型城市，高速公路开上一小时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城市，城市的

中国要走第三条道路，不同于美加澳，也不同于欧洲的类型，要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城市集群，建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空间紧凑的城市群，这需要中国自己探索。

发展是很均衡的，这种类型中国限于自己的空间特征也无法学；第三种就是亚洲城市，东京、香港、孟买、曼谷，人多地少，城市密度特别高。

所以，中国要走第三条道路，不同于美加澳，也不同于欧洲的类型，要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城市集群，建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空间紧凑的城市群，这需要中国自己探索。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中国要大力发展城市集群？*

诸大建：在我看来，这是与中国国情相吻合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集群发展要区分三个不同的级别。最高一级的城市集群是跨省的，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是最高一级的。中国未来要发展5到7个这样的城市群，要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行增加，比如成都－重庆，武汉－郑州－长沙，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如果每个城市群都能吸收1亿以上的人口，那么中国50%以上的人口就可以消化在大城市群中了。

第二级的属于省域范围内跨城市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及周边的中小城市，如杭州－绍兴－湖州，南京－扬州－镇江等。

最小一级的就是城市行政区内部的，比如上海、北京在市域范围内，要发展多中心的市域城市集群。上海过去20年重点发展了600多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及其延伸区，未来要在6000多平方公里的郊区范围内发展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郊区二级城市。

目前，最高级和二级城市集群的骨架基本上都有了。但是最小级别的城市集群还没有，上海也还没有形成。等到2030年左右，最小级别的城市集群建成，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就差不多完成了。

未来上海应该走市域城市集群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认为上海要如何建设城市集群呢？*

诸大建：就上海而言，应该建设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主的城市集群。城市集群不是随便发展的，上海城市空间发展需要考虑三个腹地关系：一是半小时交通半径内中心城区与郊区城市的关系；二是1小时交通半径内与周边的苏州、嘉兴等城市的关系；三是3小时交通半径内与长三角城市的关系。

这个半小时、1小时以及3小时交通圈靠什么？高铁和地铁。所以我说，中国未来是“两铁”引导的城市集群。换句话说，城市内部（一个城市行政区域内）是地铁和郊区铁路，城市之间是高铁，包括城际高铁和大城市圈之间的高铁。

上海建设市域城市集群，特别要注意郊区城市的定位。郊区城市是中心城区的依附，还是独立的城市？这是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新城建设的目标应该是功能齐全的、独立的城市，而不是依赖中心城区的单功能城市或所谓卫星城市。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建设多中心的市域城市集群，而是城市功能的进一步蔓延。

上海只有在周边建设了多中心的城市群，把人吸引住，形成所谓反磁力中心，中心城区的压力也就分解掉了，人口和社会发展也就会很均衡了。这就是未来上海应该走的市域城市集群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发展城市集群，会不会使得更多的人涌进来？*

诸大建：国际上大城市的发展有一个经验性的现象，建设用地占土地的1/3左右，整个空间应该由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建设空间组成，人的生活就比较舒适。而现在上海的建设土地已经用掉一半了，所以政府开始控制建设用地，同时开始控制人口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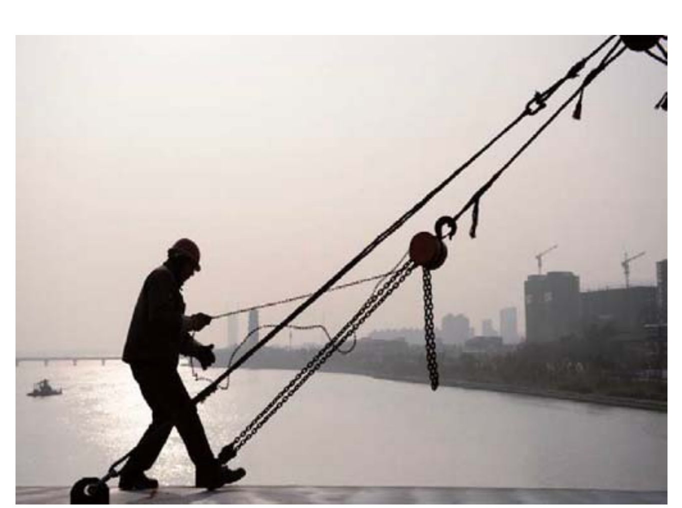
控制建设用地滥用当然是对的，但是在上海这样大的市域空间控制人口则存在争议，而且以行政手段其实是控制不住的。

只要内地没有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有吸引力的城市，只要重要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建设仍然集中在北上广，人口和人力资源就仍然会向这三大城市集中流动。只有成都、武汉等中西部城市发展成上海这样的城市，把人力资源吸引住了，上海北京的人口压力就小了。但是要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发展出一些可以跟上海北京广州差不多的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是有难度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像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比如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也应该现在就规划建设城市集群么？*

诸大建：一个城市的发展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最初，城市总是像原子核一样进行吸集，比如现在的重庆、成都、武汉等，这些城市的中心城区要有一定程度的扩张；而像上海、北京等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外辐射并且转移，发展二级组团，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城市集群。

所以，现在东部应该大力发展围绕中心城市的中小城市集群，而西部应该大力建设有吸引力的大城市。这是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战略。



江西省上饶市是一个有两条高铁交会的地级城市，图为2013年1月23日工人在上饶龟峰大桥上施工



被高估了的高铁新城

京沪高铁线上已建、将建的新城，近20个，几乎是一站一新城

文 | 冯奎

春节假期，探亲访友，来来回回乘坐了数次高铁，经过几个高铁新城。

京沪线上的一个高铁站，离市区 25 公里。出了车站，打车 30 分钟。这 30 分钟路程，一路畅通。沿路两侧，隔一段就有大幅的广告标语牌，刊登着招商信息。远处稀稀拉拉是几个没拆净的村庄，一片绿油油的麦苗长在了现在的建设用地上。

当地朋友说，这块地几十平方公里，规划工业、旅游、商业、现代农业等项目，规划人口三十多万。

后来我又看了一座高铁新城，情况类似。这些加剧了我对高铁新城的怀疑态度。这两地，高铁站修建已有三年。三年间高铁新城的建设除了拆迁、征地之外，带动了周边房价上涨之外，实质性的项目与效果并没有多少。

三年前我想，谁会冲着高铁新城而去？三年后，我依然觉得，我们的雄心太大、目标太高，高估了高铁新城的美好前景。

一是高估了人流与人留。当初京沪高铁修建通车之后不久，主要因为客流量不够，停运将近 1/3 的车次。一些高铁站，平时日均一两千。这一两千人多数是回老城探亲访友。就算是来旅游，那也是到老城去看看古迹，高铁新城还是空城一座，能有什么让人留下来？

二是高估了一厢情愿的吸纳资源的能力。某地方领导给我看了规划图，都是画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沿着高铁新城向当地的新城集聚的粗粗的箭头。他们回避了另外一个方向的箭头，即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可能沿着高铁新城，从当地向大中小城市的集聚。春节过后，50% 的人还是希望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就业，1/3 的人希望到二三级较大城市就业 —— 这个事实反映出当前生产要素的基本流向。

第三，高估了历史经验的作用。一些领导跟我讲，历史上看，远的像大运河、近的像津浦老铁路这样的交通大动脉为城市兴起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历史不能重演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些似是而非。大运河当时经过的许多城市，本已有一定基础。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条大运河、老铁路足以改变整个经济地理格局。

现在的问题是，城市既已形成，已有了自我进化的惯性力量。一些地方有意撇开老城，跳出几十公里再去规划新城。这恐怕不是尊重历史规律，而是想在短时间内与伟大的历史演化进程较劲，与老城巨大的发展惯性较劲。

四是高估了本地的独特优势。不少地方制作的高铁新城规划，都强调本地历史、地理、人文、经济等等方面与高铁相结合之后，所产生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他们认为这种优势足以让当地的高铁新城产生绝对占上风的竞争优势。

但要看到，现在全国新城成风，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 1.5 个新城。京沪高铁线上已建、将建的新城，近 20 个，几乎是一站一新城。京广高铁也是这样。按照“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提出，快速铁路网覆盖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沿交通干级还要出一批新城。如此下来，高铁新城怎么才能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此外，行政力量的推动作用同样被高估。一些地方领导说，别看现在高铁新城空空荡荡，我们有办法。这个办法，主要就是大集中，也就是通过行政力量，推动人口向高铁新城的新建小区集中、产业向高铁新城的园区集中。

这些方法，效率高，但问题也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均提出，要发挥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政府之手应有所节制和约束，这种建设新城的思路是否有悖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方向呢？

如果能够清醒地评估各种因素，量力而行，建设一个紧凑型的高铁新城，那么高铁新城值得期许。但不顾现实条件搞出来的高铁新城，前景不容乐观。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2014年1月13日，长沙市望城区一施工现场，一名工人用电锯切割砖块

江亿院士：必须控制城市建筑总量

能源消耗总量受到全球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限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约束条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吴铭 | 北京报道

虽然对于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多有指责，但中国工程院的重大咨询项目报告具体警告说，能源消耗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问题之一。

由中国工程院钱易、唐孝炎、江亿三位院士主持的“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课题——中国工程院“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重大咨询项目中的一部分——认为，如果不在2020年前对以建筑为主的多种城市能耗进行严格控制，不仅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将大大反作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影响中国城市的“生命”。

能耗问题，可以说是资源消耗、环境消耗的具体量化体现。江亿院士日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必须进一步把建筑面积总量纳入官员考核体系，才能严格约束城市的能耗增长。

城镇建筑面积上限400亿平方米

《瞭望东方周刊》：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或者说城镇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建筑增长迅速，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江亿：随着经济发展，各地大中小城市拓展城区建设，大量的建筑投入施工，城镇建筑面积大幅增加，建筑速度逐年攀升。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城镇建筑面积从约110亿平方米增长到约220亿平方米，短短10年时间就翻了一番。

目前我国钢材、建材产量持续增长，主要为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所拉动。2009年钢材与建材产品占我国制造业能耗46%，其中一半以上是城镇建设需求所致。

其次，目前城镇建筑使用状况和发展状况极不均衡，尽管仍有部分居民居住条件有待改善，但却有相当多的居民把住房作为投资手段，造成大量房屋的实质性空置。尽管一些公共设施和学校的条件还有待改善，但已有过大的政府办公建筑、企业办公建筑、交通枢纽，过量的商业设施、过量的建筑是资源、能源、土地的非理性挥霍，而且还需要依赖能源消耗来维持运行，但并不能给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任何实质的促进。

第三，新建建筑速度大大超出人口城镇化速度的需求，大量空置房屋——无论是居住建筑还是商用建筑和过高的房价随时可能导致楼市崩盘。

同时，过高的购房压力与“住大房”的文化严重抑制了城市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从而造成我国长期内需不足，尤其压抑了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各类人均资源大多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看，我国很难依靠大量进口满足各种资源需求，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房屋建设是高资源消耗型产业，我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走欧美国家的模式，而应该参照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模式。

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包括住宅和非住宅的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在内的人均建筑面积都在40平方米左右，我国只能低于这一数值，即应该控制在40平方米以内。按照未来14.71亿人口峰值计算，总的建筑规模应为600亿平方米。

如果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城镇人口达到10亿，城镇建筑总的规模约为400亿平方米，这是建筑面积应该严格控制的上限。目前我国城镇既有建筑总量约为270亿平方米，如果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每年竣工20亿平方米，拆除3亿至5亿平方米，净增15亿至17亿平方米，则只需8年就将达到这一建筑总量的上限。

建筑规模增长危及多方面安全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江亿：造成当前“疯狂造楼”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房屋已经成为投资的手段。如果按照目前城镇化率每年增长1%的速度，假设每年农转非人口1000万，按人均建筑40平方米计算，每年只需要增加4亿平方米城镇建筑。然而，目前每年新建建筑面积已经大大超出了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所需要的建筑量。

其次，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驱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显示，多数地方政府靠出让土地使用权，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推动下，各地政府竭力推动土地使用权交易，抬高土地价格。

另外，由拉动虚假的GDP和地方经济繁荣所致。房屋建设发展是我国近年来直接和间接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动力。房屋成为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拉动经济发展的手段。

再者，是维持钢材与建材业发展所致。城镇化建设推动了钢材和建材业的发展，我国在2000年钢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现在中国钢产量世界第一，河北省世界第二，唐山世界第三，美国世界第四，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华北地区持续出现这样严重的雾霾。

然而，这样庞大的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城市

对我国主要城市的生态足迹分析，发现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江亿

如果中央不实施有效的严厉措施将其刹住，造出更多的“鬼城”、“空城”，将给中国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将把全社会的财力都集中到不是真正需要的房屋上，将极大地抑制服务业，阻碍产业结构调整，更将加剧我国的能源紧缺和碳排放持续增长的状况。

建设——房屋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巨大需求来支撑。当钢产业成为地方经济主要支撑时，为了保证钢材和建材业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又将压力转向了建筑业，促使更多的建筑项目开展。这样不断地相互刺激增长，钢材和建材业与建筑业正反馈发展，势必导致资源枯竭，前景非常可怕！

还有一个是错误消费观念的引导。无论是老百姓、设计人员、政府，都觉得人们生活要改善，居住面积就要增大，房屋电器配备就越齐全，其实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不可能像美国、加拿大那样，都住大房子。对于中国来讲，人均居住面积决不是越大越好，各类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决不是越多越好。

建筑面积增加，最直接的就是减少耕地面积，对耕地红线造成冲击。

城镇外延扩张造成稀缺土地过量消耗，1990年至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近2.5万平方公里。过高的建设用地比例，导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土地供需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和布局严重不合理。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两者之比大大高于1:1.23的正常水平，既未能形成新区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又减少了大量的宝贵耕地。值得关注的是，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并未出现相应减少的趋势。城镇化对土地的占用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导致农村播种面积连年骤减。就国家粮食安全高度而言，我国粮食自给率现已跌破90%。

从能源角度来讲，现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均排放量也已超过世界人均排放量。在国际谈判中我国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给予的压力，也开始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所以，中国的节能减排任务很重。

持续高速建设的城镇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钢铁业建材业的同步上涨，是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同时，建筑运行消耗的能源及碳排放与建筑面积成正比，建成规模越大，建筑运行能耗越高，且无法逆转。因此建筑规模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具有不可持续性，必须改变当前“疯狂造楼”的现象。

建筑能耗增长10年不能超过20%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建筑能源消耗问题的严重性？*

江亿：能源消耗总量受到全球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限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约束条件。

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建筑存量增长近50%。与此同时，建筑运行能耗总量随之增长近一倍，而建筑能耗水平也在持续增长。

根据2005年中国工程院的研究报告以及我国能源供应能力来看，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量不应超过40亿吨标准煤。

但在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36亿吨标准煤。如果要按照不超过40亿吨标煤的规划目标，今后10年内我国节约能源的任务十分艰巨。

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工业用能量约占国家总能耗的65%以上，应维持工业用能在目前基础上增长不超过10%。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交通用能仅占全社会总能耗的10%左右，无论从用能比例还是人均交通用能，都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水平。随着现代化发展，交通用能比例一定会有所提高，但不应超过目前的2倍。

现在，我国建筑运行能耗一直维持在社会总能耗的20%至25%。在保证我国各部门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情况下，未来建筑能耗最多也不能超过社会总能耗的25%，即10亿吨标准煤以内，这一用能总量不包括安装在建筑物本身的可再生能源。

但是用2012年的数字看，现有建筑能耗已经接近7亿吨标准煤的商品能耗，还要再加上相当于1.2亿吨标煤左右的没有纳入到商品能源范围的农村使用的生物质能源。这样，我国今后10年内可以承受的建筑运行总能耗的增长幅度不能超过20%，考虑到目前建筑总量的持续飞速增长，能否实现这一控制目标将是严峻的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在建筑规模增大之外，我国建筑能耗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有什么？*

江亿：由于目前建筑节能工作更多地是考虑提高能效，也就是提高各类用能系统的效率，但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建筑服务标准，如照明水平、空调水平、建筑辅助设备水平（如电梯安装量）等，二者综合，实际用能量还是有所增加。例如，一些高档住宅采用高效的“恒温恒湿”中央空调，其用能效率很高，但相比大多数住宅使用的分体空调，单位建筑面积实际的空调用电量几乎高出10倍。这样的“先进技术”与“高效”的使用就造成实际能耗的大幅度增长。

此外，就是近年新建的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大多为“大体量”、“超高层”、“高档次”建筑，采用中央空调方式，全密封不可开窗，通风、照明、冷热等环境需求完全依靠机械系统通过消耗能源来提供。这类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单位面积的能耗是以往普通商业建筑能耗的3倍至5倍。当前，各地大规模兴建超高层建筑、大型综合商厦、大型交通枢纽（大机场、大型高铁站），这将进一步推高公共建筑、商业建筑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其次，随着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用能设备拥有量大幅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例如，10年前城市居民很少有生活热水，但现在生活热水普及率已超过8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住建筑的能耗强度。

我国目前城镇单位面积建筑运行能耗还只是美国的40%，是西欧、北欧国家的60%，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建筑使用模式与理念来发展我国的建筑，那么单位面积的建筑用能还会翻番，再加上建筑总量的翻番，我国建筑运行总能耗就会从目前的8亿吨标煤增加到32亿吨标煤，几乎为目前全国的能源消耗总量！

主要城市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建筑问题恐怕只是当前我国城市能源消耗的一个缩影，你如何评价当前我国城市的能源问题？

江亿：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我国居民消费的全流程能耗为9.7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43.3%；全流程能耗是直接能耗的4.15倍，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全流程能耗也要比直接能耗高出33个百分点。从那时到2030年，居民消费的全流程能耗将增长1倍多，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3%左右，是未来能源需求总量增长的重要领域。

同时，2005年，我国居民消费全流程能耗的全生命周期污染物排放量中，CO_2排放量、SO_2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分别占全国CO_2、SO_2、烟尘排放总量的49.3%、47.4%、42.2%。由此可见，城镇居民消费全流程能耗带来的环境影响也不可忽视。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自1990年以来的物质代谢规模较大，且主要依靠于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并伴随着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宏观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对物质代谢数量规模的影响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系统的物质代谢效率较低。



▲目前我国钢材等建材产量持续增长，主要为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所拉动，图为2014年1月3日，山东青岛一货运码头工人在装卸钢材

也有研究显示，中国的生态足迹与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依赖关系。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与省份层面的截面数据均显示：城镇化水平高、人均生态足迹也高。城镇化对生态足迹的驱动作用，主要缘于收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消费规模扩大和奢侈消费的蔓延。对我国主要城市的生态足迹分析发现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在空间布局上，我国不同省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生态足迹间的关系也差异显著。城镇化率所带来的生态足迹的增加对城镇生态承载力产生了巨大的甚至过量的负荷。因此，降低生态足迹与生态赤字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除了建筑，目前比较严峻的还有交通耗能问题。从2009年到2011年，短短两年时间人均交通能耗增长近25%。

交通能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小汽车拥有量的显著增长，以及人们出行量的增加。对比各国小汽车拥有率的发展历史，我国还处在较低的水平，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拥有率。

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之外，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将有大量的汽车投入使用，这对于交通能耗的增长，无疑有巨大的驱动作用。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空闲时间的增加，各类非生活与工作必须的出行量也会明显增加，更加刺激交通能耗的增长。



▲ 更多的"鬼城"、"空城"，将给中国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图为2012年12月16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一座工地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说，能源消耗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江亿：城镇化将改变人的生活模式，传统模式的城镇化导致建筑运行和客运交通能耗迅速增长。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点、打好预防针，不能通过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抑制建筑运行和客运交通能耗的增长，就会由于非制造业领域能源需求的过量增长形成能源供应严重不足，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因此，能否实现低能耗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到我国城镇化的成败。

必须控制建筑总量

《瞭望东方周刊》：以建筑能耗为例，你认为解决当前城市能耗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江亿：针对建筑总量无控制规划，建筑量高增速的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宏观调控：

首先，严格控制我国建筑总量，明确各地建筑发展规模。从人均建筑面积约束出发，我国未来城镇建筑面积总量不宜超过400亿平方米。各地政府应根据未来人口规模明确建筑总量，制定建筑量控制规划，并严格执行。

其次，逐年减少新建建筑量，稳定建筑业及相关产业市场。在城镇建筑总量控制的情况下，逐年降低新建建筑开工量，由目前的每年约20亿平方米的竣工量通过10年到15年时间逐渐降低到每年竣工6亿至8亿平方米，与拆除旧建筑量平衡。

第三，开征房产税，遏制购房作为投资手段。

我认为，我国人均建筑面积、包括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商业建筑不应超过40平方米，住建部之前曾提出每户建筑面积控制在90平方米，现在这两个都突破了。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笼系列的、全面的政策、法规，对住房总量、各类房屋建设总量进行合理控制。同时，要让大家接受这样的概念，也需要宣传教育。

无论经济怎样增长、生活水平怎样提高，我们只能在目前的人均建筑用能强度下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善室内环境，进一步满足居住者需要，而不可能因为未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允许人均建筑能耗大幅度上涨，这是中国建筑节能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目前最急迫的任务不是控制建筑用能总量，这是长期的艰巨任务，而是控制建筑总量！立即刹住各地仍在火爆中的造楼运动。

如果中央不实施有效的严厉措施将其刹住，造出更多的"鬼城"、"空城"，将给中国经济背上沉重的负担，将把全社会的财力都集中到不是真正需要的房屋上，将极大地抑制服务业，阻碍产业结构调整，更将加剧我国的能源紧缺和碳排放持续增长的状况。

因此，从文化上，形成占房多可耻的负罪感；税收上，加快物业税等相关税种的实施，形成"谁倒房谁破产"；政策上，各级政府形成严格的房屋审批制，对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一律实行总量控制；干部考核上，按照建筑总量超标状况问责。

如果把建筑总量控制纳入对各级地方官员的干部考核体系，也可能促进"鬼城"问题的解决和避免更多地"鬼城"出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标体系，过去是唯GDP，现在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都列入考核政绩的指标体系。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个考核体系不容易建立。中国也做了很多，困难之处在于量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减排、节能等一些约束性指标都已经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但是人们的观念，包括各级领导、老百姓，还是直观地看经济增长比较多。

但是，可以看到政府换届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得赞成票最少的部长是环保部部长，这说明人们的环境保护的意识已经逐渐加强，但是落实到领导怎样对待，还需要一段时间。

东方IC



曾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于2014年2月6日去世。图为2013年11月8日，马胜利在河北石家庄家中

"改革第一人"和他们的悲喜人生

如今，80岁的步鑫生仍在上海，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出门会友，他不愿意回到海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北京报道

2014年2月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位76岁的老人去世，他叫马胜利。这位曾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离世之际，不少市民自发地为他送行。

人们大都记得他光耀的时刻，却似乎忘记马胜利退休后曾与妻女4人拥挤在两间陈旧狭小的平房、每月领130元退休养老金的艰难日子。

马胜利的辞世，也勾起人们回想起当年各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人”：年广九、鲁冠球、步鑫生、杨嘉兴……在那个启动中国大变革的岁月里，他们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时代的弄潮儿，甚至成为领导人的座上宾，全因为在惊涛骇浪的改革大潮中，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第一”的光辉历史。

这是一些被改革改变命运的普通人，也是促发改革的不平凡者。

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搏击于发展大潮，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不同轨迹。

当他们走上改革之路的时候，也许没有料想过会遭遇怎样的起伏和变化莫测。

好几个人，正如马胜利，就是在市场中折戟。不过，还没人抱怨想回到过去那种轨道式的生活。甚至只要有机会，就像杨嘉兴，仍然想用新的“第一次”改变自己和这个国家。

习近平说，中国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经完成。看起来，解决“难啃的硬骨头”，也需要另一代人的努力。

“第一人”和他们的“贵人”

年广九和马胜利上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场合，是2008年。当时广东一家媒体搞了个“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的评选，年广九和马胜利的名字挨在一起，前面是杨利伟、后面是柳传志。

“风云”，的确是形容那段时间年广九的最确切词汇之一。“当时我家里钱多得用麻袋装。”年广九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下雨的时候，他要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晾晒，防止钞票发霉。

人们给予年广九的称呼是“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专门解释了他的“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979年注册“傻子瓜子”，使年广九成为首位登场的“改革第一人”。这一年，宁国公社农机修配厂厂长鲁冠球开始生产汽车万向节。

其后是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1982年，刘永行四兄弟筹资1000元人民币，辞去公职到农村创业。



年广九

1984年，业务科长马胜利请求承包石家庄造纸厂。同在这一年，柳传志与其他10名计算所员工以2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后来的联想公司。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

1984年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破天荒地提了出来。

不过，年广九在这一年第二次入狱了。

年广九曾在1980年以“投机倒把罪”第一次被抓捕。第二次的罪名是“牛鬼蛇神”。具体说，就是年广九偷偷雇佣了100多个帮工的事传了出来。

邓小平说：“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对邓小平，年广九一直心存感激：“那时候都是国营企业，不允许搞个体经营，要不是邓小平支持我，我关在牢里现在还出不来。”

年广九那时候不知道，国企改革也牵扯坐牢的事情。

这一年3月28日，河北省石家庄造纸厂前，46岁的马胜利正在张贴《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在市领导的支持下，马胜利的大胆之举如愿以偿。这家连年亏损的造纸厂在承包后第一个月，利润就超过21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

大获成功的马胜利被媒体冠以“马承包”之名，他本人不是在演讲，就是在去演讲的路上。作家高峰在《马承包新传》中记录：“他谈笑风生，话语幽默而又风趣，会场内外鸦雀无声，听得人们如痴如醉，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竟无一人走动，有人憋着尿也不去厕所。”

“马承包”在石家庄的出现不是孤例。彼时，石家庄以“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而闻名全国，除了“马承包”，还有3个企业家被称为“张联合”、“夏服务”、“许引进”，并称石家庄经济改革“四大名旦”。

所谓“撞击反射式”改革，来自新华社记者的一篇通讯。这篇报道总结了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的话：“承包就像是一块石头，我们把石头砸到水面上去，就会有波纹，波及到哪里，我们就改到哪里。”

时任石家庄市市长王葆华后来回忆说：我们成功的关键是，抓住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比如“马承包”，我们抓住了，这样，改革的信心和胆量就逐步积累起来了。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改革的要求，马胜利



1980年，鲁冠球（左三）在车间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一起检验产品

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说到根本，也是因为有想做一番事业的“贵人”在支持。

破例的支持

步鑫生在浙江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是这样的：率先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员工们做多少衬衫，拿多少工钱，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

对于这次改革，浙江省派出了联合调查组。1984年第13期《瞭望》周刊的封面报道说，“省委联合调查组到他们厂里来了，在这个小小的古城里，对他的褒贬毁誉，也达到了高潮。指责和否定他的言论，甚至见诸报端，传播到外地。更多的人暗地为他担忧，亲朋好友也前来劝说：‘不要再搞什么改革了吧’。”

省领导在听取联合调查组汇报后，支持了改革。很快，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破例就《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一文加了按语，并在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

其实，早在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对步鑫生事迹亲自批示：“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马胜利也表示：“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

1984年，杨嘉兴也成为企业负责人——温州环南机电厂的厂长。他是厂长，也是技术员和供销员。上任后的第一年，杨嘉兴就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但是工厂因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

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时被拒绝：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

此时环南机电厂已经骑虎难下，杨嘉兴只好以高利息向社会举债。

这件事后来使杨嘉兴产生了办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两年后，他与另外7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第一家中国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并因此成为“第一人”。

但是市场经济还未真正到来，“第一人”们已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开始“呛水”了。

呛水的故事

1986年，年广九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有奖销售，头等奖是一辆上海牌轿车。“国务院忽然来文件，停止有奖销售。”年广九说。全国各地纷纷来退货，瓜子全部霉烂，公司亏损60万元。

步鑫生的厂子则在1984年埋下了隐患。当时浙江兴起了“西装热”，步鑫生一开始只想小试一下，搞个6万套的生产线，没想到一位厅长对他说：“你是步鑫生，要搞就搞全国最大的，起码30万套，

但是市场经济还未真正到来，“第一人”们已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开始“呛水”了。

三年后 80 万套 !”

“是我顶不住压力。”步鑫生曾对媒体表示过对当年决策的懊恼，如果没有那 30 万套西装，此后的结局可能截然不同。生产线还没铺完，“西装热”早已烟消云散。加上当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政策，生产材料全部涨价，衬衫总厂入不敷出。

1987 年底，省里调查组来调查，次年步鑫生就因管理不善被免职。“我是从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的。”步鑫生说。

没有人与他谈过话，也没有在厂里宣布过。这甚至比马胜利的 5 分钟下岗更为残酷。

步鑫生后来自嘲：“1988 年事情多，火车相撞，飞机坠毁，闹洪灾，还有就是：我被免职了。”

也是在 1988 年，鲁冠球给身无分文的步鑫生汇了两次款，一共 500 元，以接济刚刚被免职的步鑫生。

步鑫生感激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冠球和其他企业家朋友帮了我。”对于步鑫生的经历，鲁冠球一直有些愤愤不平，在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允许失败，这怎么干？谁还敢探索？”

鲁冠球在 1983 年对镇政府主办的万向节厂实施了产权改革，因此被誉为“中国产权变革第一人”。到 1988 年，鲁冠球以 1500 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使企业真正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

这一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要“在全国承包 100 家造纸厂，打造中国纸业托拉斯”。

马胜利这时把对外承包的步子加快，有时“一天看好几个企业、谈个把小时就签下一个承包合同”，一些亏损企业打出了“强烈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横幅。

扩张，也是马胜利在石家庄失败的根本原因。1990 年，他的企业已经亏损 300 多万元。

而杨嘉兴一生难忘的是，就在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前两天，当地人民银行派来两人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

杨嘉兴的两位合伙人因此抽回了资金。连一位打算在这里工作的银行退休会计也打了退堂鼓。

最后是由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给人民银行领导打了电话，指示要让杨试办信用社。

杨嘉兴与董朝才本来并不认识。他在书记可能出现的地方——温州市政府招待所等了一天，终于见到了董朝才。

其实 1985 年起，温州乐清爆发“抬会”案，造成 60 多人自杀，200 多人潜逃，8 万多户家庭受牵连。

承担了如此压力，董朝才仍然支持了杨嘉兴的尝试。他是一个在温州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人。

受领导所托“扭转”温州在 80 年代前期发展私营经济的做法，后来董朝才曾承认，他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到温州履新的。

但是很快，他就站在了“资本主义”一方，拿出了温州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又使他和温州陷入漩涡。

从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开始，私营企业的“口子”终于放开。但一直到 1997 年中共十五大结束，当地党报才说，温州的这场“自费改革”终于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

可改革的未来，其实还难着呢。

不了了之的罪名

1989 年，年广九以“流氓罪”第三次入狱。1980 年、1984 年、1989 年，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九起承转合的命运因此被认为暗合着中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我行得正坐得直，他们就是看不惯我要整我，我就一直抗诉到中央！”年广九说。与被迫退休的马胜利相比，年广九怨气更重。

终于，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因为这番话，年广九最终得以获释。

这前后的某年，成名后的杨嘉兴也被人“盯”上了。司法部门的领导找他，让他交代贪污事实。“我说你们随便查，你们查出我贪污一分钱，我愿意坐十年牢。”查案后，贪污一罪不了了之。

1994 年人们拆除了造纸厂门口“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1995 年，56 岁的马胜利被上级单位的一句口头通知免职退休，全程不到 5 分钟。10 年辉煌，弹指间灰飞烟灭。

退休后的马胜利心里有怨气，更不甘心靠 100 多元的救济金活着。在石家庄火车站北面卖了半年包子后，他开始经营一家纸品售卖公司，销售名为“援旺”牌的卫生纸及“六月雪”牌的餐巾纸，但是这家企业几年后便消失了。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前者与‘冤枉’谐音，后者则有‘窦娥沉冤，六月下雪’之意，其满腔悲愤，溢于言表。工商局不让注册，马胜利却照用不误，他笑说，‘这种名字，除了我，没有人会仿冒的。’”



步鑫生

1994年，由于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中出现问题，如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国务院决定让地级城市陆续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

杨嘉兴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舍不得的”，但终于无法抗拒。随着第二年温州城市信用社组建为温州市商业银行，杨嘉兴进入环保纸张行业。

1994年，鲁冠球闭门三天，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乡镇改革第一人”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因包庇手下、暴力抗法，被逮捕并判刑20年。

禹作敏曾与鲁冠球齐名，也是靠乡镇企业发家，所谓“北有禹作敏，南有鲁冠球”。人们一直认为他们“交情不浅”。

就在禹作敏被判刑的1994年，鲁冠球的万向钱潮在深圳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5年后，禹作敏去世。

这一年，年广九与第二任妻子对簿公堂，主要发生在长子、次子之间的内讧愈加复杂。2000年，年广九突然决定将“傻子瓜子”一股脑儿全部卖给了两个儿子，自己前往郑州开厂。但他希望藉此让两个儿子和好的愿望并未实现。两个儿子仍各自为战。

30年后的希望

2005年11月，年广九的长子年金宝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再次导致家产争夺之战。

谈话中，年广九并不愿意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现在，他将郑州的生意交由第四任妻子打理，自己守在芜湖和平广场的店面里，每天下午去澡堂泡澡听评论。这个店每天的销售额是5000元。

2003年11月的一次知名企业家聚会上，当组织者播放马胜利当年奔波全国的照片时，马胜利老泪纵横。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海决定“伸出援手”，聘请马胜利为新注册成立的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65岁的马胜利穿上了西装扎好了领带，意得志满：“5年以后成为亿万富翁”。

然而，这次“承包”很快便悄无声息，原因不明。多年后，马胜利回忆：“刚开始（汪海）说办一个厂子来，如果办我就想给他帮帮忙，后来也没搞起来。那是国有企业，什么事情也都不是汪海一个人说了算。后来也有朋友让我进他们的厂子帮忙，一个月给几千元钱，我觉得跟个讨饭的似的，也就不去了。”

临终的前几年，马胜利在放着七大皮箱荣誉证书、挂着无数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石家庄栗新小区内读书、写作、养鱼、种花、带孩子。

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如果他当年不在厂门口贴那张‘大字报’，也许一直就是一个悠闲的销售科长，如果他没有动念头去承包100家造纸厂，也许他会在光荣中安然地退休。”

步鑫生也不断创业，接手了一些亏损企业，也打造了一些品牌。但终归再没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

2008年、2013年先后罹患肿瘤切除肝脏、脾脏后的步鑫生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还想再起步。如今，80岁的步鑫生仍在上海，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出门会友，他不愿意回到海盐，因为“那里是我的伤心之地”。

只有鲁冠球，出现在习近平主席2012年访美的商业领袖名单中。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鲁冠球父子资产207.4亿元，名列第29位。

对于这些来自浙江的改革者而言，2009年原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的去世，是一个悲痛的日子。这位老人后来担任公安部长，其实他在60年代就开始在浙江工作，并在1983年至1987年的改革关键时期主政浙江。

之前，董朝才在2006年2月20日去世。来自温州内外的媒体，用整版来悼念他的离去。

但杨嘉兴的民营银行梦从未间断。其实早在2012年的秋天，他就开始递交民营银行申办材料，没有结果，当时杨嘉兴也曾打算彻底放弃，是“金融国十条”重新燃起了杨嘉兴的希望。

2013年秋天，银监会要在温州设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传开后，68岁的他当即对媒体表示：“即使只有一个名额也要争取。”

如今半年过去了，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

“不搞了，以后再也不弄这个事情了，彻底失望了。”杨嘉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杨嘉兴甚至觉得“可能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实现了。”但他坚持认为，“民营银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要能加强监管、控制风险就行。”

新年伊始，杨嘉兴似乎真的打算当一个闲人。他的公司不搞了，手机经常落在孙女家，也很少接受来访。可被问及是否打算彻底颐养天年时，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想再看看。”



杨嘉兴



温州商人杨嘉兴集资创办鹿城城市信用社，是全国最早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



谁在领导省级深改组

党委常委构成了各地深改组成员的主要部分，但是个中细节不尽相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2014年新春前后，各省区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陆续亮相。

2月14日，上海市对外公布了深改组成立的消息，并公布了小组成员名单。而在其之前，已有大约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春节前后成立了深改组。

在1月22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专项小组和中央改革办要尽快运转起来。同时，他督促“各省区市要尽快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关部委的改革责任机制也要尽快建立起来，并同领导小组形成联系机制”。

作为被赋予重大改革期待的领导机构，深改组一经中央提出便引来舆论聚焦。而作为担负各省区市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的机构，各省级深改组的新班子同样引人注目。

深改组“标配”

在各省区市中，深改组领导构成最为普遍的版本，分别为“一正两副”和“一正三副”。

“一正两副”的小组领导中，两位副组长一般为行政一把手及专职党委副书记。

例如，辽宁省深改组副组长为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政高，省委副书记许卫国。山东省深改组副组长为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省委副书记王军民。广东省深改组副组长为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省委副书记马兴瑞。广西自治区深改组副组长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席陈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重庆市深改组副组长为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上海市深改组副组长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市委副书记李希。

“一正三副”的小组领导中，除了行政

一把手及专职党委副书记，另一位副组长一般为常务行政副职。

例如，海南省深改组三位副组长，除了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还有省委副书记李宪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谭力。陕西省、贵州省、湖北省、江西省、江苏省、吉林省、河北省均同样配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一正三副”，湖南省有些不同之处。其三位副组长除了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和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外，另一位副组长是省政协主席陈求发。

1954年出生的陈求发，在湖南任职的经历不长。2013年1月起，他开始担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一职。在此之前，他没有在地方的任职经历。官方简历显示，自1978年以来，他长期在国防科工委即工信部担任领导职务。调任湖南省之前，他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与此相比，他的另一个身份令人瞩目。2012年11月，有媒体对全国31位省级政协主席简历进行统计发现，陈求发是当时唯一的中央委员。

“一正一副”到“一正五副”

在所有省区市中，内蒙古成立深改组的时间最早。

相比其他已公布小组成员的各省区市，内蒙古自治区深改组的领导人数最少，为“一正一副”：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担任组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担任副组长。

另一个是，在已经公布名单的省份中，内蒙古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没有进入深改组的省份。

现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李佳，2008年12月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10月起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内蒙古党校校长。在此之前的20多年，他一直在辽宁任职。1961年出生的他，在2004年开始担任辽宁省副省长。

而西藏自治区的深改组领导队伍为“一正四副”，分别包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赤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英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邓小刚。他们4人与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共同领导深改组。

在已经公布的省级深改组中，河南省为“一正五副”，在全国省区市中领导者最多。

其五位副组长分别为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省委副书记邓凯，常务副省长李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春良。省政协主席和人大副主任均担任深改组副组长。

叶冬松于2004年开始他在河南的从政生涯。此前，他在国土资源部工作。2004年，他从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一职调任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与叶冬松不同，刘春良没有在中央任职的经历。除了曾于2006年到2010年担任安徽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外，他30多年的工作履历均在河南，其在2005年12月任河南省委常委；2010年9月，在安徽任职4年后，他再度调任河南省委常委。

常委加减法

除了深改组组长，各地深改组成员的构成也略有不同。总体来看，党委常委构成了各地深改组成员的主要部分，但个中细节不尽相同。

例如，辽宁省委常委所有成员均为深改组成员，不仅有省委省政府部门中的常委，还有身为地市党委书记的常委，如沈阳市委书记曾维、大连市委书记唐军。这一构成是各地深改组成员构成的主流。

而在内蒙古自治区深改组成员中，省委常委中的地市领导干部，均未进入深改组，如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那顺孟和、通辽市委书记杜梓、赤峰市委书记王中和。

在陕西省深改组成员中，省委省政府部门的常委也并非全部在列，除了组长与副组长，在其成员名单中，有省委宣传部长景俊海、政法委书记安东、组织部长毛万春、省委秘书长刘小燕，而身为常委的纪委书记没有出现在其中。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有分析认为，因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地方改革需要中央部署，因此这一安排不难理解。

与以上几个省份深改组对省委常委进行缩减不同，湖南省则是在省委常委基础上，“扩容”1人，组成了深改组的全部阵容。

湖南省深改组成员，除了省委常委黄建国、李微微、郭开朗、陈肇雄、许又声、李有新、韩永文、孙建国、易炼红、张文雄外，还有于来山。

作为深改组中唯一的非常委成员，于来山现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2年出生的他，工作履历显示从未离开湖南。他在2004年任湖南省委常委，并从2007年起担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2011年起，他不再担任湖南省委常委，但仍担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政府党组副书记职务。2013年，他从省政府卸任担任现职。

主力阵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梳理发现，各省区市深改组成员来源除了党委常委外，一般也包括政府、人大、政协的相关领导，而政府的副职是主力阵容。

不少地区的深改组中，四大领导班子成员均位列其中。

例如，海南省深改组除了省委常委外，还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毕志强，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陈成。内蒙古的深改组中，同样包括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呼尔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郭启俊。

广西自治区未公布小组成员具体名单，但表示小组成员包括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湖北省采用了相同的表述。

不过，从各省份深改组成员结构不难看出，人大、政协在小组成员中占比有限。例如，海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和政协副职均只有一人在列。

与之不同，不少省份的行政副职全员进入深改组。例如，内蒙古深改组中，非党委常委的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新乐、王玉明、王波、马明、白向群、常军政全部为深改组成员。

在辽宁省，八位副省长周忠轩、贺旻、谭作钧、邴志刚、赵化明、薛恒、刘强、潘利国中，只有贺旻未进入深改组。

贺旻2013年1月刚刚当选辽宁省副省长，负责教育、文化、卫生、人口计生、体育方面工作。在此之前，她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辽宁省主委、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东

在已经公布的省级深改组中，河南省为“一正五副”，在全国省区市中领导者最多

陈向群任中组部副部长

男，汉族，1962年11月生，河北丰润人，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吉林工业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副研究员。

1979.10~1983.07 吉林工业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学习；

1983.07~1987.02 国家机械工业部基础件局质量工艺处科员、副主任科员（1983.08~1984.08 在山西榆次液压厂铸造车间实习；1985.04~1987.02 抽调到机械部深圳经济技术贸易中心基础件商品部工作）；

1987.02~1987.08 国家机械工业部通用零部件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1987.08~1988.06 国家劳动人事部劳力局企业处副主任科员；

1988.06~1991.04 国家人事部职位职称司主任科员；

1991.04~1992.11 国家人事部职位职称司职位分类处副处长；

1992.11~1995.01 广西北海市体改委副主任；

1995.01~1997.02 广西北海市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7.02~1998.06 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委书记；

1998.06~1999.09 广西玉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9.09~2000.09 广西柳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0.09~2002.12 广西柳州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

2002.12~2003.02 广西柳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代市长；

2003.02~2007.04 广西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4.02~2005.01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班学习）；

2007.04~2007.05 广西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07.05~2008.05 广西南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08.05~2010.06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2010.06~ 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组织二局局长；

2014.01~ 中组部副部长。

刘金国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正部长级

男，汉族，1955年4月生，河北昌黎人，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2月参加工作，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副总警监警衔。

1974~1983.09 历任民兵连副连长，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

1983.09~1992.05 河北省党校学习两年，后历任刘台庄工委副书记、书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中共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委副书记、区长，中共秦皇岛市委秘书长；

1992.05~1994.11 秦皇岛市公安局局长；

1994.11~1995.08 中共秦皇岛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1995.08~2002.01 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2002.01~2002.12 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

2002.12~2005.03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05.03~2009.08 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2005.04 授副总警监警衔）；

2009.08~2014.02 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党委委员、督察长；

2014.02~ 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正部长级），纪委书记、督察长。

张鸿铭当选杭州市长

男，汉族，1955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1978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1975.09~1978.08 浙江化工学院分析专业学习；

1978.08~1981.11 煤炭工业部北京煤科院煤化所工作（1980.04~1981.07 在中国矿院北京研究生部学习）；

1981.11~1984.06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研所工作；

1984.06~1987.06 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工作（1985.07~1987.06 下派温州市鹿城区环保办公室任副主任）；

1987.06~1992.04 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开发治理处副处长；

1992.04~1993.08 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开发治理处处长；

1993.08~1998.02 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96.09~1997.07 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8.02~2004.10 浙江省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1996.09~1999.07 在中央党校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毕业）；

2004.10~2005.04 台州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5.04~2007.02 台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7.02~2007.05 台州市市委书记、市长；

2007.05~2009.03 台州市市委书记；

2009.03~2009.04 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书记；

2009.04~2013.03 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2006.06~2009.06 在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毕业，获硕士学位）；

2013.01~2013.09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2013.07~2014.02 任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4.02~ 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拟任雅安市委副书记

男，汉族，1963年1月生，四川南充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矿业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1.09~1983.08 南充财贸学校读书；

1983.08~1987.08 南充县（现高坪区）粮食局财务会计；

1987.08~1990.02 南充县（现高坪区）团委工作；

1990.02~1996.03 南充市财政局企业科、预算科科长（1989.10~1991.10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大专班学习毕业）；

1996.03~1999.07 南充市财政收费管理局局长（1996.08~1999.08 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法学研究生班学习毕业）；

1999.07~2001.09 中共南充市高坪区委副书记（1999.09~2001.07 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专科学习毕业）；

2001.09~2002.03 南充市商业银行筹备组副组长、代行长、行长；

2002.03~2002.10 中共巴中市委副秘书长（2002.03~2003.03 兼任南充市商业银行行长）；

2002.10~2003.07 中共巴中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2000.09~2003.06 在省委党校财政金融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毕业）；

2003.07~2006.10 中共巴中市南江县委书记；

2006.10~2008.11 中共巴中市南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09~2012.07 中国矿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

2008.11~2008.12 中共阿坝州委常委；

2008.12~2009.03 中共阿坝州委常委、汶川县委书记；

2009.03~2010.02 中共阿坝州委常委、汶川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0.02~2011.03 中共阿坝州委常委、汶川县委书记；

2011.03~ 中共阿坝州委常委、汶川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

2014.02~ 拟任雅安市委副书记。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男，汉族，1955 年 1 月生，河南夏邑人，1973 年 9 月参加工作，198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程硕士，经济师。

1973.09~1976.08 河南省夏邑县刘娄中学教师；

1976.08~1977.04 在陕西省长安县郭杜公社新文大队劳动；

1977.04~1978.04 陕西省西安市混凝制品厂工人；

1978.04~1982.01 在西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2.01~1982.05 陕西省省直机关工委干事；

1982.05~1988.12 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综合处干事(1985.09~1986.09 月在陕西省旬阳县下乡锻炼）；

1988.12~1993.03 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调研室副主任；

1993.03~1993.08 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调研室主任；

1993.08~1994.11 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机构改革期间政策法规组组长（正处级）；

1994.11~2000.07 陕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企业处处长；

2000.07~2001.06 陕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1.06~2002.12 陕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2.12~2005.06 陕西省委副秘书长(2000.09~2004.04 在西北工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学习，获工程硕士学位）；

2005.06~2006.02 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正厅级）；

2006.02~2008.02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厅级），省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

2008.02~2008.03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省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

2008.03~2013.01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省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

2013.01~ 政协陕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2014.02~ 中央纪委监察部通告，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男，汉族，1966 年 7 月生，内蒙古凉城人，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4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1985.09~1989.0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物探系勘察地球物理专业学习；

1989.07~1992.10 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中心科员；

1992.10~1996.12 地质矿产部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1992.01~1993.01 参加地质矿产部第六届赣南老区经济开发团工作）；

1996.12~1998.08 地质矿产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

1998.08~1999.12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值班室助理调研员，部长秘书；

1999.12~2000.04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值班室调研员，部长秘书；

2000.04~2002.08 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秘书；

2002.08~2003.04 四川省委办公厅副厅级秘书；

2003.04~2005.09 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副局级秘书(2001.09~2003.07 在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 MBA 学历教育班学习）；

2005.09~2008.12 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正局级秘书；

2008.12~2009.01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

2009.01~2010.10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2010.10~2011.01 海南省海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正厅级）；

2011.01~2011.02 海南省海口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1.02~2013.01 海南省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3.01~2013.03 海南省副省长，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3.03~ 海南省副省长；

2014.02~ 中央纪委监察部通告，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家庭医生邱宏亮与社区居民交流

家庭医生的一天

2013年3月，原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本市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包括对签约家庭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建立家庭医生首诊机制和建立畅通的转诊渠道。但这三点在推进上都步履维艰，家庭医生人手不够的常态并未改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杨卓琦 | 上海报道

上海正在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力争到 2020 年之前，基本实现每个家庭与一名家庭医生签约。按照上海医改方案的规划，每 2000~3000 人将配备 1 名家庭医生。

邱宏亮是一名在上海 200 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家庭医生之一。他已经在社区做了 8 年的全科医生。

上午门诊，下午上门。这两个角色贯穿邱宏亮一天的工作中。“这就是家庭医生的节奏。”

谁来看病

邱宏亮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点并不好找，在长兴坊一条小巷尽头的右手边，而小巷的左手边是一个菜市场。

全科门诊从早晨八点开始，而邱宏亮一般在七点半就已经穿好白大褂坐在诊室里了。在这里，经常见到住长兴坊的居民们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提着菜就过来了，挂个号看好病，买好菜再回来配药。

2014 年的 1 月中旬，邱宏亮的门诊格外忙碌。他从一早坐进诊室直到 11 点才抽空去了趟洗手间。“去年的医保额度提前用完了，以至于最后两个月很多药只能限量供应，所以今年刚开始就出现居民们蜂拥而至来配药的情况。”邱宏亮介绍。

在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的片区，原来只有 5 万 ~ 6 万人，现在有 9 万人了，“但是医保却在近十年没有什么增长，每年只有四千万到五千多万元，这就很矛盾了。”

“我们这个服务中心，药品很齐全，很多大医院能配的中外合资的基本药物我们几乎都有，但是医保额度不够用，很多别的社区的人也过来配药。”据邱宏亮说，甚至有人从宝山坐公交车来这里的社区医院配药。

在他的挂号病人中，80% 是来配药的，只有 20% 的患者是来看病的，“也只是些伤风感冒什么的。”

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点一共有四个全科医生，其中有一个特色中医门诊。“现在天冷看不出来，天热的时候这个门诊每天人很多的，都是来做针灸推拿的。”邱宏亮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本刊记者观察到，来社区医院看全科门诊的，几乎都是 50 岁以上的上海人。“大家一般都说上海话，有些年纪大的病人也不会说普通话。”邱宏亮是上海人，语言关没有成为他工作上的问题。

“这个也好理解，上海居民持社保卡在社区医院看病能报销的比例最大，配药也便宜。上年纪的人多是慢性病，只需要长期配药而不是诊断，所以几乎都是他们过来看病。”邱宏亮说。

2014 年开始，上海市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超过起付标准以上部分，基金支付比例作相应调整：60 周岁及以上人员、城镇重残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一级医疗机构）住院的，基金支付比例从 85% 调整为 90%；60 周岁以下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一级医疗机构）

住院的，基金支付比例从75%调整为80%，均高于二级、三级医疗机构。

而上海医保报销比例的政策倾斜并非从近几年才开始。早在2007年，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明确提出将适当拉开医保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大中型医院支付比例档次，引导参保市民到社区医院就医。

除了医保报销的优惠政策以外，基层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范围采取“307（国家基本药物目录）+X（本市社区卫生机构补充基本药物目录）+Y（目前医保药品目录）”的方案。对纳入307+X范围内的药品，将实行全市统一招标、集中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并在基层卫生机构实行零差率销售。

换句话讲，找社区医生看病，报销多，药便宜。

这里没有医患矛盾

在这个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邱宏亮是团队里的首席医生，也是深受居民欢迎的家庭医生。在毗邻的三间全科诊室中，数他最忙碌，社区医院也专门为他挂牌：小邱工作室。

“我在社区卫生中心工作八年，几乎没跟患者有过红脸的情况。”邱宏亮说。在社区卫生中心，患者经常不挂号就进来做些咨询、问问情况的也有。“他们都说，在大医院不挂号就看不见医生面，挂了号就见5分钟面。”

在全科医生门诊的门外，有一排等候座椅，但是一上午过去，都没有患者坐着等待。因为服务的小区居民几乎都是熟人，最多的时候门诊里涌进六七名患者，围着邱宏亮看病、开药，居民患者之间还能聊上几句，问问病情。

当居民得知记者来采访邱宏亮的时候，一位患者对本刊记者说：“他可是十佳家庭医生，刘延东副总理接见过的哦！”

邱宏亮特别不好意思地笑笑，“当初投票都是居民们帮的忙。”

201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调研考察上海医改工作推进情况。在徐汇区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刘延东与家庭医生和签约居民交流，勉励家庭医生更好地与自己的签约居民联系，让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情况更有底。

2011年4月起，作为上海医改五大基础性工程之一，上海在长宁、闵行等10个区率先启动了家庭医生制度试点，共有13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家庭医生制度构建，覆盖2277名家庭医生，签约居民达374万。

在邱宏亮不到8平方米的诊室里，常年放着徐汇区卫计委每月刊发的健康快报，居民患者可以浏览阅读，也可以拿一份回家慢慢学习。

转诊难

上午门诊结束后，邱宏亮下午的家庭访视工作更随意些，背着黄挎包，带上听诊器、血压计等简易的医疗设备，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在几个小区之间来回跑。

在这个片区，有两个养老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需要每周抽半天去查房看病。除此以外，百岁老人、离休老干部、伤残军人以及烈属需要定时上门，再加上签约家庭，邱宏亮每天下午大约要跑10到15个家庭。

本刊记者随邱宏亮上门访视的都是空巢老人。每到一家，测血压是一定要做的。“老年人都是慢性病，其实我们上门也很难发现什么隐疾，主要是慢性病监测，也让老人放心。”

在上门的几家里，除了测血压以外，居民也会询问下什么东西能不能吃，什么药该怎么吃。家住某栋1307的老人拿着一包旺旺仙贝问：“这个能吃一点吗？”她的爱人患有胆囊炎，很多食物都是经过询问才能吃。

“有家庭医生是好事情，但是要我说，最多能给我们的就是关心。比如我要是生病了要住院怎么办，邱医生能帮我住进医院吗？好多问题还都不能解决。”家住某栋5楼的老先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居民健康管理，说到底是要和二三级医院对接的，但眼下转诊通道阻塞，我们有些底气不足。”康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易春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目前，康健社区与市八医院建立了“预约转诊”平台。但在社区医院的负责人看来，这还是凭借“私交”，或者由三甲医院做社区课题的需求促成，况且“一对一”总会对不拢：各家医院及其科室各有特色，而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多种多样。

邱宏亮在2012年曾经去台湾学习了两个星期。“台湾都是综合性医院牵头在做全科诊室，转诊很方便，我们这里转诊还真是不方便。”

2013年3月，原上海卫生局（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本市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包括对签约家庭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建立家庭医生首诊机制和建立畅通的转诊渠道。但这三点在推进上都步履维艰。

每月的税后收入只有4500元左右

家庭医生人手不够的常态也并没改变。以家庭医生承诺的健康咨询为例，邱宏亮说，有时候每天都要接到好几十个咨询电话，不分白天黑夜。有的家庭医生实在撑不住，只好每天晚上一过十点就关机。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那个周末，邱宏亮依然接到了几个患者的咨询电话。“他们打电话，希望我上门看一下，其实如果情况不好的话，应该直接送医院，我去了基本不管用。”老百姓把现在实行的家庭医生责任制和国外的私人医生有点混为一谈了。

现在，邱宏亮有950户签约居民，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收入。“签约的家庭多并没有额外的奖金拿，就像我们多看几百个病人，体现在工资上也就是100多块钱。”在台湾，家庭医生很少上门服务，“因为他们的人力成本太高了。我们虽然家庭医生缺乏，但出诊一次的费用只有十几块钱。”

在邱宏亮看来，家庭医生的工作中，有太多细节需要在政策和规定中明确下来。“比如上门插尿管、插胃管、伤口换药，这些都是有风险的（损伤、出血、感染等），家庭医生到底做不做，每个医生选择是不一样的。我是想难道让患者来回叫救护车跑去医院排队只为了换个尿管或者胃管？所以我做。”

邱宏亮今年36岁，级别是主治医生，每月的税后收入只有4500元左右，“我们跟大医院医生的收入比不了。”东

邱宏亮有950户签约居民，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收入



老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为上海音乐厅，建于1929年

民国初期的电影检查

北京政府时期可视为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期，
其特点以检查体制的多样化、地方化与检查标准的宽泛性、道德性为表现

文 | 汪朝光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至 20 年代初，中国建立电影检查制度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首先是电影放映市场的扩大，据统计，20 年代中期，国内电影院总数已达到 140 余家（不包括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电影院），其中上海、北京、哈尔滨、汉口、天津等大城市的影院数已超过 10 家。电影院的上映片目也日渐增多。

20 年代中期，估计上海市场全年放映片目可能超过 300 部，达到平均一日一部新片的水平。除了进口影片外，20 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事业大盛，风起云涌，一日千里，影片公司竟设至数十处之多”，1926 年国产故事片出品数量首次超过了 100 部，出现了民国时期的第一个高峰。

这样大的放映数量，使对电影的审查管

理成为规范市场的一种客观需要。其次，由于当时放映的电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反响，对电影进行检查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因为“近来有一部分出品，简直太不像个样子了”，“审查情节，所以维持国家底体面，和社会底风化；审查成绩，所以鼓励摄片者的谨慎，和保全电影界的信用”。这又使电影审查成为当政者顺应时势的主观愿望。

正是在这样主客观结合的背景下，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开始浮出水面。

浙江电审会是目前所见资料中，体例最为完备，检查实施程序最为具体，并与警察权力相结合的省级电影检查机构，因而该会较具典型意义上的电影检查功能。

电影检查制度开端：江苏省“电审会”

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各地电影审阅委员会均简称“电审会”）的成立可视为较具有本来意义之电影检查制度的开端。

该会由江苏省教育会组织，有委员10人，并首次定出了电影检查的具体标准：1. 确合教育原理，能于社会发生良好之影响者，得加入“曾经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认可”字样，以寓表扬之意；2. 通常影片，但为营业关系，可无流弊者，本会不加可否；3. 如确系有害风化，曾经本会劝告，未经改良者，本会当请官厅干涉。

1923年7月2日，该会首次开会，审阅明星公司出品的《张欣生》，审阅委员“谓此剧以法律为归束，以报应为主旨，编制颇佳，惟间有一二处须加删改”，决定于日内集会讨论。两天后，电审会再次审查影片，认为《张欣生》全片均系演明事实，且属果报之意，尚无不合，惟以烟赌造成罪恶之原因尚少说明，应于三犯执行死刑时，补入忏悔语以表明之。如照改后，亦适合本会所定标准第二条。

《张欣生》一片为电影检查呼声高涨的动因之一，而该会却未提出禁映要求，反予通过，在“因果相报、尚无不合”的表面原因之外，也反映出江苏电审会缺乏强制性禁片之权力。

其后，江苏电审会又陆续推出符合该会第一标准予以表彰的影片计20余部，其中有1925年明星公司出品、洪深编导的《冯大少爷》，被评为“为有财产而不能教育子弟者当头棒喝，事虽平淡无奇，警世之意实深，艺术亦佳”；1926年民新公司出品、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玉洁冰清》，被评为“志趣纯洁，描写黄伯坚处势利社会中，独能抱定富贵不淫之精神，历尽艰苦，以与环境相抗……尤足风励末俗，艺术方面，亦多可取”；1926年神州影片公司出品、万籁天编剧、李萍倩导演的《难忘了妹妹》，被评为“艺术优美，剪接合宜，亦觉无懈可击”。

与江苏电审会成立的同时，淞沪警察厅制订了《取缔影戏园规则布告》，规定电影院开演影戏前，须将剧本或说明书送警察厅审核，“如有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应即禁止开演”，至于全部还是部分禁映，由警察厅“按其体裁临时酌定”。同时规定，影院男女宾座位不得紊乱，放映时间以晚12时为限。警员可随时在场监视，凡违背本规则者，依其情节轻重，分别依法处罚，或勒令停演闭业。

该布告的基本点仍着重于电影院的管理，且并未与江苏电审会的实际联系，警察权力与电审会工作之分离，不能不影响到电影检查的效用。

就江苏电审会的工作而言，基本上仍为民间组织的性质，成员多出于教育界，所考又多从电影的教育功用出发，审查标准较为宽泛与宽容（可以《张欣生》的审查为例），缺乏实际效果。在见之于传媒的报道中，没有表明该会曾审出“有害”影片。

而且该会的审查基本上是在电影上映后而非上映前，与电影检查的初衷仍有一定距离，实际功效显然有限。虽然该会审查标准里有“请官厅干涉”字样，但我们并未发现官厅干涉的具体事实。正因为如此，各电影公司对这样的审查并不重视，江苏电审会的工作也被一些论者讽为千篇一律、似是而非的“老学究的朱批”。

其他省市的电影检查

较江苏为后，1926年2月3日，浙江省会电影审查会在杭州成立。根据该会章程规定，该会由教育、警察两厅合组（教育厅会员由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担任），“省会各处制造新片，及公开映片，一律须经本会审查预演一次，经审定后，给予许可证，方准租赁开映”。

另据该会《审查规程》规定：“省会各场所公开电影，每逢新到之片，最迟须于开映前两日，报告本会，通知开映时期”；“新片开映之当日午前九时起，本会轮推审查员二人，到场审查”；“预映完毕，如片中情节动作字幕布景等，有违背善良风俗或妨害公共秩序者，审查员得知照该场，嘱其删除，并将删除情形，记明于许可证中，其情节太坏，无从删改之片，不给许可证”；“倘有不依许可证删改情形而开映者，由该管警察署随时令其停映，并依法处分”。

浙江电审会是目前所见资料中，体例最为完备，检查实施程序最为具体，并与警察权力相结合的省级电影检查机构，因而该会较具典型意义上的电影检查功能。

江苏和浙江之外，其他省市也有关于电影审查的规定。

1921年9月，天津警察厅发布训令称：“各电影园所演影片，则大率不外奸抢掳掠，且有为西欧所禁演者。似此情形，不惟有失戏剧本旨，抑且妨害风俗，均应从严取缔，以维将来。……嗣后无论开演何项文明新剧或电影，均应事先将戏曲脚本或电影片送交该所，先行审查。如确系有益社会人心，不悖善良风俗，方准演唱，违则重惩。”

同月，天津教育厅厅长谕：“近来津埠各电影园所演之片，往往离奇怪诞……幼年学生，每值课余之暇，结队往观，为害于身心者甚巨。令即严加禁阻，以免德育上受无形影响。”

1923年6月，直隶省长王承斌又发训令称：“近日多有诲淫诲盗之影片，如《阎瑞生谋害莲英》、《张欣生谋产》等片，虽系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自应一律严禁，故昨通令所属各机关查禁，以维风化云。”

1916年3月，广州市警察局通过《取缔影画戏场规则》，规定：“凡诲盗诲淫、败坏人心风俗、伤碍友邦感情画片，一概不准

影演，如违重究。”1924 年广州市教育局通过《视察戏剧规则》，规定 ：“凡有伤害风化之影片剧本，一概禁演。”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1926 年 6 月，广州市教育局通过《取缔影画戏条例》，规定 ：“各画片如有违犯下列各项者，应禁止其全部或一部 ：1. 有反革命意味者 ；2. 有损国体或民族人格者 ；3. 有政治煽动的说明文字者 ；4. 残忍杀害或诲淫诲盗者 ；5. 过于神怪能导人迷信者 ；6. 有诈术骗术意味者 ；7. 广告上用不正当之标题者 ；8. 说明之文词污秽者 ；9. 有关于花柳病或堕胎等表演者 ；10. 其他关于危害社会治安或社会道德者。”

中央层级的电影检查

在有了各地的电影检查初步实践之后，中央层级的电影检查制度也在酝酿订立。

1924 年 1 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出通令称 ：“近日各省埠电影营业日渐发达，各电影剧场经理人，因谋营业发展，关于租赁之影片，率多趋重情剧，描摹青年男女恋爱情态，致使观者欲狂，窃生效慕之心。其次则为杀人放火，路劫盗抢，以及诱骗等情。此等剧片，使青年观之，实属败坏道德，有伤风化，害及公众思想。内 (务) 部有维持风化，规正人心之责。对于奸盗淫邪之剧片，亟应严加取缔，以端风化，而维社会治安秩序。因电影营业，属农商部主管，特咨请农商部，会衔咨行直隶省长，饬警随时赴各剧场检查，凡各园新到之片，须经官厅检阅许可后，方准开演，不得自由开演。……”

1926 年 2 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成立了电影审阅会，在呈请教育总长审核时称 ：“影剧一事，于社会教育关系甚重，其良者固足转移风俗，裨益社会，而稍涉偏激，亦易滋流弊，不可不详加审核，分别奖禁。”

该会拟出了《审查影剧章程》共 10 条，规定凡国内外编演影剧“均须经本会审定后方准映演”，有下列情形者“予以褒奖”：其事实情形深合劝戒本旨者 ；有益于各种科学之研究者 ；于教育上确有补益者。有下列情形者“应禁止之”：迹近煽惑有妨治安者 ；迹近淫亵有伤风化者 ；凶暴悖乱足以影响人心风俗者 ；外国影片中之近于侮辱中国及中国影片中之有碍邦交者。有下列情形者“得令其裁剪或修改之”：情节乖谬不合事理者 ；形容过当易起反感者 ；意在劝戒而反近诱惑者 ；大体尚佳间有疵累者。

教育总长易培基在呈文上批复 ：核阅所拟章程各条，均称妥协，应准照办。

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北京政府“官署”是否介入电影检查还难以遽下定论，但据《申报》载，“教部前因影片与社会风俗甚有关系，曾订定审核影片章程，公布在案。兹查各制片公司，对于此事多视为具文”。可知当时警察权与检查权的结合至少是不完全的。

此项章程对电影检查标准的规定，是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初创过程中最为详尽的一次，不仅有各地电影检查标准中均有的关于“治安”、“淫亵”、“风化”、“风俗”等等的禁令，而且第一次列入了关于“辱华”和“有碍邦交”的内容。

尽管国内舆论对于美国“辱华”影片多有批评，但在最初的电影检查中，并无这方面的禁止性规定。此次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审会虽拟出了禁止规定，但并无运用于实际的报道。对于美国“辱华”影片的实际禁止，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才得以实现。从而使电影检查在道德关怀之外，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味，反映出与江浙地方电检标准的差别。

摘自
《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
汪朝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版

对于美国“辱华”影片的实际禁止，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才得以实现。从而使电影检查在道德关怀之外，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味。

政治和“风化”

牵涉政治的电影检查可见两例。

一例为 1915 年 5 月，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浙江绍兴县署以“目前外交甫经解决，内患尚未消弭，凡在商民痛定思痛，正卧薪尝胆之日，非酣歌恒舞之秋，且绍城非通商大埠，此等营业不特于商市无所裨益，兼定为风俗人心之害”为由，电饬城区影戏馆停业。

另一例是，1928 年 3 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函知华北、东北、西北 10 省区，要求对于“以废除现有社会之组织为其表演之目的”的苏联“宣传”影片，应“转饬注意”。

但因为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有限，电检规定公布后，各制片公司，对于此事多视为具文，因此教育部电审会的主要工作只能局限于北京，这也使其实际功用大打折扣，因为如前所述，上海才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和市场，任何权力不能及于上海的电影检查机构，其功效不能不有很大的局限性。

根据上述电影检查章程和标准，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审会对北京上映的影片进行了审查。以 1927 年 12 月 27 日至 1928 年 3 月 24 日这三个月为例，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人孙百璋等，为北京中央、真光、明星等 8 家影院共审核影片 115 部，未发审定证者为《母女争宠》、《蝴蝶争花》、《探亲家》、《代理阔少》（又名《无愁女儿》）等片，其中只有《代理阔少》一片，因诲淫无法裁剪，由该会会同警厅嘱其无庸映演。其他各片未予说明，估计应为删剪后上映。

被检查的其他影片，《浮花浪蝶》剪去男女泅水一幕，《深宫情侣》剪去长时间接吻两段，《快乐舞女》剪去长时间接吻勾脚

两段，《风流剑侠》剪去船中接吻一段。这是目前我们所见民国初期电影检查中最为详尽也最有实际效应的一份检查清单，由此可知，当时北京的电影检查已较为规范，而实际查禁的内容仍以“风化”类情节描写为主。

与上海相似，北京也有关于电影院的管理规则。

1921年5月，京师警察厅颁布《取缔电影园规则》，规定开设电影院者须有铺保，并呈报警察厅核准后，方许开业；影院“不得开演淫邪迷信、有伤风化等影片”；电影院应每日将所演戏目分别呈报于警察局查核；“除包厢外，均男女分座”；营业时间“夜间一律以十二钟截止”；电影院内“得由警察厅随时派员警稽查弹压”，同时以售票之多寡收取弹压费。

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审会仍非政府机构，而民国电影检查的趋势是向中央集权的强制性检查方向发展。

1928年4月，北京政府内务部与教育部联合呈国务院称：“现在我国舶来影片既随处任意演映，而自制影片公司近来亦纷纷成立，……自应亟速厘订妥善办法，切实检查，并为订定儿童准看与否之标准……兹经参照日本成法，酌加变通，由内务部、教育部拟订检查电影暂行规则暨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组织规则各一种，先行试办。”

该两项规则规定由教育、内务两部合组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负责电影完成片和剧本的审查。凡该会认为“与公安、风俗、道德、教育及邦交上并无妨碍”之影片，可予通过，凡有妨碍者，得予以“删改、剪截或发还重制”；认为于社会有良好之影响者，酌给奖励；如电影公司、电影院有违犯本规则之规定者，应停止其放映，并酌量处罚。

该两项规则于当月由国务会议“议决照办”，但此时已临近北京政府的垮台，两个月后，北伐之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此项规则实际已无法执行，但其若干内容为其后的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所承袭。

综上所述，北京政府时期可视为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初创期，其特点以检查体制的多样化、地方化与检查标准的宽泛性、道德性为表现。终北京政府之世，尚未出现全国统一的、有法律规范和严格标准的电影检查制度。东



名人荐书

李公明：
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什么是政治上的“选择”、“加入”、“责任”以及“承认”和“道歉”。



《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
【法】菲利普·拉古—拉巴特 著
刘汉全 译
漓江出版社2014年2月版

波诺：
一首诗，让我们泪流满面，是第一次。她是生命的诗人。她是内心深处的摇滚。



《在你人生最美的时刻》
笠子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高峒桐：
作者大量引述过去没怎么公开过的文献，尤其是几次诉讼留下的卷宗档案。确实值得一读。



《张伯驹身世钩沉》
寓真 著
三晋出版社2013年8月版

《纽约时报》：
塔希尔·沙阿是一位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字巨匠，他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自己在卡萨布兰卡的生活。



《哈里发的神殿——卡萨布兰卡的365天》
【英】塔希尔·沙阿 著
步朝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关于医改的几点建议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没有捐款来源，因此，医药分家的前提必须是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让医生进入高收入水平，收入来源透明、合法

文 | 刘静娴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涉及医疗体制改革的内容不少。除了提出逐步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外，专门强调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际上，自十八大以来，医疗卫生界的多项改革措施已陆续出台。就医师多点执业来看，随着《医师多点执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医生多点执业成为可能。其他重要的改革举措还有：全面铺开基层医疗机构“零差率”药品销售，为取消“以药补医”打基础，并尝试进行人事制度改革。

为了体现医疗制度的公平公正，努力保证公民平等地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权利，合理使用医疗资源，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推进改革进程。

取消编制制度

编制制度限制人才流动，政府为减少医疗投入，严格控制编制，医院人员不够用，于是就聘用合同工，这部分人员的支出由医院自己负担。而医院为减少支出，尽量少雇用合同工，导致医护人员高强度工作，导致医护比例失调、医患比例失调。

医护比例失调甚至倒置，不仅造成医生过劳，同时也造成护士严重超负荷工作。

2006年5月10日《健康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援引了2004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医护比平均为1：0.82，亚洲平

漫画/李峰

均医护比为1：2.019，我国香港地区、英国、泰国、德国以及日本等的医护比例都超过1：4，芬兰、挪威、加拿大等国家的医护比甚至超过了1：6。而世界银行早在《1993年世界发展状况》中就已经指出医生与护士的比例应该达到1：2。”

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编制制度。

实现全民医保，体现公平公正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徐善长在南京卫生改革与发展政策高层论坛上称：“全国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及新农合参保人数已超过13亿，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实现了全覆盖。”他说的是事实，确实基本全覆盖了，但还有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这些覆盖的人群，被划分成了几个群体。

医疗保险种类分成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而享受不同待遇的报销制度。

医疗机构也被分成了三个等级，在不同等级医院看病的医疗费用和报销比例也有差别。医疗机构分为“医保定点”单位和“非医保定点”单位，在“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看病，不能报销。药品本身也被分为“甲乙丙”三大类，报销比例各不相同。

按照现有规定，医保部门严格限制医生处方金额，超支则对医院罚款，医院则落实到医生。有时候，医生怕被罚就不会给患者开好药和价格较贵的药品，哪怕患者病情非常需要。

同时，还严格限制医保基金使用。限制本身没有异议，但限制的方式值得商榷，应该怎样限制、应该限制谁。

这里建议的全民医保，与我国现行医保制度概念不同，是不分人群，不论城镇户口还是农业户口，不分住院和门诊，不设起付线，医疗机构不分“定点”与“非定点”，药品不分甲乙丙类，凡国药准字号药品均予报销（注：“国药准字”为治疗药品，允许有毒副作用，但必须明确标明，允许进入医院。“国食健字”和“卫食健字”是保健品，不允许在说明书中出现“疗效”字样，不允许有毒副作用，也不允许进入医院）。

只保留一项制度：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报销不同比例的医疗费，进一步提高在一级医院看病的报销比例，以鼓励常见病和多发病到一级医院去看，避免三级医院过度拥挤。制定全体公民统一标准的医保制度，只要参保就按规定的比例报销，合理使用医疗资源，体现公平公正原则。

日本的医保分类，是以年龄划分，并向低收入阶层倾斜，没有身份、等级之别，体现了公平公正。

日本医保分为职工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种，前者针对有职业的人群，后者针对农民、自由职业者、无业者和老年人，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日本的“农民”是职业概念而不是身份概念。全体日本公民享有同一标准的医保制度：医疗机构无医保“定点”与“非定点”之别，报销不分门诊与住院，“3至69岁者，自付30%；3岁以下者自付20%，70岁以上者自付10%（收入在一定水平以上者要自付20%）”。牙科、美容科医疗费用另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全民医保”不是“全民免费医疗”。

相反，应该杜绝全民免费医疗。因为，一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势必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有关部门为了控制浪费，必然在医疗管理程序中严格控制医疗资源的使用，医生根据病情诊疗的自由度将受到严厉限制，结果会造成好药、贵药被特权阶层优先使用，不能满足普通公民的需要。

全民医保也肯定有各种限制，但由于自费一部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抑制特权滥用。

大幅度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技术收入水平

近几年来，尽管政府在不断增加医疗投入，但与世界各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医疗投入不足的结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收入群体报销比例低，看不起病；二是医务人员收入少，不能充分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

有人说药价虚高的原因是“为了增加医院的经济效益，医生给病人滥开大处方”，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管医院的婆婆很多，其中医保机构层层关卡，医生必须按相关规定开具处方，同日同医生开具的同一张处方，药品种类不得超过5种，同时不能超出“次均费”等规定，否则医院会挨罚，医院则落实到相关科室，科室则落实到具体医生，有的还要同时受到其他行政处罚等。一般而言，没有医生愿意冒此风险。

药价虚高，与以药养医无关，医院无定价权，药价虚高及药品目录准入，是某些相关部门权力寻租所致。

解决办法是医药分家，免除中间商环节，促使药价还原为其本身的价值。医药分家后，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将成为同行竞争的重要指标，也将成为医院盈利的主要途径，如此，医生提高医术就成为必须，逐渐形成“比服务、比技术”的良性竞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没有捐款来源，因此，医药分家的前提必须是——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服务价格，让医生进入高收入水平，收入来源透明、合法。

政府应大幅度增加医疗投入，由政府为公民购买医疗服务，而不是靠人为压低医务人员劳务价值来体现医疗的公益属性、靠牺牲医务人员应得利益为全社会的医疗公益埋单。加大医疗投入，一是增加低收入人群、普通城镇居民的报销比例，让全体公民看得起病，二是大幅度增加医生的医疗技术服务收入。

废除医师职称考评制度

目前我国医生分为五个级别：医士、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并无职称一说。

医师职称考评制度脱离医学实际，重学历，重论文，不重临床实践，尤其是计算机，医生在诊疗中会操作即可，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四个模块的专业计算机考试。医师职称考评制度一直为医界所诟病，被称为“医界科举病”，建议废除。

笔者建议只保留《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即可。

《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依法取得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的医师均应参加医师定期考核”，“医师定期考核每两年为一个周期”等。这意味着当一辈子医生得考一辈子试，如果再加上职称考评等名目繁多的考试，医生疲于应付，真正应该用在患者身上的时间和精力被迫削减。

无论如何，医改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需要达成共识，共同推进。东

食色物语

口腹之欲的“营养学”



长时间煲出的一锅汤，固然好喝，但就营养价值而言，未必就比调料“勾兑”出的汤好

云无心：
食品工程博士，现在美国从事食用蛋白质的研发工作，通俗点说，是“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做饭”。

人们的食欲——对某种食物的渴望，更多与饮食习惯，或者某种回忆有关。因为从小吃某种食物，那种食物就最能满足他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尽管不同的妈妈做的饭相差很大，但“妈妈做的饭”能勾起大多数人的食欲，这就是习惯使然。

曾经在某种特定场合吃过的某种食品，多年以后还能勾起食欲，是回忆的作用。作为化学意义上的食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特定场合食物所带来的愉悦被记忆下来。当再次看到那种食物，那种愉悦的感受会被激活，就产生了“食欲”。

如果一种食物是完全陌生的，那么不管它有多么“美味”，都难以产生食欲。有时候一些“陌生食物”能让我们胃口大开，它其实也并非完全陌生，而是某个方面——比如外观、颜色或者气味等等，与记忆中的某些美食契合，从而引发了我们对那种食物的回忆。食欲多数情况下与食物的味道无关。

人们感知的酸、甜、苦、咸、鲜等五种基本味道中，酸和苦更重要的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天然食物的酸表示果实尚未成熟或者已经变坏，而苦则与许多“有害成分”有关。

天然食物中的甜来自于糖，咸来自于盐，对于现代人来说，二者都是需要控制的“不健康因素”。鲜味来自于蛋白质水解释放出的谷氨酸，而食物中的鲜味往往有着肌苷酸和尿苷酸这两种“呈现核苷酸”对谷氨酸的协同作用。谷氨酸还算是一种氨基酸，能被人体所利用，但让鲜味大大增加的核苷酸却完全没有营养价值。

人们体味到的各种香味，主要依靠的是“嗅觉”。人类的嗅觉比起狗之类的动物要逊色得多，但比起自身的味觉，还是要灵敏不少。

嗅觉依靠的是各种挥发性的有机小分子。比如，香草味主要来自于香草醛——一个只有八个碳原子带苯环的醛。有了它，很多人甚至无法分辨出是天然的香草精还是“山寨”出来的香草味。

柑橘的酸味来自于柠檬酸，气味则来自于醋酸辛酯，有了它们，也就可以合成橘子汁。

黄油的味道来自于丁二酮，香蕉的香味来自于醋酸异戊酯，菠萝的香味来自于醋酸丙酯——“人造香味”是靠它们，“天然香味”也是靠它们。它们没有营养价值，天然食物中使得香味更加“丰富”的其他成分，也没有营养价值。

“这汤煲得这么香，一定很有营养”，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煲汤是把固体食材中的可溶成分萃取到汤中的过程。各种酯类等挥发性有机小分子使得汤“闻起来很香”，而前面说的谷氨酸和核苷酸则使它“尝起来很鲜”。在骨头、肉、香菇、豆类等食材中，有许多游离或者聚合状态的谷氨酸与核苷酸。在炖煮的过程中，这些成分迁移到了汤中。尤其是蛋白质长时间加热，会有一部分被水解释放出本来不被释放的谷氨酸或一些小分子肽。这些成分混在一起，就产生了浓郁丰富的香味。

但是，这些成分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营养价值——即便是释放出的谷氨酸，跟味精中的谷氨酸也没有区别。更多的营养成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矿物质，依然存在于“不好吃”的固体残渣中。而维生素，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后，已所剩不多了。

也就是说，长时间煲出的一锅汤，固然好喝，但就营养价值而言，未必就比调料“勾兑”出的汤好。

宋襄公的“战争礼”



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

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结果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

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期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

宋襄公的“愚蠢”，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张宏杰：
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清风”纸巾	广州饮用水市场	江淮电动车	绿地
关键词	不达标	黑名单	被歧视	劣质房
时间	2月17日	2月18日	2月18日	2月19日
事件梗概	经国家纸张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测试，在抽查30种纸巾样品中，银雅、顺清柔、达意、波斯猫、小金人、IKEA、清风、小宝贝、羽飘、洁柔等10种品牌样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	大峡谷桶装水菌落总数超标、加仑加纯天然山泉水致癌物溴酸盐超标……广州市工商局公布食品抽检结果，瓶桶装饮用水再度成为“重灾区”，12批次饮用水上“黑榜”，八成因菌落总数超标。	2013年，北京教师崔乐买了一辆江淮纯电动车I-EV3，因无法上牌，不得不把车籍落在了河北廊坊。“I-EV3进入了北京环保目录，但车管所不给上，没理由。”一位车友买了北汽集团生产的电动车E150，却轻松地上了北京车牌。北汽电动车经销商宣称，购买该品牌的电动车就可以获得北京车牌。	绿地旗下多个子公司爆出质量问题：江苏徐州项目被指严重质量缺陷，开裂墙体或将沉降；安徽蚌埠项目涉嫌欺诈性销售，8万平方米水景公园变成高压变电站；绿地集团马鞍山项目亦曾陷入“瘦身钢筋门”，主梁直径12mm的钢筋偷换成6mm—8mm。
消息起点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	广州市工商局	《第一财经日报》	21世纪网等
影响/波及面	清风、小宝贝、羽飘纸巾纸样品内装量不符国家标准；波斯猫、小金人、IKEA等品牌的样品纵向湿抗张强度指标不符国家标准；“顺清柔”和“达意”横向抗张指数和纵向湿抗张强度均不达标。	广州市盘龙饮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桶装“已纯”饮用天然山泉水，菌落总数超标40倍。这已是该企业第三次上“黑榜”。	多数城市对非本地制造的电动车实施了歧视政策。新能源汽车计划从2010年推出至今，业内估算政府与企业投资近1000亿元，却始终未能解决产业化难题。	绿地集团借壳金丰投资上市进入倒计时阶段。业界指责绿地近年来盲目扩张，不合理的管理、工期和成本导致质量缺陷，千亿业绩靠劣质房堆出来。
应对		《广州市食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试行办法》正式实施，上榜者将被公示两年，信息纳入该市公共联合征信系统，以实施联合惩戒。	谈及部分城市的歧视性政策时，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回答：“敢怒不敢言。”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回应：马鞍山项目质量问题是个案，绿地集团会用高度的责任感和对消费者负责的精神处理好其他所有项目。
东方点评	清风不识字，总得会称重。	“黑名单”联合惩戒，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细节。	望市场内外，诸侯割据，堡垒遍地。	绿地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上市后的监管能否遏制企业“贪食蛇”之性？

啊饭达制图



北京春茶市场

茶价暴跌

2月19日

春茶价格暴跌，最高跌幅近八成左右，接近批发价。在马连道茶市，往年宜宾春茶价格最高售价在3000元/斤，现只有往年的1/5。一位铁观音茶商表示，茶市不景气从去年9月就已显现，销售额比往年下降近七成，1000元/斤茶叶几乎无人问津。目前，其店内铁观音价格在百元左右，同比下降近三成。

《北京商报》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2014年中国茶产业形势报告》：除云南普洱茶和福鼎白茶价保持上涨外，其他高档名优茶价格较去年跌幅在10%-50%之间。

茶者，南方嘉木。茶道在品不在贵，眼中嘴里只有高价二字，则堕入下品。欢迎价格回归。



牛栏山

污染

2月19日

环保部督察人员在北京牛栏山酒厂锅炉房翻阅锅炉脱硫记录发现，加入火碱前后的PH值，测出的酸碱值都是6.5。经查，该厂长期编造脱硫运行记录，运行数据与实际情况长期严重不符。

央视

牛栏山与红星是北京二锅头市场双星。

牛栏山酒厂设备部部长王振文称，市环保和区环保部门都到厂里检查过，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督察人员追问：你们填那个表都一个数值，走形式都没有发现？王振文称：“那要发现咱早改了不是。”

不仅让消费者喝酒，还让消费者吸霾。牛栏山管理团队的酒品值得研究。



庆丰包子铺

打假

2月19日

“除了北京市区180家和河北燕郊的3家门店外，没有在其他任何地区开设分店。”庆丰包子宣布维权打假。首个涉嫌侵权企业是长沙世界之窗，后者向游客开售“北京城外独家供货”庆丰包子。由于10元两个的售价及远远不如预期的口味，备受消费者诟病。

庆丰包子铺总部

经查，1月22日长沙世界之窗向庆丰包子铺广渠门店采购5000个包子，1月31日开始在长沙销售。时间太长，无法保质。

北京各种“毛氏红烧肉”笑而不语。



北京草莓

回归平民

2月20日

拿着支票摘草莓者消失了，昌平草莓的采摘价由贵族回归平民，从过去的每斤百十元下降至三十元左右，消费改为以家庭为主。据昌平区农业服务中心统计，今年昌平区草莓价格普遍比去年低了约40%。

《北京晚报》

农户：今年白干了。昌平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王崇旺：“昌平草莓从生产技术上是过硬的，但是后期的市场和服务都不太健全。”

中央规定倒逼市场回归。湘鄂情都去接单食堂业务了，农户也不能只守着“拿支票的人”吧。



2014年2月11日，支付宝推出了年利率预期为7%的理财产品

基金业马年赛马“三招鲜”

在支付宝、微信等两大新土豪于2013年带来了较大新变化之后，基金业在2014的竞争格局将向何处演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祁和忠 | 上海报道

凭借拼爹加拼命的干劲，公募基金业堪称中国金融证券界的“劳模”。

新春伊始，新基金发行紧锣密鼓，货币基金成为多家公司的首选。2月10日至12日，中银活期宝货币基金通过中行等渠道发行。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资金面偏紧局面的持续，未来一段时间内货币基金维持较高收益率依然值得期待。

与此同时，偏股型基金的业绩排名竞赛亦争先恐后。继中邮战略新兴产业以80.38%的收益率，取得2013年冠军之后，2014年1月，兴全基金轻资产、有机增长2只基金分别以28.20%、25.71%的收益率，名列第一、第二名。浦银安盛旗下有3只基金的收益率进入1月份前十名，它们分别是红利精选、消费升级、新兴产业。

但是，兴全同样不能避免旗下基金业绩表现差距悬殊的尴尬。除轻资产、有机增长外，该公司其他基金1月份的收益率都在10%以下，其中，兴全趋势、兴全模式2只基金的收益率分别为−1.62%、−1.91%。

一位“老十家”基金公司高管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股票基金短期业绩排名充斥着偶然性与随机性，中小基金公司指望通过业绩排名领先驱动规模增长的路径，已越走越窄。在支付宝、微信等两大新土豪于2013年带来了较大新变化之后，基金业在2014年的竞争格局将向何处演变，格外引人关注。

天弘基金副总经理周晓明说：“未来可以预计的是，公募管理人的数量会大增，其同质化竞争将减弱，全业务均衡发展可能不再是基金行业的主流，会有不少有特色的专注于某个领域的基金公司出现。”

渠道为王，比拼规模排名

从1998年至2012年，投资者购买基金，主要通过银行渠道。对工行、建行、中行等银行渠道的维护力度，一直是决定基金公司规模排名的首要因素。

2013年起，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在货币基金市场掀起一场革命。投资者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渠道购买基金，且能实现基金赎回T+0到账。从此，投资者通过购买货币基金，不但可获得远高于定期的收益，而且能享受类似于活期的便利。

天弘基金与支付宝的合作，率先创造了中国金融证券史上的一个奇迹。投资者把支付宝账户中的资金转入余额宝，就相当于自动购买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这对支付宝数量庞大的年轻用户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自2013年6月18日正式上线之后，余额宝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分别达42.44亿、556.53亿、1853.42亿。

2014年1月15日，天弘基金宣布，余额宝规模超过2500亿元，客户数超过4900万户。凭借余额宝，天弘基金已由一家中小型基金公司迅速晋升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基金

东方 IC

公司。

在余额宝的示范效应下，华夏、南方、汇添富等行业劲旅纷纷加大在互联网金融的投资力度。1月15日，由华夏与腾讯合作推出的微信版余额宝——微信理财通上线。微信理财通在2014年春节前的规模已突破100亿元。

华夏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助理曲波说："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困扰货币基金、实际上是所有类别基金发展的最大问题——渠道。"在互联网时代，货币基金将借助网络的强大力量实现突破，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互联网金融在不断切走银行渠道的蛋糕，倒逼银行作出应对。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分析师倪韵婷和陈瑶《余额宝等六种现金工具PK》一文中表示，部分银行开始发行银行端的现金管理工具,如平安的"平安盈"、广发的"智能金"、交行"实时提现"等，其背后绑定的都是货币基金。

业绩固本，塑造品牌优劣

2013年，国内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介于3.03%至4.38%之间，其中，工银货币的收益率最高，益民货币的收益率最低。2014年以来，货币基金的收益率维持高位运行。截至2月14日，华夏财富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平均为6.92%。

货币基金收益率稳定，风险较低，是良好的现金管理工具。相对于货币基金而言，偏股型基金的收益率更高，但风险也更大。

作为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基金公司，华夏旗下拥有15只运作时间在1年以上的主动型A股基金。2013年，它们的平均收益率介于-1.84%至34.95%之间，平均为18.43%。其中,华夏经典混合的收益率最高,华夏盛世股票最低,两者相差近37个百分点。这说明投资者不仅要选准基金公司，而且要选好基金。

华夏经典混合成立于2004年3月15日，现任基金经理王海雄于2010年12月加入华夏，2011年3月17日担任基金经理。该基金截至2013年底的净资产规模为18.78亿元，股票占比68.08%；华夏盛世股票成立于2009年12月11日，现任基金经理阳琨于2006年加入华夏，2009年12月18日担任基金经理。该基金截至2013年底的净资产规模为58.87亿元，股票占比84.61%。

路遥知马力。对于股票基金来说，5年的考察周期远比1年重要。从2009年至2013年，华夏旗下主动型A股基金累计收益率平均为81.95%，其中，华夏大盘最高，达170.27%，基金兴和最低，为39.13%。而华夏经典混合以92.63%累计收益率，居第4位。

与货币基金每天都能取得正收益不同，股票基金的净值波动性很大。仍以华夏经典混合为例，从2009年至2012年，该基金历年的收益率分别为62.12%、4.81%、-17.72%、2.09%。投资者只有坚持长期投资，承受股市剧烈波动所带来的折磨，才能最终享受到高收益率。

华夏基金经理王海雄说："未来利率水平上升仍将是实体经济和股票市场投资的主要风险。"他表示，该基金将以中小型高成长企业为核心配置。

易方达的历史业绩表现同样证明了基金选择与长期持有的重要性。2013年，易方达旗下主动型A股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18.13%，其中易方达科讯最高，达51.79%，易方达资源行业最低，为-28.72%。从2009年至2012年，易方达科讯的历年收益率分别为42.39%、-3.53%、-24.76%、5.50%，4年的累计收益率只有9.03%。显然，股票基金的持有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就很难获得超过货币基金的收益率。

易方达基金经理宋昆说："在漫长的转型期，战略新兴产业、泛消费行业将是近年牛股的主要产地。"

创新出奇，鲜花掩盖陷阱

产品创新一直是基金公司做大规模的利器,但对于投资者来说,则往往风险大于机会。

2007年9至10月，作为基金业的重大创新，国内首批QDII基金出海，受到市场热烈追捧。但在2008年，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遭遇重创，投资者至今深套其中。截至2014年2月14日，上投摩根亚太优势的单位净值为0.5510元，投资者在经历了6年多的漫长等待之后，仍亏损约45%，而基金公司则年复一年地按1.80%的年费率向投资者收取管理费。

长盛同庆讲述的是另一个类似的故事。作为创新封闭式分级基金,2009年5月12日，长盛同庆成立，首募规模146.86亿元。在追求短期套利机会的驱动下，认购同庆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占比高达61.76%，华泰财产保险、西南证券、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等都投入巨资认购，而散户持有的比例为38.24%。因发行规模远超原先预期，而且机构持有比例偏大，同庆B上市后不但没有出现溢价，反而折价交易。

在2009年5月12日至2012年5月11日的3年里，长盛同庆未能给持有人创造收益，却给基金公司交纳了6亿多元的管理费收入。2012年5月，该基金到期转型为中证800指数分级基金。

鉴于以往的基金产品创新未能给投资者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反而出现了不少鲜花掩盖的陷阱，近两年来，基金公司通过产品创新来带动规模增长的难度在大幅增加。

2012年5月，华安基金率先推出短期理财基金，引发业界同行纷纷跟进，一时间十分热闹。不过，投资者很快发现，与货币基金相比，短期理财基金的收益率并无任何优势,流动性却较差,因此,这种所谓的"创新"很快遭到市场抛弃。现在，短期理财基金除了继续在为银行系基金贡献规模外，已成为其他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负担。

2013年7月，华安成立黄金ETF，也遭到冷遇。这不仅是因为当时黄金正处于熊市，缺乏财富效应，而且因为相对于市场上已琳琅满目的黄金投资渠道，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黄金ETF并不具备优势。在国际市场，黄金ETF是机构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工具，但国内的机构对黄金ETF还比较陌生。

华安黄金ETF基金经理许之彦说："经过2013年的巨幅下跌，过去积累的金价泡沫得到充分的挤出。"他认为，黄金相对于货币发行总量来说处于低估状态，边际开采供给的降低和强劲的实物需求将是未来黄金价格走稳回升的重要支柱。

老人一直都被认为是消费能力较弱的群体，服务和产品上的缺失，导致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养老市场谁来导航

一个巨大的、层次丰富的中国养老市场的轮廓愈见清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上海报道

一个国际养老产业论坛上，上海市杨浦区社会福利院院长谭玉秋曾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做卫浴的知名厂家上门推销适合老人用的智能马桶。“这个马桶技术非常先进，老人从床上到马桶上整个过程都是智能的，但是我没选择给老人用。因为这个马桶必须装在老人睡觉的床边。我自己身为儿女，肯定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睡在马桶边上。”这类尝试推销给老人用的“适老”产品其实并不适合老人用。“我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去体会一下老人到底需要什么。”

中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人口约为 2 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群



体，但是，长久以来的“银发经济学”中，除了保健品等极少行业一枝独秀外，人们只关注养老院床位够不够。

其实，一个巨大的、层次丰富的中国养老市场的轮廓正在愈见清晰。

适老产品少之又少

“在中国养老市场上，做养老院的多，但是做养老产业的就几乎没有了。人上了年纪之后，对生活的要求会有所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生活空间里的家具、卫生间都有要求，但这些往往被忽略。”广东永爱养老产业有限公司上海区总经理徐亚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中国，进养老院的老人毕竟还是少数，很多人依旧选择居家养老的模式，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些老人就不需要适老的产品。”徐亚峰说。目前，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独立居住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这为专业化老年人用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但老人一直都被认为是消费能力较弱的群体，很少被商家和产业界所关注。这种服务和产品上的缺失，导致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在徐亚峰看来，适老因素优先考虑安全无障碍。“有些投资商租用一栋楼以为就能直接做成养老院，但是养老院房间门的宽度、走廊的宽度都是有要求的，要能让轮椅进出自由。”“适老化”卫浴产品旁边都设置了扶手，以便老年人身体起落时进行强有力的扶持和支撑，洗漱区的产品边角设计圆润、洗漱台高矮要合适，保证了老年人使用中的安全外也便于清洁。

永爱希望成为集老年用品的设计开发、经销和相关服务于一体的老年用品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供应商。2012 年 10 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观了永爱的“幸福生活体验馆”后说“现在设计和服务都已经有了，下一步工作就是要降低价格，让更多人都能够享受这样的服务”。

“目前还属于高端定制阶段，因为市场还没成熟，所以贵，如果能大批量生产的话，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徐亚峰说。

上海同睦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更加关注为业主或者是投资者筹建新养老院，并提供管理以及营运的 IT 解决方案。

“也有一些国外的厂商找到我，希望把老年产品推往中国老年市场。但是很多护具等产品很难在国内卖出去。”严华说，“一方面是价格原因，还有就是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护工，都不会使用。很多老年产品的使用需要培训。”

永爱和同睦成立时间都还不长，都只有两三年。徐亚峰是高级健康管理师，在来到永爱之前，有医院照护方面的经验。而与徐亚峰不同的是，严华在进入养老产业之前在 IT 行业摸爬滚打了超过 30 年。“我现在每天都呆在养老院里，跟老人和护工同吃，跟院长一道查房。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才能知道在养老机构里，老人需要什么，护工有什么诉求，养老机构的管理者又会有什么样的需要。”严华说。

资本摸索进入

与适老产品市场同样焕发勃勃生机的还有资本市场，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养老机构并不是养老行业的唯一要素，如何才能盘活养老产业，社会资本在摩拳擦掌。

以养老地产为例，大型开发商已开始尝试布局养老地产。据了解，目前，万科、绿城、龙湖、复星、远洋地产等房地产开发商均已在养老地产领域争夺市场份额，但是真正提供给老人的生活社区至今为止在市场上还少之又少。

老年公寓确实有着一定的市场。随着空巢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来的居住环境或多或少都无法再适应老年人的生活特点。不方便、不安全成为最大的问题。

记者走访了普陀区几家中介了解二手房买卖情况，走访的 5 户二手房卖家中，有 3 户是老人。“我们卖了这套换个楼层低一点或者有电梯的，我跟老伴两个人住在五楼太不方便了。”其中一户的户主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市场上适合老人居住的住房产品并未真正面世，老人能选择的也只是低楼层、有电梯这些最简单的条件。

用“各路英雄逐鹿中原”来形容现在的中国养老产业再合适不过。除了养老院这个养老终端市场外，养老周边产业、产品开始令资本市场感兴趣。

上海明蔚投资管理公司总部（筹）董事总经理鲍志明就是其中一位。鲍志明有 19 年金融行业生涯。“我要做的就是把金融与养老产业对接。”鲍志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投资是为了回报，“从资本角度与养老产业未来发展对接后产生价值衍生并打造可复制性。如果说从金融端口、房地产端口、养老院端口、衣食住行行业端口、周边度假村或俱乐部端口，来做整体金融整合的话，养老产业的盈利点就不再那么单薄了。”

鲍志明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比如我参股一家养老院，同时，与周边旅游和医院等合作，让能够自理的老人参加旅游活动，拉动周边旅游经济，并让无法自理的失禁失能老人住进医院得到专业护理。”他已在着手准备标准化护理流程养老工作者的培训。

上海红日养老投资管理（集团）董事长陈琦 8 年前还在从事化妆品行业。“我和养老院结缘，非常偶然。我有个老同学在民政局工作，他告诉我，现在社会上老人越来越多，养老床位非常紧张，等着入院的老人排长队。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办养老院，解决老人入院难。”陈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我就决定试一试。”八年来，陈琦在上海做了三家养老院，“我做的是连锁养老院，一个小规模的养老院养不起专业的人才，只有集团化、连锁化经营才能降低成本，有效利用资源。”陈琦说。今年，



红日在江苏常州建立了一家养老机构。

"我并不做高端养老院，也不做最基本的福利院，我关注的是中端的，跟政府错位经营。"陈琦说。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简称35号文件），这是国务院首次以文件形式发布的对于养老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如何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成为35号文件出台后，大家关注的焦点。民办养老机构在民政部门登记时，绝大部分注册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因为其非盈利性质，困扰制约了很多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

养老服务卖给谁

"爱照护"的首席执行官丁勇曾在国际养老产业（上海）展览会暨峰会上曾分享过他们所做的调研结果："我们发现老年人在75岁以后，自己能作的决定不多了。"

"爱照护"创建了中国首个基于失能老人照护按需数据可视化和照护、状态检测需求的智能化解决方案。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

"子女跟老人不在一起的时候，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可以直观地看到对父母的检测数据，能够作出及时的照护，参与到父母的养老中来。"丁勇说。

"现在的养老服务主要针对的是80岁左右的老人，也就是'30后''40后'，他们对于这些养老服务的新产品可能还不太接受，但是之后的'50后''60后'老人的购买能力以及生活习惯就不同了。"徐亚峰说。

在养老问题上，儿女角色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被抹灭。"我一直都说，我们的客户不仅仅是老人，更是他们的子女。老人的很多决定也都是子女在帮着做。"上海银康老年公寓院长汪晓鸣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说。

上海银康养老院现在有462个床位，她把这里比喻为一个中试车间。"围绕老人长期照护不同阶段，开展不同护理照护模块标准流程的探索。在这里入住的老人儿女是要定期开'家长会'的。在做这个养老院项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引入了很多新的理念，一直专注于老年人文化养老、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希望能够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养老的模式，能给同行参考借鉴。"汪晓鸣说。

在汪晓鸣看来，"先进的办院理念确实会吸引人来入住。老人的儿女一般都会愿意尝试。"但是，"老人未必喜欢这些。"

汪晓鸣分享了这样一个例子："当时我们跟厂商合作，为老人配备了老人手机，按键大、有收音机、手电筒等功能。但是非常失败，老人更想换回家里那样的座机，于是我们不得不让厂商更换，把芯片放在一个座机样子的电话机里。"

汪晓鸣的工作履历包括了高校任教、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投资等。近几年来开始关注和研究养老产业并投资了多家养老产业相关的企业。"一方面是在为自己这代人的养老做准备，另一方面，养老产业是不衰的长久事业，尤其在中国。"汪晓鸣说。

关心养老服务的不仅仅是老人、子女，另外一方的力量更加不可小觑，那就是政府。早在2003年上海政府推行"居家养老"的时候，一个叫"居家养老服务券"的东西就应运而生。经过社会福利行业协会评估后，一些老人每个月支付给钟点工的报酬中，有一部分由政府通过"服务券"的方式承担。

2010年，上海在全市社区配备事务受理、文化和卫生中心之后，正在进一步推广设立社区生活服务联动中心，以居家养老服务为重点，形成较为完备的社区服务体系。"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在逐渐丰富。在建立准入机制和服务标准的前提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力量具体运作，面向老年人提供"一键通"的紧急救援服务，针对独居老人提供"每日主动关心"服务。

例如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将其社区生活服务联动中心交由社会力量创办的"96890"社区服务机构来具体运作，通过在线服务、呼叫中心、远程定位监控和社区车辆巡视，组成全方位、个性化的社区服务网络，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创出一种新模式"。

通过多年的尝试和探索，我们该相信，在财政不断提高养老投入的情况下，政府与其担负着每年不断增加床位数的压力，不如引导市场提供更多样的养老服务产品。



2013年11月1日，南京，老年产业博览会一家参展眼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为老人免费筛查眼疾

东方 IC

一起打车吧

大家都认识到，相比起线上，线下的服务业是一块更大的蛋糕，所以，如何从线上到达线下成为核心问题

文 | 张瑜

打车不花钱，你信吗？

在腾讯和阿里巴巴的支持下，打车软件“嘀嘀”和“快的”展开了越来越血腥的对决，可谓大快人心。

事情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2014 年 1 月，嘀嘀打车获得了高达 1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腾讯正是其中一个投资者。随后，两者即刻开展了战略合作，嘀嘀接入微信支付平台，乘客与司机如果使用微信支付来交易打车费，司机每单可获 10 元补贴，乘客也可以减免 10 块钱。

而作为阿里巴巴投资的企业，快的打车也早已与支付宝完成了联结，从开始每单司机和乘客获得 5 块钱奖励，到后来不得不跟着嘀嘀将价码抬到 10 块钱。

在年后，双方的火拼达到了高潮。在 2 月 17 日和 18 日两天 48 小时之内，嘀嘀和快的进行了疯狂的竞价，你 10 块、我 11，你 12、我 13，嘀嘀甚至推出了随机大奖，最高减免可达 20 元。有意思的是，微信把全民飞机大战游戏里的道具也作为了奖励，凡每周使用微信支付车费 10 次以上，就能获得高端战机一架。

阿里巴巴也不是没得玩，你有虚拟战机，我也有淘宝天猫平台的退货保障卡，而且只要累计满 5 次就能得到，借此可以在淘宝和天猫上退货时享受包邮服务。

有人还设计了这样一种不花钱的作弊方案，一趟 23 块钱的行程，先用嘀嘀叫一次，返 12，再用快的叫一次，返 11 块钱，这样自己一分钱也不用出了。

看到这里，如果还没有由衷地感动，那就真的太不厚道了，人家可是拿着数以亿计的真金白银出来讨用户欢心。这种真诚是沉甸甸的。

必须承认，互联网巨头在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真是令人赞叹。从开始的虚拟世界——便捷地沟通和互动、随时随地获得信息和娱乐，到如今延伸到现实世界——足不出户地购物、基于位置的各种生活服务，甚至是帮我们跨越银行的鸿沟轻松理财，这些都令我们的生活成本大大降低。

今天，无论再怎么闹腾，中国互联网的格局其实已经是相当稳定的 TAB 三足鼎立——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尽管百度的体量庞大，但其搜索营销业务越做越专注，以至于做其他的怎么都不成功，就拿打车来说，百度地图也有打车服务，但用户们却对此知之甚少。真正能打出戏来的，也就是腾讯和阿里巴巴这双马大战了。

两巨头虽然都姓马，但却牛性十足。截至 2013 年 9 月腾讯第三季度营收为 155 亿元，阿里巴巴虽没有具体的财务数据，但根据其旗下淘宝天猫每天经手的销售流水来推算，也不会差。所以，即便拿出个十亿八亿的来补贴中国人民打车，对他们而言也不是多大个事。

现在，就算是开车的和打车的，也都知道这场战争根本不在嘀嘀和快的之间，而在腾讯和阿里巴巴之间。

不得不承认，巨头们居安思危的精神很值得学习。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成为一个关键词。如今，大家都认识到，相比起线上，线下的服务业是一块更大的蛋糕，所以，如何从线上到达线下成为核心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巨头们拼命抢占各种移动入口，以截获用户，进而主导他们的线下消费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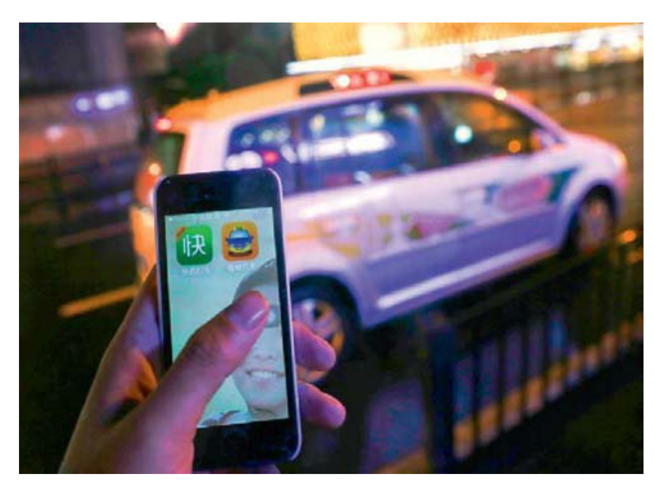
对 TAB 这样钱多愁花的巨头来说，投资并购就是个最便捷的方式。现在，你可以想到的所有互联网元素，IM、地图、团购、音乐、视频、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等每个领域的佼佼者，除了极个别的如优酷，几乎都成为了三巨头的棋子。

最新的消息是，腾讯投资了大众点评网，与此同时，有传闻腾讯将投资京东，并将其旗下电子商务平台易迅与京东合并。另一个传闻是，作为回报，阿里巴巴已与腾讯的死对头奇虎 360 敲定了投资事宜。

血战在即。

不过，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些庞杂的业务逐渐统一在了三巨头的平台上，并正在形成一种趋于和谐的贯通，最终也会带给用户便捷的体验，减少选择的时间成本。

至于他们之间的竞争，只要不伤害用户，甚至还可能给用户带来实惠——比如打车这事儿，就随他们去吧。我们所要做的，是拿着自己手中的选票，督促他们变得更好，而我们，则投给最好的那一个。



2014年2月18日，上海，快的打车和嘀嘀打车真的“杠上了”

拿着数以亿计的真金白银出来讨用户欢心，这种真诚是沉甸甸的



广东东莞，夜幕下的东城酒吧街

杨江华：“全科”警官空降东莞

在2008年6月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杨江华表示，“我对个别女性沦为‘三非’外国人贩毒同谋非常惋惜。在这里，我希望她们自尊自爱，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

文 | 冯俊才

干他这行的人常常会刻意在舆论中把自己隐藏起来。可如今对杨江华来说，让自己隐形于媒体，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自从媒体透露他履职东莞之后，关于杨江华的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2014 年 2 月 17 日，东莞市市政府官方网站信息公开栏中，杨江华的最新工作安排已列出，市公安局最新的领导分工安排表上，杨江华职务栏为：副市长、市局党委书记、局长；分管工作一栏显示：负责全面工作。

两句话的简历

杨江华进入焦点传播的视野是在 2 月 14 日。

2 月 14 日下午，东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召开。这次会上，东莞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就人事任免事项进行了表决，决定任命杨江华为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为杨江华颁发了任命书。

同一天，百度百科“杨江华”词条被拆分为

CFP/漫画：大尸凶

两个：1. 东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2. 眼科医师。前一个杨江华的简历，是 2 月 14 日晚新建的内容：男，2014 年 2 月 14 日起任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东莞市公安局局长。杨江华之前曾担任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局长、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等职务。

大部分媒体报道的杨江华信息，约等同于这份两句话构成的再简单不过的“简历”，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教育背景等都难以查询。

相对“丰富”的介绍来自香港《文汇报》的一则消息。这篇报道称，“杨江华是一名资深警官，有丰富的一线从警经历，先后在广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禁毒局、刑侦局担任正职。此次空降东莞之前，其已经担任刑侦局长之职超过 5 年，参与过大量大案要案的侦破和指挥工作”。

阅历丰富的资深警官

不过，仔细检索相关媒体报道，可佐证杨江华丰富的从警经历。

如新华社记者于 2001 年 5 月报道的《全国最大假金融票据诈骗犯罪团伙案侦破纪实》文章中，引用了时任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队长杨江华的采访。

2003 年人民网记者采写的一篇题为《大案侦破写真：广东惠州地下印钞厂覆灭记》的报道里，杨江华同样以广东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队长的身份出现。这一年,杨江华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上刊发了一篇学术论文——《入世对经济犯罪的影响及对策》。

2005 年 3 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栏目里，杨江华仍然以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的身份介绍了广东经侦的一些经验，其中提到，作为一名侦破经济案件的警察，“他不是一个流水作业的工人，他是一个时刻都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去研究问题，非得要自身动脑筋去研究案情，研究线索，研究这个罪犯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才有什么办法获得证据把他绳之以法推上法庭。”

六个月后，即 2005 年 9 月 16 日，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挂牌成立，杨江华被任命为该局首任局长。这也是缘何有媒体以《广东公安厅“扫毒大将”杨江华接掌东莞公安》为题刊发其履新东莞的消息。

杨江华统帅广东禁毒期间，影响最大的一



成龙

成龙近日抵达英国参加活动，跟威廉王子见面握手，虽然双方都表示是对方的超级粉丝，不过成龙却祝威廉王子“远征南极成功”，威廉王子尴尬地否认说：“不，那是我的弟弟。”

大哥啊，他俩不是双胞胎！



成都的邱勇、牟坤等 4 名自驾游爱好者 AA 制合资，花费 2 个半月时间，自行设计、改装了展开面积达到 24 平方米，可供 12 个人居住，里面可以打麻将、唱 K、洗澡、做饭的移动别墅。







扰虎青年

2 月 16 日，一名 20 多岁的男子爬树翻入成都动物园孟加拉白虎的围栏中。他张牙舞爪地挑衅白虎。所幸孟加拉白虎比较温驯。园方工作人员说，若是他翻进的是东北虎围栏中，可能……

选择性骚扰。

陈桂珍

宁波的陈桂珍女士，在元宵节制作了一批独特的迷你汤团。一分硬币上放着 62 只汤团，汤团虽小但五脏俱全，每只里面都包有猪油芝麻馅，而且只只不露馅。

算一算，吃多少个才能饱。



桩“战果”是破获“陈伟华”特大制贩毒品案。这起于2006年年末被破获的特大团伙制贩毒品案，将多国警方追捕十多年的国际大毒枭陈伟华抓捕归案。杨江华本人介绍，“此案的侦破是广东开展国际禁毒情报交流与合作的成功典范，充分体现了广东省的缉毒战斗力，提升了我国禁毒部门在国际禁毒领域的声望。”

在2008年6月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杨江华表示，个别崇洋媚外的女性甚至沦为“三非”外国人的姘妇，心甘情愿充当其贩毒的“马仔”、毒品犯罪的同谋，为“三非”外国人领邮包、藏匿毒品等。“我对个别女性沦为‘三非’外国人贩毒同谋非常惋惜。在这里，我希望她们自尊自爱，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

杨江华

到了2009年2月17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第六场治安专场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杨江华，职务已经更新为“广东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局长”。

但当天发布会上介绍的2008年的扫毒成果，仍然属于他的“成绩”——“2008年全省破获毒品犯罪案件746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742名；缴获海洛因186.4千克、冰毒912.4千克、摇头丸和冰毒片剂357万粒、易制毒化学品27.76吨；捣毁毒品合成工厂23个、加工窝点91个。”

此后在媒体偶尔出现的杨江华，专注于广东的刑事犯罪领域。

2013年11月10日，杨江华应邀到广东警官学院开设“侦查系讲座”——“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刑警队伍”。据该校公开信息，参加讲座的学生包括侦查系老师和2013级侦查学、经济犯罪侦查、禁毒学专业全体学子和其他年级学生。

侦查学、经济犯罪侦查、禁毒学，这三个专业囊括了杨江华厚厚的从警背景。

据广东省公安厅的信息介绍，经济犯罪侦查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主要职责是指导或直接侦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占、职务侵占等犯罪案件。刑侦局（刑事警察总队）主要职责是指导刑事侦查工作，分析研究刑事犯罪情况以及组织、协调或直接侦办重大、特大刑事案件。禁毒局的职责描述更具体些，包括“掌握全省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情况，组织指导全省公安机关开展禁毒工作，研究制定毒品犯罪预防、管理和打击对策……”

三个不同领域的锤炼，让杨江华拥有了“全科”警官的丰富实战经验。

东莞“扫黄”回放

杨江华厚重的职业经验，让舆论对他履职东莞有了更多的期待和猜想。因为，此时的东莞，已在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丰富而密集的东莞信息，集中喷发于2014年2月9日之后。

2月9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东莞色情业暗访报道，曝光了十多家涉黄酒店，视频中东莞110数次接报却不出警。新闻播出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批示，对全市拉网式排查，先治标，再治本。当天下午，东莞共出动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抓获67名涉嫌色情交易的人员。中堂、黄江等五个镇领导被诫勉谈话，所在地派出所长均被先停职再调查。

2月10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省公安机关集中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扫除娱乐场所涉黄问题专项行动。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春生在会议上要求，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将铲除涉黄问题作为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具体举措，采取超常规措施向“黄流”宣战，坚决遏制涉黄问题的蔓延。公安部当天派出督导组赶赴广东，对案件查处、问题整治和责任追究进行指导督办。

2月11日，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莞香花开”公布东莞市“扫黄”专项行动举报电话：0769—22222107，吁请广大群众举报。

2月12日，东莞市纪委发出紧急通知，强调查处不力再被举报仍有涉黄活动并查实的，属地镇（街道）党委书记、公安分局长、派出所长、村（社区）书记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从严处理，涉黄党员干部则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从严处理。截至当天13时，广东省公安机关共抓获涉黄违法嫌疑人员920人，刑拘121人、行政拘留364人，停业整顿歌舞娱乐场所38间，桑拿按摩场所156间。同一天，香港警务处澄清，东莞“扫黄”行动被拘捕的人员中，没有香港警务人员。

2月13日，广东省召开全省市公安局长会议，再一次强调要深入推进打击整治涉黄问题专项行动，切实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增强群众安全感。当天，东莞市纪委对10名扫黄不力警员作出失职处分。这些警员之前曾被媒体曝光，拨打110举报东莞涉黄问题后，存在接处警和警情处置不力等问题。

2月14日，问责处理东莞多名扫黄不力负责人。广东省委常委会当天研究决定，免去严小康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东莞市委决定免去东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卢伟琪职务。

2月15日，东莞市纪委派出12个督导组到全市32个镇街督导扫黄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是督促党委书记、公安分局局长、派出所所长、村（社区）书记四级主要领导干部抓落实，确保全市扫黄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问责并行

与雷霆万钧的扫黄行动并行的，是雷厉风行的问责与追责。

东莞部分娱乐服务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公安部派出督导组赶赴广东指导督办案件查处、问题整治和责任追究工作的同时，还建议广东依法依纪严肃追究东莞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和其他有关负责人、民警的责任。

公安部强调，“不管涉及到谁，不论职务高低，都坚决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对失职渎职的，要坚决严肃追责；对执法犯法的，要坚决从严惩处。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月14日，东莞大规模扫黄的第五天，东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严小康被免职。

漫画：大尸凶

1963 年 10 月出生的严小康，有整整 20 年的时间是在广东清远工作。2008 年 10 月，他以清远市佛冈县委副书记、县长的身份调至东莞，担任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同年 12 月，他的职务增加了两个：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东莞生态园管委会主任。

到 2012 年 1 月，严小康的职务栏里是：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东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广东东莞生态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一个月后，严小康的职务由“东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调整为“东莞市公安局局长”，其他身份未变。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 2014 年 2 月 14 日他被免职前。

广东省委 2014 年 2 月 14 日的通报称，严小康在任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没有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东莞市涉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在国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广东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对严小康进行问责，免去其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同一天，东莞市委研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免去卢伟琪东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免去黎志辉中堂镇党委书记职务，同时免去其镇人大主席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免去何成中堂镇党委委员、中堂公安分局局长职务，免去邓金祥黄江镇党委委员、黄江公安分局局长职务，免去张国贤虎门公安分局博涌派出所所长职务，免去王沛基厚街公安分局厚街派出所所长职务，免去李太山凤岗公安分局油甘埔派出所所长职务。

同时，东莞市委还责令黄江镇党委书记杨礼权、虎门镇党委书记叶孔新、厚街镇党委书记钱超、凤岗镇党委书记朱国和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道歉。2 月 15 日刊发的《东莞日报》第二版上，刊登了上述四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公开道歉信。

而据新华社记者 2 月 17 日从公安部获得的消息，广东东莞部分娱乐服务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问题被曝光后，公安部立即部署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专项打击整治，严查涉黄场所窝点，严打涉黄犯罪活动。

文章援引公安部消息称，“2 月 9 日以来，各地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 1300 余起，查破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和组织淫秽表演等刑事案件 181 起，打掉涉黄犯罪团伙 73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01 名，停业整顿涉黄场所 2410 家。”东



追星女友

沈阳姑娘爱平迷上了韩剧《继承者》主演李敏镐，竟对自己的男友说：“你要是真爱我，就整成李敏镐！要不然，分手！”

姑娘，麻烦您先将自己整成朴信惠吧。



比尔·盖茨

“地上的 1000 块钱，比尔·盖茨捡不捡”的段子流传甚广，这个问题现有了标准答案。日前比尔·盖茨在一项活动中，明确表示：捡！应该捡起来还给失主。

各位失主有礼了。





雷切尔·拉格

英国一名母亲雷切尔·拉格“矢志”把女儿嫁入豪门，称倾家荡产送女上名校，为的就是找个高富帅郎君。虽然现在女儿还只有 9 岁，但她已经开始物色有希望的女婿了。

这种家风不宜扩散。

法国记者

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美国，一些法国记者借此之际，以奥巴马为背景在白宫大玩“自拍”，引发美国官员不悦。

建议法国引进记者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中国人一辈子都是讲责任

—— 历史学者姜义华谈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暨根柢（访谈之二）

西方讲原罪，讲人的一辈子是赎罪，要到教堂里去忏悔，而中国人的一辈子则是讲责任。从出生到老死，你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都有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 | 上海报道



姜义华，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1939 年生于江苏扬州。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

1995 年 9 月应邀在日内瓦第 35 届国际论坛上就中国正在进行的和平革命作主题报告，是该论坛成立 50 年来邀请的第二位中国学者。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传统小农社会及其近代变迁”、“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转型”、“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突破性创新研究成果。代表作有《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现代性：中国重撰》、《章炳麟评传》、《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中华文明的根柢》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核心价值：民本、重义、中和

《瞭望东方周刊》：整个中华文明基本架构和核心价值的形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姜义华：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形成是在先秦时代，至少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

为什么从西周说起呢？因为《尚书》和《诗经》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体现了直到今天尚存的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一些核心价值。春秋战国时期，从孔子老子墨子到后来的孟子庄子的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都已经形成了。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更稳定的文明形态，是在秦汉以后，这时中国已经是大一统国家，先秦时代形成的核心价值到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处于支配地位，不仅渗透在中国上层政治生活中间，也渗透到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间。这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固的价值系统、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核心价值主要有哪些呢？

姜义华：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民为国家之本的观念，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等到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

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则是"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在先秦时期，除了杨朱强调"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他各家在讲"义利之辨"时，都强调义和利不能分离，比如墨子讲兼爱，儒家讲大同等。就是说考虑任何问题时，不能只考虑自己，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

自利和他利的关系，私利和公利的关系，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其实在中国很早就有人在思考。比如古人说春夏秋冬四季，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能做，都是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后来的发展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义和利的关系。这些在先秦时代都有了相当完整的论述。

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中和"思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谐"。"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思想在先秦时代已经很流行。人与人之间不能仅仅是竞争关系，不能仅仅是弱肉强食。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很讲求"和为贵"，这其实就是在强调矛盾的统一，相互渗透、结合，相辅相成。

先秦时代也形成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就出自《周易》第一卦《乾卦》。国与国之间，虽然竞争冲突不断，但最根本的还是文化关系，"华夷之辨"反映的就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中华文明更看重的则是以德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目标是普天之下都能沐浴到文明的阳光。

寻求民族传统与精神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传统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中华文明主要活跃的地方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以东，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曾跑得很远，但是中国并没有在那些地方建立殖民地，也没有把那些地方作为自己掠夺的对象。明成祖的时候，万国来朝，很多国家都以朝贡形式与中国交往，这对中国来说还是亏本的买卖。因为他们带一些新奇的贡品和土特产过来，收到的回报则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后来明王朝的财政都不堪重负了，就叫人家都不要来了。

和西方在海外的殖民掠夺不同，中国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海外扩张。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基本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讲自给自足，不讲大规模地对外扩张。

当然，在今天市场经济、工业化条件之下，世界联系要密切得多，但是我们这个文明是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存在的。我们讲的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形成优势互补，从而共同创造一个更和谐的世界。这可能更符合中华文明的基本特点。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套核心价值会在先秦这个特殊时期形成呢？

姜义华：这首先是由于中华文明，尤其是农耕文明的发展。五六千年之前，中国已经有稻作，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到那时已经形成。 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也很早就开始了，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到了先秦时代，与北方的犬戎，西南山林地区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变得更频繁。对于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那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所以，一方面有了相当稳定的，日臻成熟的农耕文明，又和周边的游牧文明有了长时间的交往，这是文明核心形成的基础。另外，当时的商品经济、商业活动已经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展开，能够把不同的农耕地区乃至游牧地区连接在一起，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一些核心观念。

《瞭望东方周刊》：先秦时期正处于世界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许多文明，包括希腊、印度等都在形成着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和其他文明产生巨大的差异？

姜义华：我们这个巨型国家基本位于帕米尔高原以东，是个相对自我独立的区域。而希腊罗马文明是属于海洋文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中华文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

今天现代化发展的所有层面都有两面性，整个世界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发展的。

明，它以地中海为中心，包含北非、西亚、南欧和后来扩展到的中欧。先秦时代的齐国就和希腊罗马有些相似，靠海边，宗教色彩比较浓，因为海边风云变幻，这和内陆的农耕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地中海周围，基督教、天主教都能广泛传播，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寄希望于上帝和来世，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文明起源的时候，地理环境肯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还有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会对文明之间的差异产生影响。

大一统——中华文明根柢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究竟何在？它的根柢究竟是什么？*

姜义华：我所说的根柢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大一统国家虽然是秦汉以后才形成的，但是从夏商周，特别是西周开始，尽管当时是分封制、诸侯割据，却已经有天下共主——周天子存在。所以最初的大一统思想从那时已经开始形成了。世界上其他的文明，统一国家的时间都比较短，而中国是几千年来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大一统国家。虽然其中也有过多次短暂的分裂，但是很快又重新统一。这是由于农耕文明需要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交往时，也需要长期保持一种稳定的格局。

而中国之所以能长时期处于大一统格局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一整套的制度建设，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中心的官僚治国体系。从汉代选举贤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举制，它的核心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精英，由他们变成职业官员，负责国家治理。

过去我们一直讲这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其实毛泽东早在1972年就曾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有几句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几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谈毛泽东怎么从巴黎公社式的理想，一步步转到承认“百代都行秦政法”。他原来想用巴黎公社式的理想，即直接选举，公务人员低工资，随时可以罢免等用于中国，后来发现一搞那样的直接选举，全国到处混乱，连清华北大内部都打得不可开交，到最后，他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是有非常深的合理性的。

为什么要熟读唐人《封建论》呢？因为柳宗元的《封建论》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秦始皇搞郡县制，想搞万世一系的国家，就他个人来说是为私利，但就这个制度的建立而言，它使得“公天下”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把国家变成了“公器”，由选拔出来的精英负责国家治理。

现在我们认为西方的选举制很好，其实中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文官治国的制度。官僚是从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精英，而选拔他们的科举考试，首先考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品、治国的核心观念等等，具体的治国技术是要到实践中学习的。

这种以德选拔人才，以德治国，就形成了一套把“公天下”变成实际的文官治国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中最核心的东西。当然，它也在不断受到破坏。在实践过程中，这些官吏并不一定能真正坚持“公天下”，很多人也会为了自己的私利，但那套制度的形成，使这个大一统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这套完整的制度中包含了权力的制约与制衡，官员的选拔、监督、考核等。

《瞭望东方周刊》：*看来这套制度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姜义华：的确是这样的。比如唐朝考核官吏的方案并不比我们今天的差，而且它不纯粹是GDP挂帅，还要从方方面面来考核。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了，什么时候做得比较好，什么时候完全流于形式，这都可以再探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套制度在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这套制度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其他很多问题，但是它对于保持我们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文明虽然多次受到外部的冲击，但因为有这样一套制度，所以仍能坚持下来。

家国共同体——中华文明根柢之二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样的根柢呢？*

姜义华：第二个根柢就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我称之为家国共同体。

中国很早就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各种活动，这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商鞅变法之前，虽然在井田制之下，人身依附关系仍然表现得很突出，但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家一户为单位。到商鞅变法时，一家一户确定了自己的土地、财产支配权。汉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细胞基本上就是五口之家。但是单独一个家庭，其安全性和稳定性都不能保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家庭之上有家族，再到乡里、郡县、国家的层级关系。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把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看作一个整体。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能维系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

于我们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家国共同体。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形成了责任伦理。过去我们一直批判伦理本位主义、道德本位主义，泛道德化，但其实中国人讲责任是很重要的。西方讲原罪，讲人的一辈子是赎罪，要到教堂里去忏悔，而中国人的一辈子则是讲责任。从出生到老死，你对家庭、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子女和父母、老师与学生、君主与臣民之间都相互有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家国共同体现在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呢？

姜义华：市场经济、工业化、城镇化等等都在冲击着它。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共同体在今天的条件下同样有生命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到欧洲去，到处都可以看到温州人开的饭店，意大利的皮鞋、皮革用品，很多也都是温州人制造的。我去调查过，温州人最初是举全家族甚至全村之力支持一个人出去，这个人出去后在外面打了天下，再把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带过去。我在梵蒂冈碰到一个饭店老板，他先后带出去83个人。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世界性的联系面前，家国共同体还是有生命力的。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似乎更为突出？

姜义华：当然。但是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个人本位、个人自主意识在今天的发展，的确使得个人权利越来越被重视。但无论是日本文明还是中华文明，欧洲式的那种个人本位还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因为在这里家族的根很难一下子全部拔起。这是东方人和西方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在西方，市场经济、工业化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但到了中国，纯粹的个人本位反而不容易真正站住脚。西方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有时也要讲人情关系，因为他们发现一纸契约有时候甚至不如口头约定。

道德责任——中华文明根柢之三

《瞭望东方周刊》：中华文明的第三个根柢是什么？

姜义华：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这是和责任伦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不讲宗教，西方讲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中国讲的则是“泛道德主义”，把教化放在第一位，讲人的现实生活。

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成为君子。中国人的价值体现在能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作出什么贡献。所以中国古代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第一是“立德”，在道德上是否能得到很高的水准；第二讲“立功”，你为社会做了什么功业；第三讲“立言”，你在理论上、思想上、学术上作了什么贡献。不像西方那样，人向上帝赎罪了才能不朽。这就形成中国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伦理。

前面讲的两个根柢分别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而这第三个则是精神层面的。中国人在精神层面注重道德修养，所以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先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人内在的修养。这个修养不是归于上帝，而是自己怎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的这句话其实正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一个概括。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中华民族得以维系靠的并非宗教，而是这种……

姜义华：教化，这种道德伦理，这种责任精神。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

姜义华：中国农民中也有民间宗教，但在分散的农民中间很难形成统一的教会。在西方长时期的封建社会中，贵族与贵族之间是对垒的，国王没有多少实权，制约他们的主要是宗教的力量。教会、教皇和大主教等都有很高的权威，很大的权力。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中，选拔社会精英进行文官治国，就很难容许另一种政治力量凌驾于皇权之上，并直接冲击这种维系国家统一的基本文官制度。

所以，中国的宗教力量一直存在，但也一直处于政权之下，而它真的一旦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必定导致国家的混乱。比如武则天时代，佛教有一段时间要介入到宫廷政治中间，马上就使得整个政治生态恶化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西方的统一宗教、统一教会、政教合一格局的原因。这不适合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国情，也不适合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需要。东



2013年11月5日，安徽省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里秦始皇和兵马俑雕塑

新能源车的换道之惑





令人不解的是，众多利好政策出台的背景下，新能源车购置补贴却悄然减少：2013年国家补贴为3.5万至5.4万元，而今年则为3.325万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 | 上海报道

开开制图

2014 年“又”被业界称为新能源汽车的“元年”。

2013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推动节能环保和再生产品消费。政府公务用车、公交车要率先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同步完善配套设施。到 2015 年使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到 50% 以上。

这一政策激励成为 2014 年的又一个“元年”的兴奋剂。

翻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史，被称为产业元年的年份不少于三个，只是每一次的激动人心最终都未能被市场认可。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重点开始转换跑道。

公交车、公务车首选新能源车

2013 年大部分城市雾霾漫天，以往笑看华北的华东、华南接连“沦陷”于霾。人们开始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找寻污染的来源，汽车尾气排放难逃其咎成为重中之重。

对环境污染的抗击，赋予新能源汽车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3 年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中指出，新能源汽车有望成为 2014 年新的增长亮点。多地主管部门相继出台各种政策或酝酿出台相关政策，以加大当地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应用。

据中新网报道，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陈贵如在“2013 全球新能源汽车大会”上称，北京和新能源汽车推广相关的局办已经对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达成一致，并进行了会签。

按照计划，北京对新能源车的市级补贴将和国家补贴同等额度。规划显示，北京将于 2017 年推广 17 万辆新能源汽车，其中，2014 年计划推广 2 万辆，2015 年计划推广 3 万辆，2016 年和 2017 年均推广 6 万辆。

上海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此前透露，上海将严格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强度，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至 2015 年，上海计划私人购买新能源车达到 2 万辆；在新增或者更新的公交车中，新能源和清洁燃料车的比例达到 60%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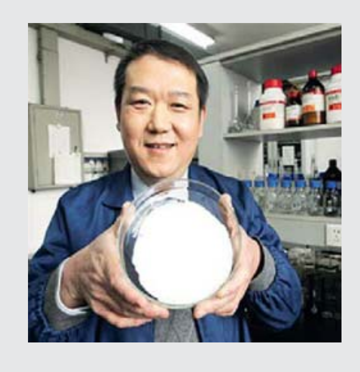
合肥市 2013 年底累计推广 8000 多辆新能源汽车，其中乘用车 6500 辆、客车 1500 辆。在公交领域，2013 年已经推广 300 辆新能源公交车，2014 年计划推广 2000 辆新能源汽车。对私人用户以自有燃油汽车换购新能源汽车者，合肥市财政给予 3000 元 / 辆的一次性补助；购买新能源私家车者，享受每千瓦时补贴 3000 元的标准。

安徽的芜湖市带头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推广新能源车 105 辆。加上第一批推广的 100 辆新能源汽车，安徽芜湖公务用新能源汽车共达 205 辆。据悉，安徽芜湖公务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将结合芜湖市公务用车改革，以租赁新能源汽车模式逐步取代燃油用车。

杭州市经信委汽车处处长何秀林表示，未来两年，杭州计划推广 6000 辆新能源汽车，其中 2014 年将推广 1000 辆。从车型分类看，6000 辆新能源汽车包括 2000 辆租赁车辆、1000 辆出租车、300 辆公交车，其余为新能源物流车、政府公务公车和私家车辆。

政策已给出明确的信号——公交车和公务用车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加速跑道。相对过往的几次“元年”，2014 年更有优势：过去新能源汽车多期待私人用车市场的启动和发力，而公务车和公交车市场相对前者而言，政策执行更加严谨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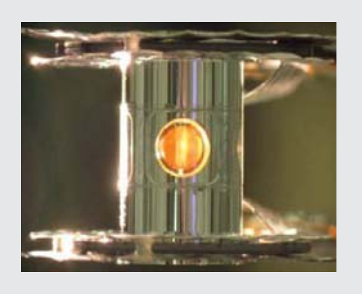
1000℃高温耐火纸，能包住火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消息，该所最近已成功合成出一种高柔韧性、可耐 1000℃以上高温的新型无机材料纸张——羟基磷灰石“耐火纸”。

高柔韧性“耐火纸”不仅可以作为永久和安全的信息存储介质将重要文字、文件及档案等长期保存，还可作为从废水中有效去除有机污染物的可再生吸附剂、药物控释载体、骨缺损修复材料、医用纸、阻燃材料和耐高温材料等。

科学家创造出“微型太阳”



据美国媒体 14 日报道，尽管只持续了短暂一瞬，但美国科学家还是重复了太阳制造能量的过程，创造出一颗“微型太阳”。这重新燃起了外界的希望，即核聚变或许有一天能成为地球上一种源源不绝的廉价能量来源。

在美国能源部旗下的实验室于去年秋天进行的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全世界最强力的激光装置朝一个豆粒大小的目标发射激光，并触发了核聚变反应，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

上述研究的结果发表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

智能电动婴儿摇篮推出



由 4moms 公司推出的这款名为 rockaRoo 的智能电动婴儿秋千摇摆椅，与传统的婴儿秋千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摇摆动力来自于设备下方，而不是上方悬臂处的挂绳。通过反向的摇摆设计可以使晃动幅度控制在限额的 70% 以内，这样不仅保证了安全，同时还能够通过复杂的算法和机械装置进行多级调速，为上面的宝宝带来更多的乐趣。

公交车盈利模式难复制

2000年钱亮从吉林大学毕业，此后他在比克电池这家国内第二大电池生产商任职至2013年。钱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公交车和公务车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产业化方向。"

"从技术角度考量，新能源公交车的盈利模式和经济性已相对成熟。新能源车在公务车领域的使用除了便于管理外，还具有相当的示范性作用。而在私人用车领域，新能源车的经济性依然较低。"

这一低经济性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电池技术的突破，以及如何降低成本。

《新世纪周刊》2014年新一期的报道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1月8日"201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大会"的投资夜话上，50多位电动汽车领域投资人聚在一起。新天域资本董事衣进表示，电动车推广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成本，这个成本最大的瓶颈在于电池。他认为目前市场上电池"能量密度太低"，导致整车的重量和成本增加。

而新能源车在公交车市场的成功模式并不具备复制在私人用车市场上的可能性。深圳一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桥头堡，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机构融资等各个方面都具备相对成熟的经验。

深圳市政府推广纯电动公交车采用"融资租赁、车电分离"的模式。政府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将中国普天作为运营商引入深圳市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中，由中国普天出面做担保，向银行进行融资。中国普天负责出资购买电池，租赁公司出资购买裸车，整车租赁给公交公司运营8年，三方参与利益分成。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羽在2012年电动汽车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上给出了具体数据：截至2012年6月底，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总数达到3147辆，其中公交车2050辆，混合动力1771辆、纯电动253辆、纯电动中巴26辆、纯电动出租车300辆，燃料电池车62辆，公务车20辆，家用车超过751辆。

这一数据显示，即使在深圳这样发展成熟的城市，新能源家用车也未能进入主流市场，只不过在政府的推动下，公交车的保有量有了长足的发展。

降低电池使用成本的措施还在于回收和反复利用。在深圳模式中，电池厂商承诺的4年质保期过后，将由普天负责电池的正常使用和维护。到了第5年或5年后，如果动力电池无法在大巴上使用，那么普天就要重新购买电池。

集中管理和定期检修是中国普天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常规措施，而当公交车电池确实无法保证车辆的续航能力时，普天将其投入使用在通讯设备中，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比亚迪K9在新能源公交车领域表现不错。2013年5月16日，深圳巴士投放1000辆纯电动客车，比亚迪获得其中580辆订单。

一份由业内人士提供的资料显示，2013年比亚迪新能源车全球销量目标为8000辆，其中比亚迪K9为2000辆，比亚迪E6为6000辆。比亚迪汽车公关部经理杜国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亚迪K9出口至英、美、荷兰等一系列发达国家，说明在新能源领域，已经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整个车辆排放社会责任中，2%的车辆排放占了差不多总排放



2013年中国（南京）国际客车及零部件展览会上的电动客车

量的40%，这2%就是大巴和出租车。"杜国忠说。

北京500万辆车里面真正占了1/3排放的就是6.6万辆出租车加3万辆大巴。如果这些车要换成零排放，北京的排放立即减少33%。因此，在公交行业大力推动新能源车，对于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事半功倍。

电桩的难事

"购买纯电动车的私人车主，鲜少考虑经济性，他们或是热衷环保或是喜欢环保带来的时尚标签。"钱亮告诉本刊记者，"但在实际使用方面，车主会碰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2013年特斯拉在中国汽车业火了起来，但这辆售价超过70万元人民币的纯电动车却让首批车主有些为难。

据《证券日报》报道，首批特斯拉车主，徐亮（化名）最担心的就是充电问题，如果用普通的插座充电太慢，他打算装一个充电桩，花费约1万元。

按照特斯拉的承诺，中国第一批Model S将于2014年3月份交车，但特斯拉至今仍没有建设充电站的迹象，公共充电设施只有北京市芳草地试营店和金港客服站两处，因此首批车主大部分只能在家里充电。为了加快充电速度，车主需要变更家中的电网线路，而特斯拉却让车主自行与物业沟通。

目前特斯拉在中国的公共充电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车主要充电还需要有自己的车库，如果不是独栋大院，至少也需要有个能充电的车位。

上海汽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充电站的建立关乎三方合作，车厂、电网和通讯公司。"他透露，此前他曾参与了上海汽车一款纯电动车的网络建设。不过，与相关部委的谈判充满了各种拉锯，并非一帆风顺。

这位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汽车充电设施并没有全球统一标准，每个品牌对电流大小、接入口形状的设置都有所不同。这意味着，一家新的厂商销售电动车时，需要与相关部委和合作公司进行整套谈判，签署自己的协议。

这如同手机充电器一样，三星的充电器无法为苹果充电。充电标准统一，不仅是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必然趋势。冗长的谈判

东方IC

不仅消耗厂家和政府的人力物力，更成为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拦路虎。

据悉，2012 年上汽荣威 E50 已在上海嘉定电动车示范区内建立了一批符合荣威配置条件的充电桩。

在上海大众嘉定汽车城工作了近 10 年的徐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6 年时，工业园区内已建造了充电桩，但至今使用率并不高。在嘉定汽车公园内，也有部分充电桩作为展示示范作用。”

据本刊记者了解，新能源汽车虽是上海大众八个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但目前其还未推出一款成熟的量产车型，仅在部分 BlueMotion 上运用了与新能源相关的技术。

2014年新能源车补贴下降

不过，对于新能源汽车经济性能偏低的说法，生产厂商并不认可。

前文提到的上海汽车人士介绍：“我们计算过，荣威 E50 的售价去除国家、地方政府和厂家的三方补贴后，相当于传统汽车 5 年所使用的燃油费用。这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成本降低的关键在于电池包的核心技术。荣威与美国电池厂商在上海合资建立生产线，专为 E50 生产电池片，而电机、控制器等核心技术却由荣威掌握，电池片也由其自主组装成电池包。

杜国忠也告诉本刊记者：“比亚迪新推出的‘秦’也满足经济性的需求。”在他看来，如果新能源车能出现在公务车市场，将有着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目前国务院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提前一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同时也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比如对煤层气发电等给予税收政策支持。

根据有关计划，2014 年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安排 100 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这些政策出台，显示政府对环境越来越重视。作为生产新能源车的企业也看到新的发展机会，公务车使用新能源车对环境、政府、车商三方都是有利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17533 辆，比上年增长 39.7%，其中纯电动汽车 14243 辆、插电式混合动力 3290 辆；销售新能源汽车 17642 辆，比上年增长 37.9%，其中纯电动汽车 14604 辆、插电式混合动力 3038 辆。

虽然新能源汽车产销增幅远高于整个车市 14% 左右的平均增速，但是较之欧美国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绝对数量已远远落后。

2013 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超 9.6 万辆，同比增幅高达 84%。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到 4.9 万辆，同比增长 27%；纯电动车占到 4.76 万，同比增长 24.1%。普通混合动力汽车近 49 万辆，同比增长 15.3%。

而英国，2013 年售出了 3 万多辆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 17.5 %，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飙升近一倍；插电式新能源车型的数量，在过去两年由 6 个增加到 17 个，所占比例也由两年前的 4.7% 提升至 12.3%。

2014 年这个再度被视为中国新能源车发展元年的年份，并不意味着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但产业重点的跑道转换给了市场新机会。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众多利好政策出台的背景下，新能源车购置补贴却悄然减少：2013 年国家补贴为 3.5 万至 5.4 万元，而今年则为 3.325 万元。

与智力有关的特定基因首次被发现



一个由英法德等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首次确认了一个特定基因，该基因变异会影响到大脑皮质的厚度，进而对智力造成影响。研究人员称，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理解某些智力障碍背后的生物机制。但科学家也认为，人的智力会受到许多基因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而新确定的基因变异对智力的影响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因而并不能代表“智力基因”的全部，但这一发现仍有助于探明包括精神分裂症、孤独症等在内的与认知能力受损有关的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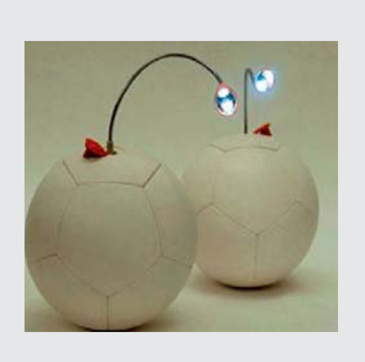
迅速治愈伤口的设备



美国宇航局近日与一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用于研发一种新型生物科技装备，其中一款可以复制人体皮肤细胞，另一款则可以从外部直接帮助治疗身体疼痛。这些设备将与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 GRoK Technologies 公司合作研发，作为美国宇航局技术转让项目的组成部分。

美国宇航局还宣称这项技术将帮助减少所需动物实验的次数。这项技术的原理与《星际迷航》中的皮肤再生器情节非常相似，未来我们或许真的将会拥有一种可以迅速治愈伤口的设备。

踢踢足球，充充电



美国纽约一家公司已经找到一种用体育器材为家用小电器充电的方法。

玩家每踢一下 Soccket 足球，Soccket 里面的摆锤都会摆动，而摆锤的摇摆又会促使与一个可充电电池相连的发电机开始旋转。被储存下来的能量可以用来为小电灯充电，只要通过内置 USB 端口把它插入到足球里就可以了。这个 USB 端口还可以连接其他小家用电器。

牧心如牧牛

我们的心念常常像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我们骑在马上，身不由己

文 | 半僧

一个人骑在一匹快马上奔跑，当他的朋友问，“喂，你要骑马去哪里？”那个人回答，“我不知道啊，你要问马！”

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则寓言。

这个故事实际上说的是人的心。我们的心念常常像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而我们就像骑在马上的人，身不由己，任由野马飞奔。

现代社会，虽然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我们变得更富有，先进的技术无所不在，但如果我们心怀沮丧，那些身外之物和技术好像都无法使我们快乐起来。一个人身体是否舒畅和人际关系是否融洽，也有赖于心理是否安乐，更进一步说，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完全取决于健康的心灵。

为了有强健的体魄，人类发明了各种体育运动，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锻炼出一个强健的心灵呢?



心的练习

2013 年年底，北京发生这样的离奇杀人案。一男子因嫌前面的取款人速度太慢，等待了 20 分钟之后，与其发生冲突，并掏出刀子，把他捅死了。

犯下这样的弥天大错，仅仅是因为一把小小的怒火。这样的怒火看似偶然，其实背后必然经过了积累，就像火山一样，当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限度，就会在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喷发出来。看看现在的社会新闻中，有多少类似一时情绪失控引出的恶性案件，可知现在人们的情绪管理是如何缺失。情绪管理是心理训练的一部分。

愤怒、妒忌、凶恶、懒惰、贪婪，还有常常面临失控的食欲和性欲，时时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不可知的境地。此外，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等等，也是人生必须面临的苦恼。

人的情绪反应确实强大，但心灵的训练也很有效。心是可以训练的，我们可以通过训练，觉察到潜在的破坏性情绪，把它转化，也可以让人从痛苦中解脱，培养出沉静而坚强的内心。

禅修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佛陀就曾经这样训练一位贪婪成性的人。

在古印度，有一个人非常贪婪悭吝，对于任何他喜欢的，总是说“我要！我要！”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

一天在佛陀托钵回程中，他遇到了佛陀，向佛陀索求钵中的“欢喜丸”，佛陀告诉他：“你要欢喜丸可以，但这当中有条件，我可以给你两颗欢喜丸，然后你必须把当中的一颗再还给我，并且说，我不需要这颗欢喜丸。”

为了得到欢喜丸，那人欣然答应了，但是当他要把手中已拿到的欢喜丸再拿出来时，显得相当困难。因为他这一生，不，事实上应该说好几世以来，从来没有把已拿到的东西再拿出去的举动，但是为了得到欢喜丸，他的手颤抖着，挣扎着交出一颗欢喜丸，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不……不需要……不需要这颗欢喜丸。”

旁边的弟子看了觉得很好笑，好奇地问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地给一颗欢喜丸。

佛陀慈悲地说道：“这个人悭贪的习气已经许久，从来未曾有过一丝想要付出的心念，所以我要在他的心念中种下一个布施的因缘。”

牧心如牧牛

心，是个很抽象的东西，所以古代修行

人把对心的训练，形象地比喻成牧牛。明代普明禅师作有《牧牛图颂》，他用几幅图和几首诗，生动表现调伏心性的渐进步骤。

第一首《未牧》，“狰狞头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转遥，一片黑云横谷口，谁知步步犯佳苗。”写一颗焦躁不安，未经驯化的心。

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某件事情发生之后，自己会问自己“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其实，人的很多言语和行为并非是大脑思索之后的选择，而是由习气和潜意识支配，人往往身不由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习气才是自己的主人。那么，如何把握自己的言行呢？首先看到自己内心的运作，这首诗写的是对内心没有觉察的状态，牧童还没有找到心牛。

第二首《初调》，“我有芒绳蓦鼻穿，一回奔竞痛加鞭，从来劣性难调制，犹得山童尽力牵。”写初步的训练与约束。

当一个人静心觉察到自己的心念状态，往往会有惊讶的发现。看到喜欢的就想尽办法弄到手，得不到就寝食难安；别人说了自己不喜欢的话，就会不自在，愤怒；思考问题钻牛角尖，一定要问是非，其实哪有那么多对与错呢？当一个人发现这些，开始的反应一般就是打压自己的念头，就像对待一头不听话的牛，当它要做错事时，就用鞭子把它赶回去。

第三首《受制》，“渐调渐伏息奔驰，渡水穿云步步随，手把芒绳无少缓，牧童终日自忘疲。”初步学会自我控制。

就像初学打篮球，当你刚刚掌握球技的时候，你会爱上这项运动。当你学会觉察和慢慢管理自己的内心，会有成就感，得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乐趣，所以会像牧童一样，忘了疲劳。

第四首《回首》，“日久功深始转头，癫狂心力渐调柔，山童未肯全相许，犹把芒绳且系留。”不断地反省与觉照。

当牛慢慢被驯服，牧童仍然不放心，还把缰绳牵在手上。经过不断地觉察、反省，人的心性也慢慢调柔，不会有出格的言行，但是现在仍然不能放任自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潜意识会跳出来做你的主人。所以，需要继续精进。

七十二变的神通

第五首《驯服》，“绿杨阴下古溪边，放去收来得自然，日暮碧云芳草地，牧童归来不须牵。”心性已被调伏，平静自然。

笔者有一次在青海旅行，晚上，看到很多牛马牲畜在县城的街上自由自在地走动，我问当地的一位藏民，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主人跟着不会丢吗？藏民告诉我，当地的农民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了饲料，就把牲畜放出门去，它们或者上山或者进城，随便自己找吃的，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会自己回到自己的家。这个习俗能够延续，除了民风淳朴，更多的是人与动物之间形成的默契。青海的牲畜并不是特殊的品种，而是当地藏民长期驯化的结果。

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心牛训练到不需要缰绳，也会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第六首《无碍》，“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劳鞭策永无拘，山童稳坐青松下，一曲升平乐有余。”心灵获得自由，悠闲自乐。

当一个人对心性的管理达到无为而治，不须再花费精力来约束自己，就会获得极大的自由，自由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与各种物欲得到满足的快感不同，它是精神飞翔的状态，人生就像庄子所说的“逍遥游”。

小时候，我看《西游记》，有一个情节我一直很奇怪。孙悟空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大闹天宫不服管束，后来能乖乖地跟着唐僧，是因为观音菩萨给他头上带了个紧箍咒，到了西天如来佛祖那里取得真经之后，孙悟空对如来说，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你就给我念一个“松箍咒”，把紧箍咒摘下来吧，但是如来说，你自己摸一下头。孙悟空往头上一摸，紧箍咒已经没有了。我一直在想，怎么会一下子没有了呢？是如来佛祖把紧箍咒收回去了吗？以后唐僧再也不能管教孙悟空了吗？长大后接触禅修才明白《西游记》的隐喻，孙悟空是人的心性的象征，初始就像一只心猿意马的野猴子，本能的野性无法无天，当经历很多磨难，渐渐收敛调伏，就获得了更高境界的自由，不再需要外在的紧箍咒。我终于明白了，那个紧箍咒不是如来佛摘走的，它会自行消失。乐

《修行论语》秉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致力于探讨现代人的心灵修养，传播仁爱的精神。栏目开办以来收到很多热心读者意见反馈，为此特设邮箱：lancy_xxly@126.com，征集读者关心和困惑的问题，兰溪将代你请教大师。



报道反馈


张海在哪里

本刊近期刊载的人物稿件《张海在哪里》，还原了原健力宝董事长张海从入主健力宝，到入狱，再到涉嫌造假立功减刑并外逃前后的经过。该文一经刊载，迅速被法律界和财经界的相关网站和媒介转载，并被从各自专业的角度作出了解读。有律师认为，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减刑假释办理流程，存在执行机关报批、法院盖章的现象。再加上监狱往往是比较封闭的，监管人员相对强势。如果监管不力，法院再流于形式的话，就会出现漏洞。另外，某法院副院长认为，减刑评判标准不够科学，重劳动表现，简单地以分折刑，也会造成减刑过多，假释过滥。有法律界专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法机关要“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而张海“假立功”案,正是这样一个考验相关司法机关有无积极作为，依法办案的契机。

（《张海在哪里》，2014 年第 6 期，作者：朱兰）

文化下乡有“猫腻”

新春前夕，文化部门组织艺术家，到一些偏远乡镇，进行免费慰问演出、写春联、送书籍，搞“文化下乡”活动。虽然主题是“文化”，但随行的，还有一些穿白大褂的医生，带着几大车药品随行。随行的主管解释说，这些人是志愿者，是帮助乡亲们义诊的。

到得现场，我们才知道，这些参与“义诊”的医生，其实是药品推销员。他们先是借着“文化下乡”的牌子，帮一些看节目的乡亲“免费看病”，然后连哄带骗，给不明真相的群众推销他们带去的各类营养品和保健药。这些药品的价格，较正规药店要高出许多。

将情况反馈到主管那儿，他表示挺为难：“文化下乡”活动，上面要求高，给的经费有限，艺术家们一路的开销，大部分是这些药店和厂家赞助的。反正看病与买药，是愿打愿挨的事情，他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蒋 平（湖南）

餐桌上的伴侣动物

民以食为天，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美食也是如此，食材多样，菜式繁多，可若是为了口腹之欲将伴侣动物搬上餐桌就实在太过残忍了些。志愿者们仅仅在去年 11 月 21 日的普陀、今年 1 月 15 日的武汉，救下的将要成为食物的猫咪就有 3400 只。

什么是伴侣动物？是以供玩赏、陪伴之目的而饲养的动物。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广东、广西等地，有一道菜叫“龙虎斗”，其中的“龙”指蛇肉、“虎”指猫肉，在当地颇受欢迎。于是，有大量猫咪被贩卖到两广地区，成为餐桌上的一道菜，目前一只猫在广东当地的收购价在 20 ~ 30 元不等。

我不是素食主义者，可是我无法接受将这些可爱的猫咪推向我们的餐桌，我们剥夺它们的生命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没有相关法律约束我们去保护伴侣动物，可是我们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却要求我们不能为了一己私欲残害伴侣动物。因为它们是生活的伴侣，而不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道菜肴。

什么时候猫咪等伴侣动物不再像现在这样被当做会行走的菜肴，能真真正正地被当做生活伴侣对待？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王晓燕（安徽）


热心读者
来信邮箱：
lwdfdzlx@163.com


新华社有错即改
专用邮箱：
ycjg@xinhua.cn

编读往来 热线电话：
(021)64721367
lwdf2008@vip.sohu.com

报站

前天，我坐公交车去郊区办事。我是从始发站——火车站上的车，快到第二站时，车厢喇叭响起电子自动报站语音："某某岛牌羊肝羹提高视力提醒您，百货大楼站到了。"接下来的报站也是如此方式：某某眼科准分子治疗近视只需一分钟提醒您，北门口车站到了；某某齿科洁齿还您美丽微笑提醒您，妇婴医院车站到了；某某三星级大酒店吃住洗浴一站式服务提醒您，师范学院车站到了……由于公交车实行的是无人售票制度，车厢内没有售票员，加之车上人多噪杂，有两个外地人没听太准，结果错过了要下的站，当车停在下一站时，二人问明司机后一边悻悻下车一边埋怨这种报站方式太乱套。

公交公司利用自身优势为商家做广告来赚取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完全可以通过在车厢内张贴广告或利用车内电子显示屏等方式，这样将大段的广告词与报站名混在一起，别说是外地人，就连我这当地人稍不注意也会迷糊。

王军（辽宁）

保姆的工资

微信"朋友圈"里一位好友在"哭天喊地"，说年前雇的保姆正月初八来上班，一开口就是月薪4000元，朋友说上涨1000元他有难度，保姆啥也不说，马上进屋整理年前留下的东西走人了。

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家里的卫生自己打扫、孩子自己带、饭菜自己烧、老人自己照顾，夫妻俩忙得快疯掉了。

他们家里少不了保姆，到家政公司一问，这年前年后的保姆工资还真又涨了不少，像他这样家里有老有小需要照顾的，起价就是4000元。

朋友是公司里一位主管，年薪有20万。太太是一家造纸厂的行政主管，年薪才7万元，他太太浙江大学毕业、二本、英语八级，工作五年，工资竟然与一位保姆持平，这让夫妻俩很"震惊"。

保姆工资之高早有所闻，月薪四五千已不是什么新闻。年前还听到一个工种——泥水匠，日薪高达300元，也远远超过一般的工薪阶层。薪酬待遇是非常市场化的东西，就像菜市场的菜，多则便宜少则贵，最终原因还是"供应量少"。

人力成本上涨是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改善必然带来的结果，有人说中国人正在从"生存型"走向"生活型"，对于工种、岗位等等有了更多的考量和选择。

我问过在老家务农的舅妈，如果每月给你5000元，让你离乡到城里当保姆，你愿不愿意？舅妈坚定地说："不愿意"。她对我说，她办了失地保险，每月有1000多元，在村办工厂上班每月有2000多元，养几头猪、羊还种了几亩毛竹，一年有上万元……农村又造了那么大的洋房，有吃有喝的，还有自由，真要跑到城里当保姆，这是在自找苦吃了。

舅妈的话还真是道出了现在保姆工资为啥涨得那么高的另一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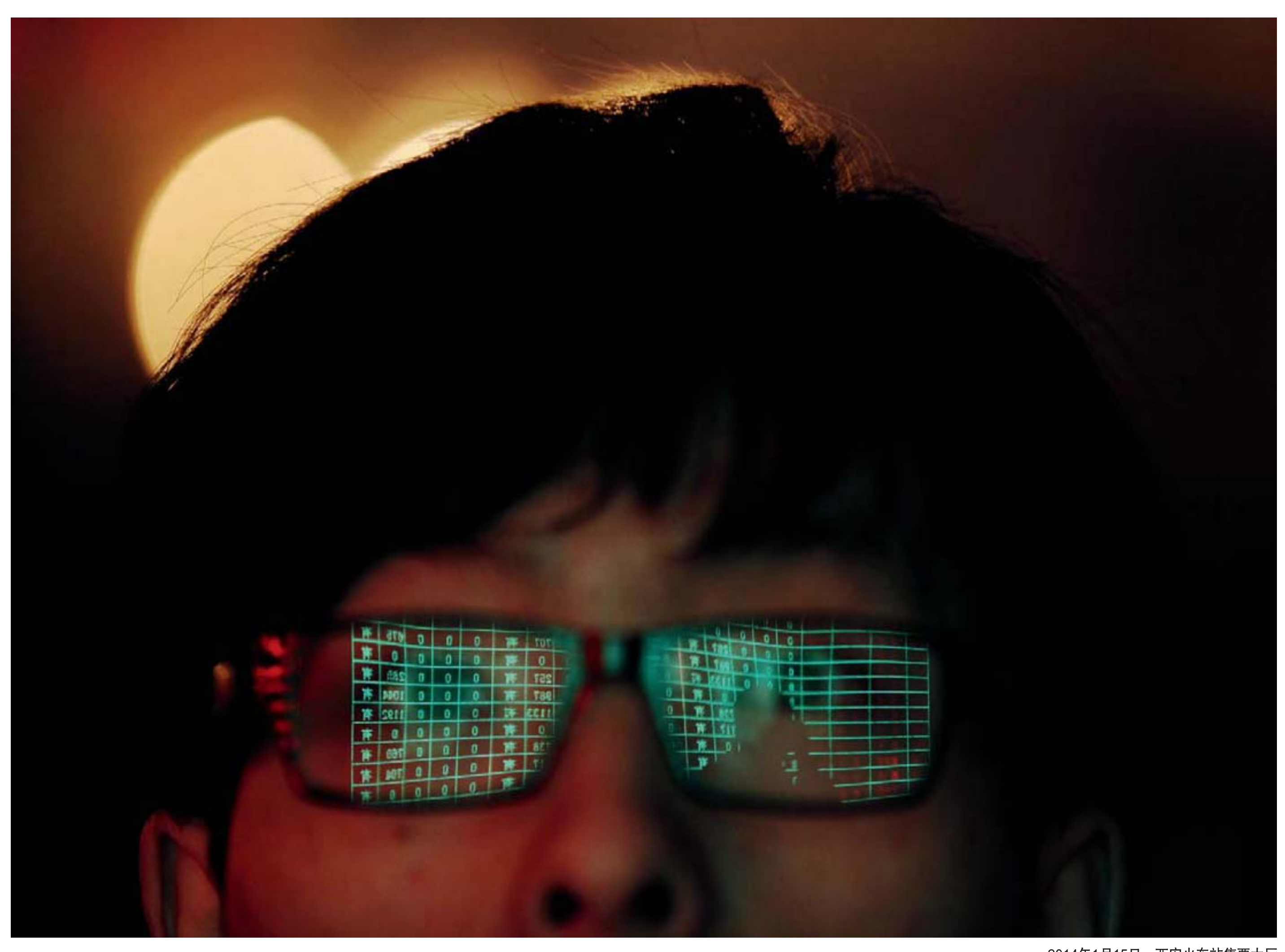
流沙（浙江）

劣质教辅书

读小学二年级的侄儿就要开学了，我和他一起整理书包时，随手翻开他的一些教辅书和练习册，发现存在不少问题。除了一些错别字、拼音标注错误外，我还发现有的教辅书与课程标准不相符，与教材不同步；练习题重复量大，不符合"少做题、多读书"的基本要求；讲解过多，公布答案，取代了学生自主分析、研究的学习过程。还有的教辅书题型陈旧、题目过难、编排中差错太多。如某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版《阅读先锋》，书中针对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选文篇幅有的竟然长达4页，问题提得也很奇怪，例如："假如你是国家主席，会采取什么办法？"低年级的学生对国家主席的职能、权利还不清楚，如何从此角度思考问题？

古话说，"开卷有益"，我看现在却是开卷未必有益。这些教辅书要么是内容胡扯，要么是在东拼西凑，根本没有一点对孩子负责的态度。浪费了买书钱不说，更会误人子弟。

戴文华（江苏）



2014年1月15日，西安火车站售票大厅

CFP

一个“黄牛”的自我修养

入行5年，最大的感受是“黄牛”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跟高科技沾了边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元元 | 河南信阳报道

凌晨 5 点，一阵闹铃刺耳，杨辉腾地从被窝里坐起。

来不及开灯，他摸索着打开电脑开关，迅速穿好衣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将持续到晚上 11 点。

此时，全国各地有无数和杨辉一样的人，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刷票、倒卖、赚钱。这是他们的生计，“在我眼里，火车票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过去五年，这个“圈子”发生了很多变化，也让杨辉意识到不断“提升自我修养”的紧迫。

长江后浪推前浪

如果不是知道身份，很难相信穿着时尚的杨辉会是个火车票“黄牛”。

很多人对于“黄牛”的印象还停留在上

个世纪。那时,“黄牛”多集中在火车站附近，看到前来买票的人便上前搭讪、伺机推销。

但是，对于杨辉他们来说，这类人已成为历史，至少正在成为历史。

杨辉是个85后。他所在的“黄牛”群组有近20人，90后占了五分之三、80后占了五分之二，最大的年龄不超过35岁，最小的才17岁。

“年轻人学习能力比较强、赚钱的欲望也比较强，能很快适应。”年龄大的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尤其是实名制后，购票手续的繁琐以及手段的现代化，使“黄牛”倒票难度大大增加。

杨辉的“师傅”,一个40多岁的老“黄牛”,在圈内已有7年之久，最高月收入曾达5万元。实名制后收入大不如前，甚至落后于自己的徒弟，最后转行做了水果生意。他走时留给杨辉的一句话是：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很多和我师傅差不多年纪的人都转行了，不是因为这个圈子不让他们做了，而是他们自己做不下去了。”杨辉说。2012年实行实名制后，杨辉所在的“黄牛”群组由15人变为10人。

不过，群体年轻化的趋势仅限于最底层的“黄牛”，一级“黄牛”仍以年长者为主。

分层集群式发展客户

时代的变化迫使手段升级。

如今的“黄牛”不再每天到火车站转悠寻找客源，而是主动出击建立顾客群。

杨辉管顾客叫做“客户”。在刚入行的2008年，几乎不用找客户，往往是客户自己找上门，“当时做这行的虽然也不少，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地盘，所以没人敢跟你抢。”杨辉说。

如今，网络交易模糊了“黄牛”之间原本固定的地域界限，圈子秩序大乱，要想挣钱只能自己寻找客源。

杨辉的经验是分层集群式发展。利用固定客户发展更多的潜在客户，一带十、十带百，最后建立一个几百人的客户群。同时，他还通过自己所在的“黄牛”群组要求更多的组员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客户，最后集合到一起共享。目前，杨辉所在的“黄牛”群组至少掌握有500个固定客户，是他们相对固定的收入源。

“关键是服务好，要说到做到，不能言而无信，才能拥有稳定客户。”杨辉常和群组里其他人说。

仅仅靠这几百客户是不够的。只有源源不断地发展新客户才能在这行立足。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找客户，杨辉添加了几十个QQ、微信、微博群。

这种近乎于大海捞针的寻找方法效果并不差。“火车票是大众需求，即使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会需要。”有了客户，就要好好考虑如何维护，因为客户随时都可能被挖墙脚。“一般人买‘黄牛’票时都是同时找好几个人刷票，通过比较来选择最好的卖家。”

拿“黄牛”加价来说，普通火车票往往在50~100元不等，春运时价格能涨到100~300元左右，甚至更高。对于需要的乘客来说，价格低自然是首选。

为了留住客户，杨辉甚至买了销售类的书，学习销售技巧。尽管在实际交易中，这些理论并没起到多大作用，但他相信未来会有用。比如，逢年过节，杨辉都会给客户发祝福短信，联络感情。

刷票技术革新

凌晨5点起床、夜晚11点睡觉，这是杨辉2014年元旦以来的作息规律。

每天，杨辉要18个小时对着电脑不停刷票交易。即使这样，他仍然觉得这比以前现场式的贩票方式简单省事。

2010年以前，“黄牛”使用最广的囤票方式是去火车站售票大厅现场购买。按当时规定，每个乘客所购车票数量有限，只有通过多人多票的方式才能大量获取车票。

为了防止被盯梢，一些“黄牛”会专门花钱雇人排队买票。这些被雇的买票者多半车站附近的游手好闲之人或街头流浪人员。

12306网站改变了这一现状。

2011年6月12日，京津城际高铁开始试行12306网络售票业务；2012年年底，全国铁路开始全面推行网络售票，中国铁路自此步入电子商务时代。

相较于现场购票，网络购票、电话购票省时省力，极大地节约人力和时间成本，成为“黄牛”囤票的最佳选择。

这点杨辉深有体会。

2008年，杨辉刚入行，杨辉和师傅以及十几个老乡分头在火车站不同的售票窗口排队购票，每人每天至少要来回排队十次以上。但是，现在只需坐在电脑前通过特定的刷票软件，杨辉就能一次性囤票上千张，效率提高了上百倍。

为此，杨辉花6000元组装了一台高性能台式电脑，这是他“从业”以来的最大一笔投资。

杨辉还在所在的“黄牛”群组组织了一次内部培训，花钱请圈内专业人士讲解相关知识。培训结束后，杨辉整理了一份网络购票和电话购票的操作指南，分发给组员。

杨辉介绍说，目前“黄牛”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一种叫做身份证算号器的软件进行个人身份信息收集。利用该软件，输入出生地、出生日期以及性别等三项信息，即可生成1到999个格式正确的身份证号码。

12306网站并未与公安部的个人信息数据库联网，所以在网络购票的信息审核时只对身份证号进行验证，并不对姓名进行辨别。这个漏洞使得“黄牛”在购票时只需输入格式正确的身份证号即可，姓名可随意填写。

利用这种虚假身份证号购票将导致无法取票，但“黄牛”却能利用这一点大规模抢票囤积。“三步走，先买再退最后再抢回来。”

首先，“黄牛”会使用身份证算号器预先算出可用的身份证号并记录，然后打开抢票软件进行抢票。目前“黄牛”圈内普遍使用的一款软件可支持同一台电脑同时登录20个账号使用。每个账号在同一时间可抢5张车票,由此为100张。此外,该软件有“双开”功能，即在同一台电脑上最多可打开10个。因此，理论上看，一台电脑同时可抢1000张火车票。

抢到车票之后，“黄牛”会进行兜售。一旦有顾客付款，他们就立刻退票。退票将再次进入铁路售票系统。此时，他们会再次打开抢票软件，不间断刷票，在火车票重回票仓的第一时间抢到。而后，用买家的身份

和几年前不同，如今的“黄牛”不再每天到火车站转悠寻找客源，而是主动出击建立自己的顾客群

信息填写购买车票，并出手转售。

杨辉说，这款抢票软件与360、猎豹等抢票软件不同，属于“特供款”，售价为每月2000元，且只能通过熟识的“黄牛”或“圈内人”介绍才能买到。据称，该软件为一群供职于网络科技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研发，专门为“黄牛”抢票设计。

杨辉感叹，入行5年，他最大的感受是“黄牛”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跟高科技沾了边”。跟圈外朋友聚会，他常说自己在从事IT业。

线下交易魔高一丈

“现在圈内很多线下交易都停止了，大多都转为线上交易。”杨辉所说的线下交易是指以往“黄牛”与顾客之间面对面的票钱交易。线下交易时常遭遇警方的钓鱼执法，风险系数高。杨辉就碰到过两次。

现在，多数仍然从事线下交易的“黄牛”多是中老年人，或者被一级“黄牛”雇佣的底层“黄牛”。他们无法操作网络交易，只能通过这种较原始、风险大的方式来赚钱。

即使是他们，提升技巧同样重要。

一般在进行线下交易前，多数“黄牛”都会以购票需要为由要求买票者提供身份证信息，然后通过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进行身份核实。通过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系统会自动查询到该身份证的办证号码地、个人性别以及出生年月日。

尽管这些信息并不能完全判断个人身份，但对于“黄牛”来说极具参考价值。考虑到警方的钓鱼执法，一般本地身份信息的买票者多半会被拒绝，而外地身份信息的买票者成功率较大。

在双方交易时，很多“黄牛”为了防止警方蹲点执法，会要求买票者不停变换交易地点。直到确认无人跟踪后，方才同意交易。有些“黄牛”甚至会将车票提前放到一个固定位置，让买票者先给钱后取票。

“风险大不说，还得耗费很多时间、精力，划不来。”因为之前有过两次惨痛的教训，杨辉现在基本不做线下交易，除非是值得信任的老客户。

线上交易则日趋火爆。



目前，“黄牛”常用身份证算号器进行个人身份信息收集

线上交易整个过程都在网上进行，双方并不直接见面。一般由买票者先提供个人身份信息以及车票需求，然后由“黄牛”通过上述提到的刷票软件不间断刷票，在获取车票后，买票者需先通过支付宝将手续费转入“黄牛”账户，而后“黄牛”会提供给其一个在12306网站注册的公共账号及密码。这一系列手续必须在45分钟内完成，否则车票将自动作废，重新入库。

无论是“黄牛”还是买票者，在45分钟内完成整个交易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遇到操作不熟练的买票者或者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整个交易就可能失败，之前的所有心血也会付诸东流。

同时，为了防止买票者仅支付车票费而不支付手续费，“黄牛”要求买票者必须通过指定的账号支付车票，不能随意使用其他账户。一旦出现上述情况，“黄牛”可以随时登录账号进行退票。在交易完成后，“黄牛”也会及时修改账户密码，以免出现冒用。

必备技能：会躲警察、会识记者

“我最害怕的是两种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记者。”杨辉说，这两种人他都碰到过。

2010年，杨辉在火车站跟一个顾客交易时被蹲点的警察逮个正着。那次，他缴纳了上千元的罚款，做了笔录。

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完全可以被判刑。《刑法》规定，倒卖火车票、船票票面金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获利额在2000元以上即构成犯罪，可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

杨辉说，从业的5年里，他经历过的这类事件不下十次，多是罚款了事，从未被拘留过。即使被拘留也是象征性地几天时间，很多“黄牛”出来后照样重操旧业。

后来，面对警察的经历多了，杨辉总结了“经验”：千万不要慌、不要撒腿就跑，要保持冷静，即使被搜出车票也要死不承认。“警察很多时候也不确定谁是（“黄牛”），他们也是碰运气，一旦你上当就露馅了。”

近年来，公安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整治票务市场。据北京铁路警方透露，在2014年春运的33天里共破获倒票案件33起，抓获涉嫌倒卖火车票嫌疑人46名，收缴火车票1129张。

杨辉的上线，也是在这个时候落网的。作为一级“黄牛”，他因为倒票数额巨大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而在此之前的7年里，这个一级“黄牛”一直都平安无事，还因此颇有“声誉”。

除了在火车站布防监控外，警方也把更多的目光转移到网络空间，加大对网络倒票交易的打击力度。

“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装哑巴，除了乘客的购票信息外，我们不问其他的信息。当然，乘客也不能问我们的个人信息。”杨辉说，在双方交易过程中，涉及抢票、倒票的一些关键信息绝对不能透露。“决不能留下证据。”

“有些人会打着好奇的旗号问东问西，这类人一般都动机不纯。”一旦遇到千方百计打听消息的乘客，“黄牛”会终止交易。

另一个让“黄牛”们避之不及的是记者。“记者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进了他们的陷阱。”杨辉说，记者们有的冒充乘客、有的冒充刚入行者，还有的直接卧底“黄牛”内部。

一些老资格的“黄牛”甚至总结出一套识别术，罗列四大特征来辨别记者。一、拼命和你套近乎；二、问号超过三个以上；三、问题偏离买票；四、故意设置条件。

一旦发现疑似记者身份的顾客，杨辉不仅会自己屏蔽信息，还会在群组转发该信息，提醒其他人小心提防。杨辉坦言，会躲警察、会识记者已成了一个“黄牛”的必备技能。

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变化，杨辉沉默了片刻。“变化太多了，主要还是环境变了，人也跟着变了。”（文中杨辉系化名）



文 | 李赛拉

西方也流行网上找对象吗

西方女孩子的"相亲观"似乎更加放松，更享受过程，没有"赶快把自己嫁出去"的那种急迫感

就是找个一起的伴，统称为partner，具体怎么相处，由双方商定，灵活安排，一般各自经济独立

情人节前后，西方不少媒体都报道说，中国人的婚恋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谈恋爱，很多中国人开始选择"相亲网站"寻找另一半。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思想解放了，是新闻。西方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城市的白领们也流行网上找对象吗？

确实如此。而且不光是城市里的年轻白领们网上找对象，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中老年人也会上网找。但与中国人主要是找结婚对象不同，英国和西方人找的是 partner，伴侣。

在他们看来，结婚生子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他们可以只谈恋爱不结婚，可以只结婚不生孩子，可以只是常常在一起但并不涉及对方生活，可以黄昏恋，可以跨国恋，可以异地恋，可以同性恋……

总之，就是找个一起的伴，统称为 partner，具体怎么相处，由双方商定，灵活安排，一般各自经济独立。

而且，西方女孩子的"相亲观"似乎也更加放松，更享受过程，没有"赶快把自己嫁出去"的那种急迫感。

我的一个英国"闺蜜"，35 岁，伦敦白领一枚，网恋达人，一周常常有两三晚是跟"网上男友"吃饭或泡酒吧。

我问她，总跟不认识的男人吃饭，有什么可聊的？她回答，聊工作啊，生活啊，旅行见闻啊，有些虽然没成男友，倒成了朋友，听别人的人生故事，长自己的见识，算是一种社交方式。

我打趣说，你不问房子车子票子？中国姑娘最关心这些了。她说，从来不会问，财产是最大的隐私，再说了，我看的是人，不是钱，他的钱与我关系不大。

我又问，不少中国女孩"相亲"多了觉得厌烦，你不会烦吗？她说，我倒是觉得，常常跟不同的男人聊天见面，让我变得更加有趣和自信了。

当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你不怕网上的人是现实生活里的骗子吗？

她告诉我，她有一套"见面政策"。比如，初次见面，只会约在晚上六七点，如果觉得不来电或不对劲，就可以说下面还有事。如果觉得合适，再留联系方式，慢慢考察。

如果一起吃饭，一定会主动要求付自己的一半饭钱。当然，很多情况下，男方都会坚持付账。她说，如果感觉好，就让对方付账，这样可以顺势创造下一次的机会。而如果感觉不好，她就会坚持付掉自己的一半，这样两不相欠，就不用再见面了。

"话虽这么说，有时候看到男人毫不犹豫地同意 AA，甚至盯着账单把各人份额算得一清二楚时，还是会忍不住心里不舒服，"她笑说。乐



李赛拉：媒体人，现居伦敦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

文 | 韩娟（Jen Ambrose）（美国）

黄花城长城脚下的小饭馆

我们在那里过了两个中秋节，看着苍凉的月亮从长城背后升起



自从搬到北京昌平居住以来，我们全家就常常去黄花城长城远足。

由于开车不到一小时即到，我们大可以在慵懒的周末下午的最后一刻，动身去那儿遛遛弯。一个下午的远足和登山之后，再吃顿好的，就太美了。附近的村子里，吃饭的地方很多，而我们最常去的，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饭店。

第一次去完黄花城长城，回来的路上看到有很多家馆子，实在不知道选哪家好。在这个餐馆点评软件覆盖不到，又没有朋友口碑可供参考的地方，我们只能跟着感觉走了。

这家饭馆之所以吸引了我们，是因为它门口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坐在那里就可以看到长城——我们想，有了这个，哪怕味道差点，也还是独一无二的。

结果倒是相当惊喜。坐在走廊里，看到天色由亮转暗，长城从令人敬畏的防御工事变成淡淡的城墙剪影，是令人非常难忘的景象。菜是北方农村的家常菜，烧茄子，炒饼，都做得很可口。饭店里的人还格外喜欢我的儿子和女儿，任他们在店前店后跑来跑去。

后来我们就经常光顾那家小饭馆，下午在长城上访古追今后，晚上就去长城脚下的那个小院子享用一顿长长的美食。

又一个黄花城周末后，我们突然发现，掉了一副望远镜。我和先生记得在长城上用过，所以想，多半是丢在那儿忘拿回来了。我们还开玩笑说，希望捡到它的人能卖个好价钱。

数周之后，我们又去了黄花城长城。去的路上，路过小饭馆，居然看到店主跑出来，用力朝我们挥手，要我们停车。

停下车定睛一看，她比画出望远镜的样子，并示意我们跟她进屋。很快，她从里间拿出了我们丢失的望远镜，还用个袋子仔细地包好了，似乎是完璧归还一件我们寄存给她的东西。

我们又惊又喜，不停地感谢她，4小时后回来吃饭时又谢了她一遍。她并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再来吃饭，但她还是如此仔细地替我们保存了望远镜——或许，她是对自己家的炒饼太有信心了！

从此之后，我们又在她家吃了无数次饭。美食和美景已经足以让我们成为常客，但望远镜事件后，我们则成了她家的忠实拥趸，而且只要方便，就带朋友来吃。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坐在外面的走廊里看长城，特别寒冷的夜晚，我们更喜欢蜷在暖和的炕上喝姜丝可乐。我们还在那里过了两个中秋节，看着苍凉的月亮从长城背后升起。

这是我们在中国最温暖的经历之一。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丢过任何东西。饭馆里的人在我们驾车离开之前，总会提醒我们再检查一遍桌子，但我们并不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丢了，下次也会完好无损地再拿回来。东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坐在外面的走廊下看长城，特别寒冷的夜晚，我们更喜欢蜷在暖和的炕上喝姜丝可乐

韩娟（Jen Ambrose）：
美国工程师，现随家人居住北京昌平

编辑邮箱：daiwenming@vip.sohu.com

漫画／李峰